

AE 13/14

目 录

編者的話	1
駁斥和揭露右派分子黃紹竑的謬論和罪行	
黃紹竑的葫蘆里卖的什么药	郁 洲 1
对黃紹竑的假檢討提出質問	
(民革广西省委会召开扩大座談会)	4
声討右派分子黃紹竑	
(民革南宁市委召开成員大会)	7
讓黃紹竑回来看事实吧	严 正 10
北京师大生物系学生要求民革中央	
彻底追查黃紹竑包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	12
地方国营廖平农場职工駁斥黃紹竑	13
肃反沒有搞糟	黄可祐 15
黃紹竑公事皮包里的秘密	張德永 16
黃紹竑这样“視察”浙江司法工作	奚 琳 19
黃紹竑譚惕吾是怎样“視察”	
上海司法工作的	吳宏澤等 25
黃紹竑保护的什么人?	
翻的什么案?	人民日报記者集体采訪 29
黃紹竑包庇反革命分子謝昕	41
黃紹竑是反革命分子的代言人	林 永 44

駁斥黃紹竑為反革命分子“申冤”	田德民	45
民革成員何任生指責黃紹竑		49
質問黃紹竑	劉茂林	49
揭發黃紹竑的罪惡歷史		53
控訴黃紹竑大批屠殺廣州工农群众	羅愼之等	54
黃紹竑殺害革命人士罪惡重重		55
烈士家屬們憤怒控訴黃紹竑的罪行		57
控訴黃紹竑屠殺青年的罪行	高植蘭	61
控訴黃紹竑欠下右江人民的血債	黃振光	62
殺害劉英同志的是黃紹竑	程兆修	64
黃紹竑在浙江欠下的血債		66
黃紹竑在浙江屠殺人民舉行 “人頭展覽會”	林樹中	67
來自四明山老區的聲音	俞松青	68
聲討右派分子譚惕吾		
譚惕吾是反共反人民的两面派		71
譚惕吾不要再耍两面派要老实交代	蘇從周	74
击破譚惕吾的反党陰謀	李文瀾	78
請看譚惕吾所提出的“三害典型” 案件的真象	人民日報記者	81
譚惕吾為政治流氓鳴“冤”	張西洛	88
聲討反革命分子趙鴻鸞		
抗議反革命分子趙鴻鸞利用党 整風進行翻把污蔑肅反!		92
东北財經學院舉行大會 聲討趙鴻鸞	遼寧日報記者	102

決不允許反革命分子反扑·····	104
我們堅決支持財經學院	
對反革命分子趙鴻翥的聲討·····	107
支援財經學院聲討反革命分子趙鴻翥·····	110
沈陽醫學院舉行辯論大會	
聲討反革命分子趙鴻翥並通過抗議書·····	111
沈陽市民革民盟民建等民主黨派人士	
一致要求將趙鴻翥依法嚴辦·····	113
趙鴻翥反共今昔·····霍慶雙等	114
聲討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趙鴻翥·····佟哲暉	121
不容許反革命分子污蔑肅反·····方 信	123
趙鴻翥“教授”的反動行徑·····陳福松等	127
揭穿右派分子趙鴻翥一貫的	
反動言論·····王 冶等	131
用事實反擊反革命分子的反扑·····陸 周等	135
聲討右派分子張百生、黃振旅	
張百生、黃振旅的言論是荒謬言論·····	137
沈陽師範學院教職員辯論大會	
繼續批駁張、黃二人的謬論·····	142
黃振旅丑事重重·····	147
張百生開始交代張、黃集團的陰謀·····	150
張百生開始“繳械”投降	
黃振旅逃會被找回·····	152
師範學院兩千多人集會	
窮追右派分子張百生、黃振旅·····	155
不讓反社會主義的言論抬頭（沈陽日報	

讀者來信綜述)	159
共产党的根誰也挖不掉.....	張銘聞 161
社会主义建設的絆脚石.....	刘玉章 165
先生：是你們把事弄顛倒了.....	施 玫等 170
張百生、黃振旅在散布反社会主义的論調	
販賣資本主义的毒菌.....	徐文心 175
肃反运动是完全必要的.....	戴同林 177
对反革命分子不能施仁政.....	李維森 181
說鎮反多杀了人毫無根据.....	蔡定輝 184
何謂“庸人自扰”.....	谷梁春 185

声討右派分子東星北

看！東星北是怎样恶毒地污蔑肃反	
并攻击毛主席的指示.....	林 朗 187
東星北的最后目的是	
反对党反对人民民主专政.....	陆 凡 189
東星北历史上的反革命罪恶.....	李恒勤 193
斗争東星北是完全正确的.....	余向远 195
肃反中对東星北的斗争是完全應該的.....	平 鑫 198
建議修改对東星北的肃反結論.....	沈 宁 200

駁斥和揭露右派分子黃紹竑 的謬論和罪行

黃紹竑的葫蘆里卖的什么藥

郁 洲

在帮助党整风的幌子下，有一些冒牌医生在贩卖毒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黄绍竑就是其中一个。现在就让我们看一看黄绍竑的葫蘆里卖的是什么药。

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上，黄绍竑说：“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经成为工作报告中的一种公式，我认为这样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造成更多错误的危险，个别错误即仅仅是百分之二、三，也不能用百分之九十七、八的成绩来掩护它，忽视它，就司法方面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请看，黄绍竑为我们画了怎样一个黑脸，给我们的新社会描绘了一幅多么阴暗，使人惊心动魄的画面。按照他的逻辑，宣传成绩就等于掩盖错误，这种官僚主义作风的结果，造成了不知多少人家破人亡，等等。如果根据黄绍竑的意见行事，那么

我們只能緘口不談成績，一任黃紹竑之流宣傳缺點和錯誤，如此下去，其結果必然是使大家好夕不分，是非不明，漸漸對社會主義事業喪失信心。當然，這樣的結果正是右派先生們引頸盼望的。

有人或許會說這是黃紹竑一時感情激動，出言偏激，其用心還是好的。問題也就在這裡，我們決不能孤立地來看待這些意見，而必須聯系他一貫的言行來考查，這樣，狐狸的尾巴就藏不住了。

黃紹竑以人民代表的身份時常出外視察，他是怎樣視察的呢？在上海，大家知道，解放以前，上海是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長期統治全國的基地，解放後又是敵人潛伏和派遣特務活動的重點地區。黃紹竑在視察時，從來沒有問起過上海反革命活動情況怎麼樣，反革命分子肅清得是否徹底，有沒有漏網的，他對這樣重大的敵我鬥爭問題，絲毫不感興趣，相反，却剔骨挑筋地找毛病，隨後就故意夸大工作中的缺點，把司法工作描寫成漆黑一團。他在視察中從不接近工农群眾，却很喜欢和反革命罪犯打交道，聽見他們喊冤就隨聲附和。他在上海時，還曾經指名抽調一些案卷，這些案卷的被告人，有的是他的老同事、舊部下，或者是與他有聯繫的人。他毫不避諱地為這些人講話，設法為他們開脫。他並且向司法人員發表過這樣荒謬的意見：“即使罪該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如果他有家庭負擔的話，判了死刑，政府還要救濟其家屬，是否合算，是不是合乎國家利益？”按照黃紹竑的論點，罪該處死的反革命分子也不要殺，該判刑的也不要關，因為與其救濟他們家屬，不如把他們釋放出來好。黃紹竑口口聲聲講法制，人們要問：他的這種“法制”，目的究

竟是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还是保护反革命分子？

黃紹竑不仅在各地視察中极力吹毛求疵，对反革命分子倍加关怀，并且还借各种場合，公开为反革命分子叫“冤”。今年3月，在全国政协第三次會議上，他就举出过一个所謂冤沉海底的冤案。这个案件的被捕人是韓國屏，此人一九四六年在太原工业学校讀書时就参加国民党，先后担任国民党区分部書記，区党部書記，一九四七年进入輔仁大学后，同特务分子勾結一起，破坏学生运动，迫害进步学生。解放以后，韓曾經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因为他繼續散布反动言論，一九五一年被他所在单位开除。到河北龙关县工作后，还是不断宣傳反动言論，誣蔑党和政府，并且玩弄女学生，行为极端恶劣。人民政府在一九五五年依法把韓逮捕，判处徒刑。这就是黃紹竑所說的冤沉海底的冤案，并且在政协会上鳴冤。

黃紹竑是如此热心地作反革命分子代言人，这就难怪他能得反革命分子的爱戴，并且紛紛写信請他鳴冤了。

从已經揭发出的事实看，黃紹竑究竟是在为人民服务，还是在为反革命效劳，讀者們自己也可以作出判断了。

黃紹竑今天的所作所为决不是偶然的。他的反人民、反共产党的历史可謂久远了。在国民党統治时期，黃紹竑曾經担任过广西、浙江两省主席等职务，一向以殘暴出名。一九二七年四月黃紹竑到南京参加蔣介石召开的濟党會議后，在蔣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当天早晨，黃紹竑在南宁逮捕和杀害了九十名共产党员。从这一年的四月到九月，他在广西慘酷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进步群众。那时候他是同意并且認真执行蔣介石“宁可錯杀一千，

不可放走一人”的方針的。南昌起义后，黃紹竑曾派出一师人去攻打賀龙和叶挺部队，以后黃紹竑又亲自率領两师人去攻打賀龙、叶挺部队。一九四一年黃紹竑还曾經和顧祝同合謀过皖南事变。由于他的堅定的反革命立場和杀人不眨眼的殘暴手段，他得到蔣介石的青睞，在国民产統治时期一直飞黃騰达。黃紹竑的一双手是沾滿了人民的鮮血的，在他的屠刀下，不知道有多少人家破人亡。

一九四八年冬，住在香港的民革主席李济深和其他一些民革成員要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当时黃紹竑还特地赶到香港劝阻李济深北上，要他到李宗仁，白崇禧当时占据的武汉去主持大計。以后因大局已定，黃紹竑馬上搖身一变，混到革命队伍里来。在革命队伍里，黃紹竑仍然戴着革命的假面具，暗地里繼續干着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勾当。整风开始以后，黃紹竑更是乘机活动，阴險地向人民射出他的冷箭。

人民是寬洪大量的，只要黃紹竑真能承認錯誤，改过自新，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以贖前罪，人民可以不究既往。但是，如果黃紹竑繼續頑抗，坚决与人民为敌，人民的耐心也将是有限度的。

(1957年7月9日工人日报)

对黃紹竑的假檢討提出質問

民革广西省委会召开扩大座談会

右派分子黃紹竑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我的錯誤

和罪行的檢討”七月十六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以後，民革廣西省委會在七月二十六日召開了一次擴大座談會，對此進行了討論，一致認為黃紹竑的這個檢討是欺人之談，投降而不繳械，沒有接觸到具體問題和思想問題。不僅想蒙混過關，並且還向共產黨和全國人民放了暗箭。與會的人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對黃紹竑的發言逐條進行了駁斥。

所有人的發言，都駁斥了右派分子黃紹竑把一切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都推到“認識不夠”上面，是極不老實的。他們說：黃紹竑在檢討里首先把自己戴上了很多人所共知的地主、官僚、軍閥的帽子；也口口聲聲承認所有右派言行是由於思想、立場產生的；把封建思想、資產階級思想、舊民主思想等毫不費勁一連串的說出來；但是，當接觸到具體的問題時，這也推到認識不夠，那也推到認識不夠。在幾個概念的名詞下面，把實際的思想掩蓋起來。大家問道：

“他抹殺成績，擴大缺點的目的是為什麼？顯然是想挑撥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但是他却用‘沒有体会到任何政府也不能把好事一吋办完，时常存着求全責备的思想’來推開了。他在解放后就害怕群众，仇恨群众，对五大运动进行攻击，就是具体表现，但他却没有把他的作用說出來。”他們說：

“他明明是替反革命分子呼冤，却用‘無異’二个字來推托責任。他數次來信尋找國民黨反動軍官、偽軍長李本一的下落，說要替他要求大赦，這用‘無異’二字可以推脫得了嗎？”大家繼續指出黃紹竑在檢討中，把對肅反鬥爭的攻擊，認為是“對肅反運動的重要性和繼續性認識不夠”；“對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認識不夠”；對成立廣西僮族自治區的問題，僅戴上了一个大汉族主義的帽子。談到自己的歷史罪

惡，只說是“很大”，而具體的則一件沒提。他們說：“黃紹竑在廣西、浙江、湖北欠下了多少血債，鐵案如山，却一筆帶過。”而黃紹竑與林希翎，謝昕等人的關係，也輕輕用不了解情況和沒有涉及政治問題來輕輕撇開，這都是不能令人容忍的。他們說：“黃紹竑自解放以來，就進行了一系列的反黨反人民的活動，到處找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岔子，攻擊各項政策，與政治面目不清的人勾勾搭搭，到處散布反動言論，並不能說是一時的或是偶然的，而是有他一定的目的和企圖，而黃紹竑却把他隱藏在他靈魂的深處，不敢見人，避而不談；只草草交代就想混蒙過關，並且還裝出可憐的樣子，想博得不明真相的人對他的同情，是非常可惡的。

與會的人，都一再揭發右派分子黃紹竑的陰險面貌，揭發他一貫的政治野心，認為：“黃紹竑是一個陰險狠毒的人，只要達到他的個人目的，什麼都可以做出來。過去起家之時，暗害馮葆初、陸某，手段毒辣，一九二九年他和李白匪幫在衡陽與蔣匪作戰失敗，退回桂林。將軍隊改編，因得不到第一把交椅，就拂袖而去，投靠蔣幫。到偽國大競選時，又當李匪宗仁的參謀。”馮瑛說：“黃紹竑為了個人目的，是不擇手段的，他過去在廣西，蔡振雲已無人無槍，他還要搞掉了才甘心。”馮瑛還揭發“黃紹竑為了個人目的，不惜向法帝國主義者取媚，在一九二九年，法帝國主義者的領事在龍州與凭祥之間被殺，而黃紹竑為了表示效忠，不問青紅皂白就把十三個無辜的農民殺害，不久又殺害一些農民。”李任仁說：“黃紹竑是非常陰險惡毒的，過去與楊永泰、張群等政學系的人物勾結，專耍手段。從他對反革命分子的态度上也可看出來。反革命分子對政府不滿，有罪也是

不服的，但若有人替他“申冤”，他們一定很舒服，而黃紹竑就想得到這些人的歡心。”呂劍聲質問說：“黃紹竑和右派勾結，到處放火，指示譚悟吾，謝昕等人進行活動，他做下這一系列的罪惡，他的真實思想到底是什麼？沒有暴露。不暴露思想的檢討，算是檢討嗎？”他說：“黃紹竑一向就不滿足他的職務，有個人政治野心！”

與會的人揭穿了黃紹竑在他的檢討中所耍的陰謀花樣。說他不僅沒有向黨和人民低頭認罪，反以播弄、推卸為能事。在檢討中，還沒有忘記向共產黨和人民進攻，放出幾支暗箭。如黃紹竑在檢討中說：“我錯誤的反黨意見，已構成了反黨的罪行。”他們申斥說：“黃紹竑就無異說他的罪行僅由於他提了意見，而不是其他。”他們問道：“難道共產黨和全國人民是隨便加罪於你的嗎？這是對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污蔑。”

參加座談會的有民革廣西省委和專職幹部共十六人，民革中央常務委員、廣西省常委李任仁也帶病出席了座談會，座談會由民革廣西省委會主任委員呂集義主持。與會的人最後都一致提出，要求民革廣西省委建議民革中央，要黃紹竑再作交代，把真實的思想和計劃交出來，不要再耍花樣。

（1957年8月7日廣西日報）

聲討右派分子黃紹竑

民革南寧市委召開成員大會

七月二十五日民革南寧市委員會全體成員和所聯系的

社会人士六百余人，开大会声讨民革成员中的右派分子黄绍竑。

大会驳斥了右派分子黄绍竑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我的错误和罪行的检讨”。吕集义在发言中指出：黄绍竑处处把他的右派反动言行说成是认识上的错误，而不是有意识、有计划的，更不是有什么阴谋目的的，如把夸大缺点、抹杀成绩说成是“没有体会到任何政府也不能把好事一时办完。”归结到“时常存着求全责备的思想”；在对待肃反问题上的检讨又说成是：“对肃反运动的重要性和继续性认识不够”和“对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认识不够”，并把他为反革命分子喊冤说成是“无异为反革命分子喊冤”而不是真正为反革命分子喊冤。吕集义说：尽管他戴上了一顶一顶的帽子和承认他地主军阀的思想，但是在检讨中却没有接触到实际问题和思想问题，也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罪恶。他问道：“黄绍竑生活在新中国，身居人大常委，了解全面情况，还不知道工作的成绩吗？‘求全责备’这个心肠并不坏哩！可是把人民政府和其他封建王朝、资产阶级统治者等量齐观，这是为了什么呢？”他认为，黄绍竑招认是出于“认识不够”，他就企图在“认识不够”的烟幕下开脱他的罪恶！这不仅是故意的混淆视听，而且还是猖狂进攻的表现。黄绍竑是知道国民党不会替人民办一件好事的，那时不是流行一句话说国民党“好话说尽，坏事做尽！”他偏要这样说这是“认识问题”。吕集义认为黄绍竑几年来在各地视察的唯一任务就是专门找党和政府的岔子，企图抓辫子，作为向党进攻的本钱，这种处心积虑是大家共见的。去年民革广西省党代会开会，民革中央曾指定他做大会的监选人，但

是他等不及两天就坚决要到桂林去“视察”！为什么那么急于要去呢？黄绍竑关心的是什么事呢？他关心的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缺点和偏差。所关心的是什么人呢？原来是反革命分子。这就是他的专门职业。黄绍竑口头上虽承认他的历史罪恶很大，却一笔带过，一点事实都没有说。与林希翎和谢斯勾搭问题的交代也漏洞百出，不但没有说明真相，反而多方辩解，推得一干二净。陈汝明在发言中也申斥黄绍竑的谬论，他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只要生长有眼睛、耳朵的人都会知道的。我是卫生工作者，不说别的，就以广西省的情况来说，广西全省从一九五〇年起，没有发生过一例霍乱病人，在解放前天花是死亡人数很多的一种传染病，但经过解放后几年的努力，从一九五四年起到现在，全省范围内已几乎绝迹。至于解放后卫生机构和病床的增加，更是有目共见。他们要求民革中央责令黄绍竑重新再作检讨，认真认识自己的反动言行。

应邀出席的南宁市烈属代表雷成，和民革成员黄梦年、李如杰等，控诉和揭发了黄绍竑的罪行。雷成说：黄绍竑制造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惨案，被杀害的烈士在南宁市就有周仲斌、雷沛涛、雷天壮、陈立亚、梁六度、罗子卿、张胆、莫大、梁西元、林汉泉、阮锦、何福谦、高孤雁、邓哲、周国杰、冯阴西等人，还有受严刑酷讯和家破人亡的更难以数计。烈属梁锡元当时带着年纪七八十岁的祖父翻山越岭到处躲避黄绍竑的“通缉”。他说，黄绍竑这次的检讨是虚伪的。

黄梦年在发言中揭发了黄绍竑在一九二七年，以第八路总指挥的反动身份，指挥部队和共产党南昌起义后南下的部

队在广东三河壩、潮州、汕头、陆丰等地作战，在战事结束后，黃紹竑屠杀了大批的战俘，他說：黃紹竑对反革命的犯人大談人道，而他本人就是違反人道主义，沒有人性的兽类！

李如杰在发言中說：去年黃紹竑到广西視察时到处打听反革命分子和他們家屬們的下落，找寻他們所謂“冤獄”的材料，在檢查茅桥監獄以后，又利用各种手法散布“要多給犯人以人道待遇”，煽动在押反革命分子抗拒改造的情緒，現在反革命罪犯都拿黃紹竑“多給人道待遇”的話来作为他們抗拒守法的擋箭牌。犯人申訴的文件从去年十二月到現在短短的半年內几达八百件之多，他說：这是黃紹竑为反革命分子張目的后果，也就是黃紹竑反动言行的罪証。

(1957年7月31日广西日报)

讓黃紹竑回来看見事实吧

严 正

右派分子黃紹竑的反动言論傳到了他的家乡——容县黎村区黎村乡（前叫珊瑚乡），引起了該乡农民的极端憤恨，他們用自己亲身的体会痛斥黃紹竑的謬論。

許多农民都說：黃紹竑說肃反搞糟了，造成許多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这簡直是無理的污蔑。解放前，黎村乡是黃家的官僚地主的天下，全乡一百零六戶地主恶霸中，黃紹竑的一派宗亲就占了一百零四戶，他們过去仗着黃紹竑当“官”的势力，横行霸道，搶、杀、擄、掠、奸淫妇女無惡不作，搞

得家家雞犬不寧。貧农韦煥文說：黃紹竑的父亲起屋时，强占农民李陈生的地，迫得李陈生住矮屋。黃紹竑的哥哥黃天澤强奸了馮姓农民的女兒，一个月后又赶走她。黎村乡农民都說，造成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正是黃紹竑自己。他們还認為：政府在处理反革命分子沒有錯，是貫徹执行政策的。六十三岁的老人严进賢和何忠以黎村乡的例証來說明这个問題。在镇压反革命时，黎村乡群众紛紛检举过去压在他們头上的地主恶霸和反革命分子，政府根据群众的要求，仅仅将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憤的首恶分子枪毙了二十二名。如反革命分子黃浩芳（黃紹竑的侄子），以黃紹竑做靠山，解放前在乡里無恶不作，解放后組織“青年軍”，杀害了和联乡的农会主席黃桂南和十多个無辜农民，在群众的要求下镇压了。当时本着“首恶必办，胁从不問，立功贖罪”的政策，对罪恶小一些的都沒有杀，而經政府教育后釋放了八十六名，劳动改造二十一名；黃紹竑的宗亲黃苡芳窩匪、济匪罪恶很大，政府沒有杀他，劳改后仍在麓容农場工作，連老婆都帶去了。黎村乡的地主在土改后，同样分得一分土地、房屋，几年来，政府对困难的地主也給以一定的照顧，該乡五保戶中有四戶是地主，这次夏荒中得救济的地主就有二十戶。黃可芳（已枪毙）的老婆叶紹范在去年政府介紹她去北京当英文教师。何忠說：象这样的事，恐怕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仁政吧！

黎村乡的农民举出大量事实，說明解放前全乡二千多农民受苦受难的情景，和解放后生活改善的情况，有力駁斥了黃紹竑說“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缺点偏差是主要的”的說法。全乡二千多农民要他回来看一看他的亲人是不是被冤屈

了，看看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是不是提高了。如果黄紹竑还不及早認識自己的罪惡和錯誤，全乡的农民坚决和他斗争到底。

(1957年8月9日广西日报)

北京师大生物系学生要求民革中央彻底 追查黄紹竑包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七月六日上午举行第十四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在民革组织内开展以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的决定。

在今天的会议上，民革中央副秘书长楚溪春还宣读了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研究班全体学生写给民革中央小组的一封信。信上说，他们在报上看到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揭露的黄紹竑的阴谋嘴脸，尤其是看到黄紹竑说“学生欢迎葛佩琦，因为葛佩琦在学生中有群众”以后，非常气愤。黄紹竑这种说法，是对中国人民大学全体同学的诬蔑。从他们学校最近举行的一次反对葛佩琦反社会主义谬论的签名活动就证明，除了黄紹竑所钦佩的得意门生林希翎之类的几个右派分子以外，没有一个学生是葛佩琦的群众。这封信要求黄紹竑老老实实向人民交代，否则将自绝于人民，被人民抛弃。

然后，楚溪春又宣读了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学生给民革中央的一封信。信中说，北京师范大学最近在反右派斗争中，揭露了鹿怀宝、谢昕两个罪证确凿的反革命分子，而

鹿、謝正是黃紹竑為反革命分子“申冤”名單中的兩個。這封信要求民革中央應徹底追查黃紹竑的一切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反對黨的領導的活動；要黃紹竑徹底交代為什麼為現行反革命分子鹿懷璧、謝昕等申冤？他們之間有什麼關係？

(1957年7月7日人民日報)

地方國營廖平農場職工駁斥黃紹竑

(廣西省地方國營廖平農場第一次職工代表會議全體代表)

正當中國共產黨號召全國民主黨派人士幫助黨整風，以加強黨的領導，加速社會主義建設的時候，我們是感到非常愉快的。可是黃紹竑等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借大放大鳴，煽起一股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逆流，企圖破壞整風，顛覆政權，這是六億人民所不容許的。

黃紹竑說肅反錯了，使“多少人家破人亡，流離失所”，是誣蔑誹謗共產黨的謬論。現就我們農場的職工來說：解放前後我們違反了人民，走錯了道路。但是共產黨、人民政府把我們挽救過來。在我們服法期間，通過勞動改造，使我們不但養成了勞動習慣，且學會了一定的生產技術，成為自食其力的公民。我們從來是吃得飽、穿得暖，每個人的家屬與人民受同等的看待，有的子女還得到黨的培養，入中學、大學讀書，畢業後給以適當安排。我們在刑滿後願意留在農場就業的，政府按照技術、工作能力給以工作。在工資待遇上，根據按勞取酬、同工同酬的原則發給，大大改善了生活待遇，在政治地位上，我們刑滿釋放後，於去年十二月間，

宾阳县选举人民代表时，我場职工蔡松亭等两名还当选为代表，进行兵役登記，不少职工光荣地获得了兵役証；更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加入了工会，变成了工人阶级。在場新結婚的职工有八十八人，并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人接来家屬共同参加生产，过团聚生活，建設社会主义。我們农場职工从亲身体会中認為，黃紹竑所謂“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是沒有根据、不切合实际的，不值得一駁的。在国民党統治时期，在黃紹竑割据广西时期（一九二六至一九三〇年）他曾先后与范石生、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反动头子为占地盘，爭权夺利，造成連年混战；横征暴斂，奸淫燒杀，多少良民死在刀枪馬下，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叛变革命，大屠杀共产党员。黃紹竑在广西，把無数共产党员和良民捉来不审、不訊、不問，即施以毒刑屠杀，难道黃紹竑就忘記了嗎？黃紹竑曾发行大量鈔票，搜刮民財，那时候，民穷財尽，路有餓殍，才真正是“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我們要是沒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對我們的教育改造，是不会有今天幸福生活的，我們深深感謝共产党給予我們的改造机会。这是我們的亲身体会。黃紹竑竟大喊过去肃反錯了，我們的回答是：“共产党對我們的教育改造並沒有錯，并且把我們从黑暗中引向光明！”

我場召开全場职工代表會議，我們全体代表为了建設祖国，为了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絕不容許任何人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有絲毫誹謗和侵害，我們表示，要團結在共产党的周圍，向黃紹竑右派分子作無情的斗争。

（1957年7月7日广西日报）

肃反沒有搞糟

黃可祐

黃紹竑說“肃反搞糟了，使許多人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這簡直是無理的污蔑。就拿我的家來說吧；我父亲是个反革命分子，在镇压反革命时，因为他坚持反革命立場被枪决了。他本人的死是罪有应得，并没有什么冤枉。看看我的家散了沒有，在表面上看来好象是散了，但是，我們沒有流离失所。我和姐姐、二弟、四弟在南宁，大弟在容县专区，三妹三弟和細嬋在武汉，但他們都在学校里讀書和参加了政府机关工作。細嬋在解放前原是个姨太太，終日擦脂抹粉不劳而食，現在居然也在武汉保健站做接生員了，共产党来才改造了她。我和姐姐还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大弟也是共青团員。我們的生活都过得相当好，我們热爱新中国，热爱共产党。我們不需要平反。

共产党对階級敌人就是要狠，这是斗争原則，是人民的愿望。要不然就不能领导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反革命分子要想人民对他的寬恕，只有洗手不干反革命，誠心誠意投靠人民。否則，象黃紹竑那样，恐怕人民也难以容忍！

(1957年8月9日广西日报)

黃紹竑公事皮包里的秘密

張 德 永

聽說右派分子黃紹竑的公事皮包里藏有秘密資料，他曾經利用這些資料向人民政府和共產黨施放過不少的明槍暗箭，而且還利用這些資料來裝備過象林希翎、謝昕一類的右派分子。黃紹竑的公事皮包內到底藏了些什么秘密資料呢？雖然這還是一個諱莫如深的問題，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探索的。

去年年底，黃紹竑到廣東來視察政法工作，前後八天，他到了廣東省和廣州市的檢察院、法院和司法機關，召開了律師座談會和陪審員座談會，參觀了勞改工廠、看守所、公安展覽會和法庭開庭情況，提審了四個犯人，調閱了一批案卷。黃紹竑在這一系列的活動中，充分暴露了他不可告人的視察目的和動機。

黃紹竑視察政法工作，不是為了改進和提高這一工作，而是為了找人民政府和共產黨的岔子，為了替反革命分子找“鳴冤”的材料而來的。因此，他對那些被視察的單位採取了極不信任的態度，採取各種方法，甚至不擇手段地攫取他認為有用的資料。黃紹竑對公安工作“很感興趣”，要視察公安工作；但是公安厅三次請他去聽匯報，他卻不去，而且從所接觸的人員中多方探取有關公安工作的缺點和錯誤。他到廣州市第一看守所參觀時，坐下只問了兩句：“犯人吃得飽不飽？”“有沒有打罵犯人現象？”立即下到監倉去訪問

犯人。他与犯人直接談話，問遍了三个监仓沒发现問題，便又提审了四个犯人。在提审国民党特务分子庄玄时，他对这个特务說：“我也是国民党的人，你有甚么思想搞不通的，你看了大陆各方面，共产党有甚么不好的，都可以对我講。”請看，黃紹竑已狂妄到何种地步！

黃紹竑在視察中对于反革命分子处处寄予同情和关怀，对他们的一切如同身受，稍有“不平”之处被发现，他便要挺身而出为他们“鳴冤”叫屈。他在看守所中看見圖書室理論書籍多于文艺作品，便立即对工作人員說：“應該多購置一些三国志、水滸傳等旧文艺書籍，这也有教育意义的，理論書籍枯燥無味，犯人不会爱看的。”这真不知到底是黃紹竑自己的看法，还是犯人真正的思想，我想这很可能有共通之点。在劳改单位中，有些部門因过份強調人道主义待遇，将犯人供給标准提得太高，引起附近群众的不滿，向公安部門提了不少意見。黃紹竑了解到这种情况后，不是建議有关单位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現象，而是強調工作人員要去說服群众。

黃紹竑在參觀看守所时，曾經同那些从香港偷运炸葯、定时炸彈、縱火器等，准备于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在广州发动暴乱的蔣帮特务分子談过話，表示对这些人很关心。

黃紹竑如果真正关怀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應該認識到懲办反革命和一切罪犯的严重意义。但是，黃紹竑剛剛參觀了看守所，就在广东省檢察院对工作人員說：“我認为一般監督工作比起訴工作还重要。因起訴的案子罪恶危害不一定都很大，但干部違法乱紀常常造成很大的損失。强迫命令所造成的恶果也是很大的，这是面而不是点。”言外之意，是

干部的某些違法亂紀現象比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的危害還要大，所以監督干部比懲辦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更為重要。更進一步試探黃紹竑內心深處的意見，那豈不是要將專政的鋒芒從敵人的頭子轉移到革命工作人員中有缺點和錯誤的人的頭上？黃紹竑的思想如果一朝實現，社會主義、共產黨和廣大人民的利益便歸于烏有了。黃紹竑想得真美，只不過這是他這類右派分子過於天真的幻想罷了。

黃紹竑在視察中對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非常重視，而對工作中巨大的成績却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他聽匯報、看總結，對錯誤和缺點要反復推敲，追查到底。這當然是允許的，而且也受到各有關單位大力支持。但他對成績部分卻很少過問，甚至不聞不問。他參觀展覽政法工作成績的“廣東省公安展覽會”時，竟一溜而過，請他提意見，他只笑笑。這那象一個專為視察政法工作而來的人民代表呢！不過這些情況，與黃紹竑個人的立場、觀點是完全一致，不足為奇的。無怪乎他在中央統戰部邀請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上大放厥詞，說“成績是主要的、偏差錯誤是個別的”這種說法，是“宣揚成績，掩護錯誤，忽視錯誤”。在黃紹竑眼中，中國人民獲得解放就是錯誤，實現人民民主專政更是錯誤。黃紹竑和全國人民對成績和錯誤既然是站在兩個這樣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看的，當然就會得到不同的結果。

（1957年7月17日人民日報）

黃紹竑这样“視察”浙江司法工作

奚 琳

一貫打着“維護法制”“保障人權”招牌，儼然以“包青天”自居的黃紹竑，去年來浙江視察司法工作，他干了點什麼？我在此向大家揭露。

我是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幹部。當時是具體接待黃紹竑等人民代表和做記錄工作的。

在跟黃紹竑接觸的短短幾天中，最使我奇怪的是：他總是不看成績，只找岔子、只找缺點，然後又惡意地把我們工作中的一些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缺點和偏差，誇大為根本的、全面的、系統的錯誤，甚至故意歪曲事實，顛倒是非。

黃紹竑到省高級人民法院來視察，我院吳院長曾實事求是地全面地向他匯報了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中的審判工作情況。但是，他對此似乎絲毫不感興趣，有時還表現得很不耐煩。大概他認為匯報的反正是“成績是基本的，偏差和錯誤是個別的”公式罷了。於是，他就千方百計地來尋找司法工作中的缺點，反復地問：“未決犯長期關押的情況有嗎？”

“為什麼有些刑事案件的被告不上訴？”“上海有時形成強迫群眾來旁聽，這現象這裡是否有？”“和檢察院互相制約還不大夠吧？”黃紹竑苦心孤詣地尋找司法工作的缺點，更露骨地表現在分別召開的陪審員和律師座談會上。在陪審員座談會上，他對於工作情況的匯報，同樣地表現出很不耐煩，中途插言說：“希望知道你們對檢察院、審判員有什麼

意見，与审判員合議時有什么不同意見，希望多談一些。”要求陪審員只談缺點，不談成績。一听到个别缺點，就馬上旁追細問，詳細地記在他的小筆記本上。在律師座談會上，这种表現更明显了，他連續地發問：“檢察院的起訴書有些什么缺點？”（這問題二个律師回答得还不滿足他的胃口，接連着又問：“我剛才發問的是檢察院起訴書中有無加油加醋，扩大事实情况？”）“这次鎮反逮捕的反革命，有沒有不构成反革命罪的？”“对土匪是否引用懲治反革命條例？”“你們有無发现不应逮捕的反革命？”“經過辯護，看看法院有沒有判重了案件？”“审判員、陪審員执行审判程序的情况怎样？态度怎样？有無使犯罪者在开庭造成恐怖的心理？”

特別應該提出的是：黃紹竑在發問時，往往还別有用心的先套了一个框子叫你回答，来达到他否定成績、夸大缺點的的目的。如对法院判決的刑事案件中大部分被告不提出上訴這一事实，只要稍有常識的人，就会知道这主要是法院判案正确、被告認罪服法的結果。是一个正常的現象。可是黃紹竑就不是这样看，他認為一定要被告大部分上訴才是正常現象。否則，就認為法院有毛病。因此，一听到大部分被告不上訴，他就發問：“不上訴的原因，据我們到其他地方了解，有三种原因：①被告怕上訴就被認為抗拒，要从严、加刑，不敢上訴；②里弄干部或村干部阻止被告上訴；③审判人員沒有把上訴权利向被告交代，甚至要犯人不要上訴，說什麼上訴还是一样，甚至反而要加刑。这三种原因哪一种多？”大家看，他就是这样事先做好了框子，要我們承認。当时，有些陪審員就提醒他，不要忘記被告大部分不上訴主

要是法院判得正确。他却仍然固执地反問人家：“难道判的案子百分之百都正确嗎？”可是誰也沒有講过法院判案百分之百都正确这句话。不过絕大部分案件判得正确倒是事实。黃紹竑不但不把大部分刑事被告不上訴，看成是法院的成績，反而閉上眼睛說凡是被告不上訴就是法院有毛病，并把个别的缺点夸大为全面的原因，最后写入了他的“視察报告”，这种顛倒黑白的做法，究竟居心何在？

同时，黃紹竑找缺点时专门找錯判、重判，对有沒有錯放、輕判，却提也不提，問也不問，这又是为什么呢？

黃紹竑在“視察报告”中，还故意歪曲事实，肆意中伤。这里只要举两个例子就可以說明。（一）他在“視察报告”第四点中指出：“杭州的陪審員反映：‘刑事案件合議时，我們先划定量刑的框子：五年以下、十年以下、十五年以下、十五年以上，再根据被告的罪行及其对社会的危害性等，考虑放在那一个刑期的框子內’。有的陪審員就認為这样基本上可以不錯，至于三年与五年上下差不多。我們認為，对于刑期这样的不严肃考虑和机械掌握，是十分不妥的，必須糾正。”乍看起来，問題确实严重，但是，实际情况怎么样呢？視察报告中引用的杭州市陪審員的反映就是杭州市江干区陪審員王惜英在座談会上的发言，但是引用得断章取义，把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句“然后再研究决定判几年”有意識地漏掉了。并且無中生有地紧接着加上一句“有的陪審員就認為这样基本上可以不錯，至于三年与五年上下差不多”。添上的这句话，当时根本没有哪个陪審員講过（这点可以請黃紹竑拿出記錄来对証）。硬要說有的話，那就是黃紹竑自己在座談会最后发言时講的。他說：“我們在

上海时，看到合議时，有的主張判三年，有的主張五年，为了不找麻煩，認為三年、五年差不多，就不爭論了。”請問黃紹竑，为什么把你自己的发言硬要說成是陪審員的講話，并用来歪曲人家的原意呢？我認為：象陪審員王惜英反映的当时江干区法院合議时采取的这种办法（即先研究套框子，再在框子里研究决定判几年），在当前国家刑法沒有公布，陪審員业务不够熟悉的情况下，比一上来就合議判几年更能正确一些，这样做，也正說明了他們对量刑的严肃慎重。可是，經過黃紹竑的“偷天換日”，漏掉一句和加上一句，竟成为誣蔑法院干部“对于刑期不严肃考虑和机械掌握”，用来大做反面文章的“根据”了。大家看，这种用心和手法是何等的險惡！（二）他在“視察报告”第二点中指出的：

“据浙江省法院反映，有一个学生为了考大学，伪造文凭被判刑三年，他們認為下級法院沒有結合具体情况分析，所以判的太重了（現已糾正）。”这一点更是血口噴人，毫無事实根据。我院根本沒有反映过这个案子，实际上是他与周鯨文等視察監獄时，听这个“学生”自己講的，事后馬上就向我提出，要我院調卷审查。經我院調閱全卷进行認真审查的結果，問題不是那么回事。原来这个“学生”叫楊青，他在一九五一年参加人民銀行工作后，一九五二年即貪污，并企图强奸女同志；以后，又八次偷盖公章，伪造証件，以騙取荣誉和地位待遇；一九五四年九月参加燒毀旧币工作时，又乘机貪污旧币。因此，一九五五年二月即被清洗回家。而楊犯仍不知悔悟，一九五五年六月私刻了平阳县人民政府公章，窃取县人民政府信封十个，伪造証件，七月在温州投考大学未录取，又伪造历史和冒充是志愿軍团长楊智烈士的兒

子以及是榮譽軍人等證明文件，在九月到省教育廳要求保送去北京大學學習，結果被發覺，由杭州市中城區人民法院判刑三年。很明顯，對這樣一個一慣招搖撞騙，偽造證件，擾亂社會治安的政治騙子，判處三年徒刑是恰當的。所以，我院根本不準備改判。不料黃紹竑在“視察報告”中竟一變而說成是我院“反映”，並說“現已糾正”，這又是根據什麼呢？

既然提到視察監獄，我們不妨來看一下黃紹竑是怎樣視察監獄的。大家知道，他曾經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充任偽浙江省主席多年，有很多反革命分子是他的老同事、舊部下。他却不避嫌疑地利用視察身份，裝出“包青天”和“抱不平”的樣子，“深入”到獄房中和很多反革命罪犯談話，要他們“提意見”。據說有一個原來在他充任偽浙江省主席時當過科長的反革命分子，老遠看到他一進監獄，就奔過去向他“訴苦”，要他代為“伸屈”，他也確實照辦了。監獄經過他視察以後，邪氣上升，有些反革命分子氣焰囂張，不認罪服法，甚至抗拒管教。有不少人事後還寫信給這位“青天”，要他“伸冤昭雪”。黃紹竑確實獲得了反革命分子的喝采，有的反革命分子還公然叫囂：“將來我有選舉權，一定投黃紹竑一票！”這裡可以看出：黃紹竑究竟是什麼“青天”？是替誰“打抱不平”？他這樣做的目的真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視察時，黃紹竑還發表過一些謬論。他對我講過：“處理反革命案件時，‘過分’強調了‘坦白從寬’，會使被告產生‘你要我講什麼’，‘我就講什麼’以至擴大自己的罪惡事實，可以說是誘供；‘過分’強調了‘抗拒從嚴’，可

以說是變相的逼供。”請看，這是多么惡毒的謬論。大家知道，去年上半年黃紹竑來視察時，正是大批反革命分子在黨和國家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折罪、立大功受獎”的政策感召下，紛紛向政府投案自首，棄暗投明，重新做人的時候，敵人內部已呈現了空前的分化瓦解。而黃紹竑竟對這一政策這樣不滿，甚至惡意地謾罵為“誘供”、“變相的逼供”。其實，仔細一想，也是不足為奇的。這一政策挖掉了黃紹竑的“牆腳”，大批反革命分子的投案自首對有着滿腦子反黨反人民思想，有着復辟資本主義制度幻想的黃紹竑是有多么痛心的事實，他不敢公開反對黨和國家的政策，只好把自己打扮起來，裝着維護“法制”的樣子，到處叫囂，企圖從實際上來否定這一正確的政策。

就這樣，黃紹竑在他視察了我省和上海的檢察、審判工作以後寫“視察報告”時，明明是想抹殺人民司法工作的成績，誇大人民司法工作的缺點，把人民司法工作說得“陰森黑暗”“慘無人道”，但是為了不過分地暴露他的狐狸尾巴，不得不在他的長達六千餘字的“視察報告”的開頭，以七十五個字籠統地“肯定”一下成績，接着就着手大做反面文章，惡毒地進攻人民司法工作。我認為，如果要講“公式”的話只有黃紹竑這種總結法，才叫“公式”——惡毒的破壞性的“公式”。他的目的就是用來進攻人民司法工作，給司法幹部潑冷水，挑撥人民司法機關和羣眾的血肉聯系，助長反革命分子的氣焰，混淆社會視聽，來達到他反黨、反人民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1957年7月6日浙江日報）

黃紹竑譚惕吾是怎樣“視察”

上海司法工作的

吳宏澤、卓啟民

請看，黃紹竑、譚惕吾是怎樣視察的。

我們是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上海市司法局的干部，具體接待人民代表視察的聯絡工作。

黃紹竑、譚惕吾來上海視察司法工作時，總是不看成績而是挑筋剔骨地找缺點，而且找缺點也只找合乎他們胃口的缺點，然後拿來肆意誇大和曲解。我們對他們這樣的視察，曾產生過一些疑問；現在看起來，問題比較清楚了。應該把它揭發出來。這對於幫助人們了解黃紹竑和譚惕吾的右派面目，是有好處的。

大家知道，解放以前，上海是革命與反革命鬥爭非常激烈的地方，是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長期統治全國的基地；解放後又是敵人潛伏和派遣特務活動的重點地區。這些情況，黃紹竑、譚惕吾都是應當知道的。但是在他們視察時，從沒有聽到他們問起上海反革命活動情況怎麼樣，反革命分子肅清的徹底不徹底。他們對這樣重大的敵我鬥爭問題似乎絲毫不感奮越，相反地，他們倒是苦心孤詣地尋找司法工作中的毛病。他們在檢察院視察時就問“發現法院錯判案件多少？”在法院視察時就反復地問：“檢察院有無違反逮捕拘留條例羈押人犯的事情，有沒有不該起訴的起訴了？”在律師和陪

審員的座談會上，則又露骨地片面地問法院和檢察院有什么毛病。

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本來兩個方面都有，即錯放、輕判和錯判、重判的兩個方面。人民代表來視察，幫助我們發現工作上的錯誤、缺點，這是每個工作人員最所歡迎的，但是我們不明白為什麼黃、譚兩代表從來沒有問過一句“有沒有放錯過壞人，輕縱過反革命分子”的話，這究竟是什麼用心呢？

我們知道，法院幹部向人民代表匯報工作是完全採取老老實實的態度的，既談工作中的成績，也實事求是地匯報缺點。黃紹竑在去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上大做其文章的幾個案子，原是檢察院、法院的同志和律師同志向他匯報的，並且是已經糾正或者正在糾正的案子。如果不是別有用心的話，應當很容易理解這正是司法機關相互制約作用的體現。一個機關發現另一個機關的缺點、錯誤，通過監督得到糾正，這原是正常的現象，正顯示出貫徹了“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精神。但是，黃紹竑聽到了這些案件之後卻加以夸大和歪曲，把人民司法機關刻畫成是“陰森黑黯”，“一團糟”。居心何在，真是“路人皆知”了。

視察時，黃、譚都發表過一些荒謬的論點。黃紹竑在視察座談會上曾這樣講過：“即使罪該判處死刑的反革命分子，如果他有家庭生活負擔的話，判了死刑，政府還要救濟其家屬，是否合算，是否合乎國家利益？”請看，這是多么“仁慈”啊！這不能不問一下，他如此關心的“人”，究竟是什麼樣的人？黃紹竑的本意不是很清楚了么！據黃紹竑的“理由”，是罪該處死的反革命分子也不要殺，罪該判刑的

也不要关，因为与其要救济其家属，还不如释放出来的好啊！如果我们按照黄绍竑的意思去办事，人民一定会问：这是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呢，还是让反革命和刑事罪犯逍遥法外呢？黄绍竑口口声声所讲的“法制”，是什么样的“法制”呢？他的“法制”只不过是保护反革命，助长反革命气焰的“法制”罢了。

谭惕吾来上海视察时，也曾检查了几件案子。在我们汇报中，他凡是听到被告人已经检查从宽释放，就不问究竟，笑容满面地点头称是；如果听到原判如何正确，她就态度一变，把汇报人质问一番。不仅如此，她还不惜为反革命分子辩解。她对一个尚未来得及破坏而已被破获的重大现行派遣特务分子被判处了重刑，说是判得过重了，理由是：“还没有开始活动。”另一个反革命分子曾多次“控告”革命志士和进步人士，罪行显著，解放后又拒不交代，法院依法判处徒刑，而谭惕吾竟也热衷于辩解“这不是有意陷害，而是一般职务行为。”意思就是不能负刑事责任。明明法院判处他徒刑不是因为他担任过伪职，而是因为他有迫害革命志士和进步人士的罪行，解放后又隐瞒拒不交代，如果按照谭惕吾的逻辑，所有反革命分子的罪恶行为，不是都可以说成是“职务上的行为”，都可以不负刑事责任么？怪不得他们要异口同声地反对我们说：“镇压反革命的成績是主要的”了。

据我们知道，黄绍竑在上海视察时，曾经指名抽调了一些案卷。这些案卷的被告人，有的是他的老同事，旧部下，或者是与他有联系的人。按理，他应该避避嫌疑，而他偏偏调这些案卷，为他们讲话。这分明是企图利用视察追求不可

告人的目的。

与其他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不同，譚惕吾在視察中态度极端傲慢，大有国民党官老爷的架子。我們曾亲眼看到法院的院长、庭长向她汇报工作时，她盛气凌人，指手划脚，用教訓的口吻說話：“不要你講，讓他講！”有些問話很象审問犯人的样子。为什么譚惕吾对人民的司法干部要采取这样橫暴的态度呢？

黃紹竑过去曾經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一个省的当权者，在他当政的时期，这个省有無數革命志士、进步青年被屠杀、被迫害。譚惕吾也是当时与黃紹竑在一起的当权人物。那时候，他們是否想起过这些被反革命屠杀、迫害的革命志士、进步青年的“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呢？現在他們忽然把自己打扮起来，公然出来高談“法制”与“人权”，岂不是有点可笑而且可恶么？事实上有不少反革命分子亲密地称黃紹竑为“季寬先生”，并都拉上反动旧关系要求黃紹竑替他們“鳴冤”，“平反”。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就写信給他这样說：“解放前当您主持浙江省时期，我是某县的司法小首长，曾和您見过几次面……今年你視察滬、浙司法，发表卓見，無任欣佩。”并說：“你現在也身居要职”，因此要求黃紹竑为他“在北京呼吁”“翻案”。黃紹竑不仅替反革命分子到处叫囂，反对人民鎮压反革命，据說他还到处“放火”，故意說被鎮压的反革命分子中有90%以上都是旧軍政人員。誰都知道，人民政府鎮压的是有罪惡的反革命分子，絕不是旧軍政人員，他这样說法，無非是想挑撥他們和人民政府的关系而已。

王造时、陈仁炳、楊兆龙等則是用同样手法，搜集材

料，发表謬論，开座談会，制造謠言，专门来丑化司法机关，说什么“人治”啦，“無法可依，有法乱依”啦，与黃紹竑等遙相呼应，向人民民主专政的司法机关进攻。这些右派分子活动的后果，确实已經助长了反革命分子气焰，模糊了人們的視听。不少反革命和刑事罪犯直接写信給黃紹竑請他帮忙。有的一面写信，一面囂張地公开对抗，不服管教。一个判刑的地主恶霸在劳改工地煽动其他罪犯翻案，代写申訴書。罪証确凿的罪犯也無理地要求改判，汉奸要求发还被沒收的财产。經過宽大处理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对工厂、里弄的积极分子，寻事生非，無理取鬧。右派分子不遺余力地向司法机关进攻，对基层干部潑冷水，但是人民司法机关是与人民群众血肉相連的，我們的基层干部是經過鍛鍊的，不是他們攻得垮的，但是我們还必須提高警惕，团结一致，坚决打碎右派分子的进攻，制止坏分子的無理取鬧，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奋斗！

(1957年6月29日解放日报)

黃紹竑保护的什么人？翻的什么案？

人民日报記者集体采訪

黃紹竑以全国人民代表的身分，在去各地視察工作的时候，或从人民来信之中，专门收集反革命案件的材料，替反革命分子叫冤，攻击我国公安司法工作和肃反运动。近年来，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会議等會議上，先后列举了一些案件，指这个是冤獄、指那个是破坏法制；今天

要為這個申冤，明天要為那個翻案。最近，我們就黃紹竑提出的那些案件，訪問了人大常務會辦公廳和公安、司法部門的負責同志。事實證明：一、黃紹竑所提出的案件，決不止於本月十五日他在人大會議上承認的謝昕和劉茂林兩案，而是十二案。二、十二案中，一案根本是查無其事，兩案是刑事案例，另一案即所謂劉茂林案，事實同黃紹竑的說法完全相反，也未構成司法案件。除此而外，其餘八案都是反革命案件。三、就在這八個反革命案件中，也沒有一案冤獄，而且好些案犯都得到了寬大處理。現在將這八案公布於後，讀者不難看出黃紹竑究竟保護的什麼人？翻的什麼案？

“北京師範大學的肅反搞壞了”嗎？

黃紹竑反復地提出：北京師範大學的肅反搞壞了，某某女青年因為從香港回來，而在肅反中被鬥被捕，現在還沒有適當的安排。又說當時監獄調動這個女青年的獄室，是害怕人民代表去視察。他聲稱要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身份，去北京師範大學檢查肅反工作，為她“申冤”。

黃紹竑所指的這個女青年，就是七月三日北京師範大學師生員工大會上揭露的反革命分子謝昕。

根據記者向公安部門了解，和七月七日本報刊登的材料，這個案件的情況如下：謝昕又名謝瑞珍、謝珍，福建福州人。早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間，謝昕就同國民黨軍統局福建調統室主任王調勛同居，并同軍統特務嚴靈峰、張逸舟等來往密切。一九四七年去香港。據謝昕對人說，她回大陸以前，原國民黨內調局福建省調統處處長賴文清，曾經打算介紹她去菲律賓工作，因故沒有去成。

一九四九年九月，謝昕來北京，經全國學聯介紹入北京師範大學俄文系學習。入學後，她學習一貫鬆懈，經常外出跳舞，深夜不歸，並在一九五〇年在政協文化俱樂部跳舞場中結識了黃紹竑。

由於她的學習成績低劣，曾數次留級，讀了八年大學，目前仍是四年級學生。她絲毫不改正自己的言行，却無耻地誣蔑學校有關人員對她“迫害”，并向各處發信控告。

肅反運動前，謝昕有三次寫反動標語，如：“人心似豺狼，殺人不見血，我要與這批豺狼狗彘作鬥爭”。“這是什麼世界啊！這麼黑暗啊！連講道理的地方都沒有了”。“我要殺人！”等等。肅反運動開始後，謝昕的反動言行，被她的同學揭發。她心懷不滿，買了兩把菜刀，企圖殺害領導學習的黨員副小組長袁行桀。因此，北京市公安局於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依法逮捕了她。

謝昕被捕後，在預審口供和親筆供詞中，都承認了上述事實，並表示願意改悔。北京人民檢察院根據寬大政策，免予起訴，於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將她釋放回校。

但是，謝昕回校後繼續無理取鬧，並到市人民檢察院推翻原供詞，要求修改原結論。同時先後給黨政負責人和校內負責人寫信提出控告和很多極不合理的要求。如要求自逮捕日起按政府一級科員待遇發薪金，後又改變要求自一九五五年起按講師待遇補發薪金，並要求立即先支五百元；要求遷居校外養病，每月津貼二十元房錢。領導上對這些無理要求進行的批評，謝都拒絕接受。

整風運動開始以後，謝昕又借這個機會向共產黨猖狂進攻，貼出所謂“血淚控訴”的大字報，要求還她名譽，並在

自由論壇大会上重述了她的所謂“控訴”。当大家以事实反駁了她的言行以后，她又去找帝国主义国家記者，申訴她被“迫害”的情况。并对人說：我要到香港去反革命，我要向帝国主义宣傳，向联合国宣傳有关我的一切。

黃紹竑和謝昕相交很久，对她的情况，絕不会一無所知，可是，却硬要顛倒黑白，提出只是“因为从香港回来，而在肃反中被斗被捕”的誹謗，并說什么“师大的肃反搞坏了”。黃紹竑为什么这样偏袒謝昕呢？至于監獄調換犯人獄室，也是极平常的事，黃紹竑却抓住这件事情大做文章，这又是什么居心呢？

所謂可能成为“冤沉海底”的案件

黃紹竑曾經提出一件所謂可能“冤沉海底”的“冤案”。这事曾在七月五日本报讀者来信栏中有所揭发。

这件案子的被捕者是河北省龙关县干部业余学校教員韓國屏。韓國屏一九四六年在太原工业学校讀書的时候就参加了国民党，担任过国民党区分部和区党部書記，在太原街头和电影院里进行过反共的宣傳。

一九四七年韓國屏进入北京輔仁大学，又同特务分子邢連仲勾結，破坏学生运动、迫害进步同学、毆打班會主席、破坏班會組織。輔仁大学的进步学生范光斗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后，一些进步学生曾进行营救。韓國屏、邢連仲多次追查进行营救的同学，迫使这些学生离开了北京。一九四八年秋冬之間，国民党在北京大肆破坏共产党和进步团体的地下組織，和韓國屏同房居住的进步学生楊紹汉、高起飞等被迫离开北京后，韓國屏立即去搜查他們留下的行李，向保存

行李的人进行恫吓，追查楊紹汉等的下落。韩国屏的这些反革命破坏活动有被害人的检举，也有同他一道进行反动活动的人的揭发。

解放以后，韩国屏的反革命活动并没有停止。一九五〇年，韩国屏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兼任街道成人夜校教员。这一期间他曾经阻挠青年王淑贤参加军干学校和阻挠教师陈幼和入团，并公开散布各种反动言论。因此，一九五一年八月和十月先后被这两个单位开除。一九五二年韩国屏在察南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工作，仍不断散布反动言论，还会调戏妇女。该校全体教师曾联名检举韩国屏。一九五二年秋，韩国屏被调到龙关县干部业余学校，在这里，他又公开煽动学生罢课，并拉拢部分教员排挤该校教导主任。

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龙关县人民政府逮捕了韩国屏。韩国屏在逮捕关押期间还在犯人中进行煽动破坏。经过龙关县法院公审，判处韩国屏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其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龙关县法院对韩国屏的判处稍重，撤销了龙关县人民法院的原判，将他放释。

对韩国屏这个历史上一贯进行反革命活动、解放后以至关押期间继续进行破坏的反动分子，进行逮捕并给以一定的处分是完全应当的。至于一时判刑较重了也不能说成是什么“冤案”。可是，黄绍竑只听信韩国屏的家属的“申诉”，就一口咬定如果不及时纠正原判，就可能“冤沉海底”，黄绍竑究竟是替谁在叫冤呢？

是“莫須有”呢？还是真的反革命？

黄绍竑在广西视察时曾经要求提前审理反革命分子栗青

岩案。并且轉述粟青岩的話，說政府对他的处理，是“莫須有”的事。

粟青岩是广西省农业厅技术員。解放前充当了邵阳三青团指導員、湖南省伪新聞处專員等。他曾負責审查长沙市各报新聞报道，发现刊有进步言論的时候，便开具名单报伪省府查封。在他的迫害下，长沙市“实践报”被查封三次，“晚晚报”被查封一次。

长沙解放后，他仍坚持反动立場。在他写給伪湖南省主席黃杰的报告中說：“本府西迁时，曾奉前秘書长楊績蓀面諭留到第二批迁移，不意程（潜）、陈（明仁）二逆忽于八月四日宣布叛变，职深受党国教育及总裁人格熏陶，良知未泯，且苦附逆，惟因长、邵間战事胶着，交通断絕，加之匪逆監視，無机逃脫，迄今始輾轉逃出虎口”。

一九四九年粟青岩繼續写发反动文章，被长沙市公安局逮捕。一九五〇年九月，司法机关本寬大政策将他釋放，后即投考湖南农学院。在学习期間仍造謠惑众。在肃反运动中，經省檢察院批准，再次将他逮捕。

黃紹竑要求提前审理的另一案件是何治案。

何治，是一个反动的伪軍官，解放前曾任伪軍排、連长，少、中尉副官，伪警局額外督察、所长，南宁市伪警局突击队副等职。在任伪突击队副期內，于一九四九年十月間，何治曾亲率突击隊員包圍南宁师范学校，并逮捕我地下黨員和进步学生韦嘉魁、黃波洪、邓日紅、韦明新等。解放后，留用期間，何治于一九五〇年曾私卖軍用电话机一架；并且替伪警局督察长唐蔭昌、伪警丘鉄雄銷售左輪手枪两枝，分得銀洋十元。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何治被吸收到南宁市工程队工作，在此期間，还在散布变天思想，造謠破坏。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日經南宁市檢察院批准，依法逮捕，經市法院判处六年徒刑。

讀者可以看出，逮捕以上两个劣迹昭著的反革命分子，难道还是“莫須有”的嗎？黃紹竑急急忙忙地要求“提前审理”这两件案子的动机是什么呢？

不辨是非、別有企图地叫“屈”

黃紹竑还会提出：有一个八十三岁的国民党員，被政府怀疑有反革命行为，关押了二年。这个人兒子在某海关工作，有关方面說他包庇反革命的父亲，也被判刑三年。現在，父亲的問題已查清，沒有問題，但是兒子还在服刑中。因此他又要求为他“伸冤”了。

据記者訪問广州市公安机关后了解：这个八十三岁的国民党員叫董群輔（原名董福开）。辛亥革命后，他就曾在官場活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后，当过貴州省第十区行政督察專員、江西省清党委員、保安司令部少将參謀和伪县长等反动职务。抗日战争期間，当过伪国民政府军委总司令行營法官。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四月，一直任伪南康县參議長。在这个期間，他曾經霸占过农民的漁塘、土地，騙取人民錢財，借故毆打工人。江西解放后，他偷跑到广州，一直沒有交代他的历史問題。广州市公安局在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經市檢察院批准逮捕了他。

在預审中，董群輔承認了一部分罪行，同时因为他已年过八十，丧失了进行反革命活动的 ability，决定不再追究，一

九五六年十月十五日由广州市法院釋放。

董群輔的一个兒子叫董来英，基督教徒，原在广州海关工作。另一个兒子叫董来震，是反动軍官，因反革命罪行被判刑后尚在劳改中。在肃反运动中，董来英包庇反革命父亲和他的弟弟，并且利用傳道的机会，造謠生非，散布“社会主义反对神，要不惜代价爭取出路”等煽动性的言論。当地公安机关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依法逮捕了他，判了三年徒刑。

董群輔在历史上有严重的反动行为；解放后又拒不交代，这样的人是真的“沒有問題”嗎？董来英包庇反革命的父亲和他的弟弟，散布反动的言論，难道也能容許嗎？当然，据此而判处三年徒刑，是比較重了一些，是可以加以糾正的。可是黃紹竑却別有企图地为反动分子叫屈，攻击人民司法机关沒有法制，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場說話呢？

袒护拒不坦白的反革命分子

黃紹竑还曾經指責公安机关办案粗糙拖延，并举例說，一个女犯的母亲告訴他，她的女兒被捕九个月了，还不知道被关押在什么地方。

这个当时被扣捕的女犯叫吳昶艺，原是上海市第一医学院的学生。一九四九年秋天，吳昶艺在上海震旦女中参加了“圣母軍”反革命組織。一九五〇年，她作了“圣母軍無玷之母支会”的副会长。一九五一年，上海取締“圣母軍”的时候，她拒不登記，并且在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先后两次燒毀“圣母軍”反动組織的“軍旗”、“軍卷”和“圣母軍手冊”等罪証。一九五三年，在反帝爱国运动中，她还

毆打、辱罵过爱国教徒馮玉貞、王愛華等人。一九五五年“肃反”的时候，她曾經把上海第一医学院某些有問題的天主教徒向組織上作交代的情况，“汇报”給反革命分子朱洪声（天主教神甫、已逮捕），并且阻止严而良（教徒）坦白交代問題。上海市公安局根据她的这些罪行，于一九五五年九月三日报請市檢察院批准，把她逮捕。

吳初艺被捕后，曾先后經過十八次預审。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以前的十五次預审中，她始終拒不坦白認罪；一直到当年八月底进行第十六次預审的时候，她才陸續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并且写了五次認罪笔录和悔过書。因为她的罪行已經查証屬实，公安局便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四日預审終結后，送市檢察院起訴。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考虑到她已有悔悟認罪表現，便在当年九月二十二日判決免于刑事处分，教育釋放，回原校繼續求學。

对这个十五次預审都不坦白的分子，黃紹竑竟然加以袒護。而对公安机关的耐心的工作，却指責是拖延。这是为什么呢？

吳初艺在押期間，曾經向家里要过五次东西，其中第二、三两次，是上海市監獄写信通知她的家屬，由她的母亲自己送去的。時間是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和十月底。这就是說吳初艺被捕后，其家屬早已知道了她的下落了，黃紹竑的說法也与事实完全不合。

多方为反革命分子凌宪揚辯護

黃紹竑用以攻击人民公安、司法机关的另一案件，是凌宪揚反革命案。

凌宪揚是国民党員，孔祥熙的亲信之一。当过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业务專員、中央銀行秘書、上海虬江碼頭經理、中央信托局印刷廠經理、滬江大学商学院院长、中央印刷廠總經理、国民党接收專員、滬江大学校长等。

一九三六年一月，凌宪揚受了孔祥熙的密令，参加“国民党軍事委员会赴德考察团”，与希特勒政府签订“中德貿易密約”。抗战开始后，法西斯德国从多方面帮助日本軍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全国人民憤激万分，而凌宪揚却仍繼續在香港負責採購矿产和农产品运往德国，直到一九四〇年止。

一九四六年春，凌宪揚任伪中央印刷廠總經理期間，該厂所屬上海各厂工人因要求提高工資而罢工，凌派人通知伪警察局进行鎮压，毆打工人，并當場將二十名工人逮捕。事后，又經凌批准將领导和积极参加罢工的一百二十五名工人开除。一九四八年底，伪财政部拟將中央印刷廠的机器全部拆运台灣，凌宪揚又勾結伪上海社会局局长吳开先鎮压抗議拆运机器的工人，終于將該厂三分之一的机器运往台灣。

凌宪揚任滬江大学校长期間，曾积极破坏該校的学生运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滬江大学爱国学生为抗議国民党特务無辜杀害浙江大学学生于子三，准备罢課并进行追悼。凌召开紧急校务行政會議，决定通知全校教員准時上課，倘有标語或牆报出現即行撕毀。他还亲自指使該校总务长馮家声通知伪江灣警察分局，派便衣警察准备鎮压。事后，他再次主持校务會議，决定給予领导和积极参加此次学运的爱国学生吳恒基等人以警告处分。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九日，滬江大学爱国学生推派代表支援同济大学学生“爭民主、反迫害”运动，他决定給予参加此次学运的爱国学生何穆齋等九人

“停学”处分，王宗基等十二人“試讀”处分。同年六月，全国人民掀起了反对美帝扶持日本的爱国运动，滬江大学学生也紛紛組織社团、出版刊物，进行宣傳。凌又借口違反所謂“校規”，勒令取締进步学生的社团組織，禁止出版进步刊物，并将积极参加这次运动的爱国学生余素貞等十五人开除。

根据以上种种罪行，上海市公安局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将凌宪揚逮捕。但又考虑到他犯罪在解放以前，被捕后的几年中，尚能坦白認罪，因此司法机关决定給予寬大处理，由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于今年二月十三日宣布不追究刑事責任（凌宪揚已在今年一月四日先行保釋在外）。

可是，黃紹竑却抓住法律程序方面的一些問題来向人民公安、司法机关进攻。他說：第一，一九五一年逮捕凌宪揚以后，长期不审不判。又說“我到上海要調閱案卷，可是案卷不在法院，也不在檢察院，最后在公安机关調出来”。第二，他說：“审讯中間他（凌宪揚）教会有多少派，問他德国法西斯是怎样組織的，校务會議开了多少次等。这样要做到坦白彻底就不行了。”

据記者向上海公安机关了解：凌宪揚被捕后，为了弄清他的犯罪事实，仅公安机关即进行了数十次审讯，計一九五一年六次，并令他写了五次自白書；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也进行了多次审讯，并有凌的亲笔供詞二十二次；一九五四年作过四十三次审讯笔录；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五年九月，又先后提审七次。这怎么能說是长期不审不判呢？至于凌案的全部案卷，在黃紹竑去上海檢查时，已經在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并未积压在市公安局。

此外，上海市公安局在預審中，只追問過凌憲揚有關校務會議討論鎮壓學運的情況以及有那些人參加等問題。同時又鑒於凌曾於一九三六年奉命去德國會見希特勒簽訂“中德貿易密約”，在抗日期間仍一直和法西斯德國派在重慶的代表進行貿易聯繫，所以曾經問過他在抗日期間和法西斯德國勾結的情況，並不是問他德國法西斯的組織。這也和黃紹竑的說法完全不一樣。

用各種借口企圖翻案

黃紹竑還曾經提出一案說：“有的被告對審判員的問話不能體會，必須律師幫助他們。例如有一個被告對起訴書說他曾任日本翻譯，下鄉掃蕩，刑拷農民等罪行全部承認。但經律師與被告談話後，發現他當翻譯時，年僅十三、四歲，因代日軍燒飯，學會日語，在日本人拷打農民時要他傳話。律師從被告有利的材料分析辯護後，該案也重新偵查處理。”

據上海司法機關調查的結果，黃紹竑所指的這個案件，是上海李慶余案。李慶余充當日寇翻譯的時間，已經查明是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當時他的年歲是十四週歲到十八週歲，不是“年僅十三、四歲”。

李慶余在充當日寇翻譯期間，在農民姚福秀等五人被日寇殺害時，李慶余每次都在場當翻譯。另一個被害農民王淑英，則是由李慶余親自搜捕的。其次，在日寇燒毀民房時，李慶余也曾積極參加，他並依仗日寇勢力，敲詐群眾。但在解放後，李慶余沒有交代這些罪行。

李慶余在他的家鄉——江蘇松江县是有民憤的。群眾曾

要求人民政府将他捕回原籍处理。一九五五年九月上海市公安局曾将他逮捕，在审讯中李庆余供认了以上事实。其后，上海市检察院和上海市公安局经过研究，被告所犯罪恶均在解放前，且当时年岁较轻，属历史罪恶，被捕后还能坦白认罪，经上海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决定对李庆余案不予起诉。于一九五六年四月释放，回原单位继续工作。

请律师给被告以帮助，这当然不是坏事。但是读者在对证了事实以后，就不难看出黄绍竑在此案中所提出的请律师问题，只是一种借口，而其基本精神，则是根本推翻此案。李庆余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在，他自己也供认不諱，难道这能够翻案的嗎？

从以上八案中，读者可以看出黄绍竑所要保护的，几乎完全是历史的或现行的反革命分子。他所极端仇视的，则是人民的司法和公安机关。黄绍竑对司法和公安机关的攻击，决不是为了要建立革命法制，相反地，却是蓄意诽谤，用以削弱和攻垮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重要的机构。这也就是黄绍竑向社会主义的进攻，是他的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必须百倍警惕，打退右派分子的这一场进攻！

(1957年7月19日人民日报)

黄绍竑包庇反革命分子谢昕

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员工大会揭露

黄绍竑在今年三月全国政协会议政法小组会上说，北京师范大学的肃反搞坏了，某某女青年（即指谢昕）因为从香

港回来，而在肃反中被斗被捕，現在还没有适当的安排。他还声称要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身份，去师大检查肃反，为她申冤。事实真的是这样嗎？七月三日下午，师大六千余师生员工，揭发反革命分子謝昕罪行的大会，就是对黃紹竑誣蔑肃反运动的有力駁斥。

謝昕是师范大学俄語系的学生，福建省福州人。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十月，在福州与軍統福建省調統室主任王調勛同居。一九四八年去香港。一九四九年九月从香港到北京，由全国学联介紹来北京师范大学。当时因解放初期，学校制度不严，未經考試就允許謝昕入学。入学后学习一貫松懈，經常外出跳舞至深夜才归校。一九五一年某日她在政协文化俱乐部跳舞中結識了黃紹竑。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前及肃反运动开始时，謝昕公开在墙上写反动标語，謾罵新社会为黑暗世界，并預謀行凶杀人，因此被捕。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謝昕亲笔供詞摘要如下：“同班同学夏瑞璩問我，那一天你說要杀人，要杀誰？我照实說出是要杀領導学习的黨員小組長袁行架。因此，我就到西四牌樓买了一把刀回来。我回来还没有五分鐘，領導肃反的小組同志刘忠敏、陈国眉来要我的刀，我不肯在同学们面前拿出。沒有想到他們立即叫同学来搜查我的东西，就把我的两把刀在床里拿去了，后来我就被捕。鉄哑鈴是我企图自杀用的，后来季处长来了解情况时我很生气，丁教务长很粗暴，我要用鉄哑鈴砸死他的两个孩子。我現在已經犯法了，我現在要来接受党和政府給我的懲罰。我希望政府再給我認識罪惡的机会”。

北京人民檢察院根据謝昕以上罪行，本应提起公訴交付法庭审判，但因她承認罪惡，并有悔改表現，便根据寬大政

策，免于起訴，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釋放她回校。謝昕回校后並沒有悔改，相反地大吵大鬧，提出許多無理要求，并立即推翻原案。学校按檢察院免于起訴決定書出布告公布对她的結論时，她立即把布告牌玻璃砸碎，撕掉布告，并歪曲事实，到处控告，同时也給黃紹竑写信，黃紹竑还当她的面表示要为她“喊冤”。她还威胁学校，要开大会賠礼道歉，恢复她的名誉。她声称不达到要求就到处写标語，还要向全世界人民呼吁。整风开始初期，謝昕又借这个机会向党猖狂进攻，貼出“血淚控訴”大字报，要求还她名誉，并在自由論壇大会上再次作了“血淚控訴”，企图争取广大学生的同情。当大家以事实反駁了她假造的控訴以后，謝又貼出第二張“血淚控訴”大字报，說旧的血淚未干，学校又在制造新的阴谋。謝自知学校沒有她造謠誣蔑的市場，还在帝国主义国家記者的面前献媚，同样以歪曲事实，造謠污蔑的言論，来誹謗我們的新社会。

在今天的大会上，六千余师生員工，听到反革命分子謝昕的罪行，以及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猖狂进攻的事实后，群情激怒。在会上十七名师生員工代表憤怒指斥謝昕为屢教不改的反革命分子，是大学学生的敗类。因時間关系，沒有在会上发言，递到主席台上的紙条就有一百多張。他們一致要求党本着“有反必肃，有錯必糾”的原則，对屢教不改的反革命分子要严加懲罰，不允許漏掉一个反革命分子，要求学校开除她的学籍，并要求檢察机关重新处理她的案件。最后全体大会还一致推选十九位师生員工代表，携带大会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的信，控訴黃紹竑支持包庇反革命分子謝昕。

（1957年7月7日人民日报）

黃紹竑是反革命分子的代言人

林 永

黃紹竑一直裝作社會主義法制的維護者。事實上，正如陳其瑗先生說的，他是處處在為反革命說話。

今年三月，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上，黃紹竑有一篇發言，曾經舉出河北省龍關縣一件“冤沉海底”的所謂“冤”案。現把我知道的真實情況寫出來，請大家看看這是不是“冤”案？黃紹竑究竟是在替什麼人“鳴冤”？

黃紹竑所說的這件案子的被捕者，是河北龍關縣幹部業餘學校教員韓國屏。韓國屏一九四六年在太原工業學校讀書的時候，就參加國民黨，先後擔任國民黨區分部書記和區黨部書記，組織宣傳隊，自任隊長，在太原街頭和電影院裡進行反共滅共的宣傳。一九四七年韓國屏進入輔仁大學後，同特務分子邢連仲等勾結在一起，破壞學生運動。邢連仲是國際間震雷震遠和軍統特務刁化仁領導下的“華北剿總戡亂先鋒隊地下工作第二隊”的書記。韓國屏在輔仁大學，經常以“共匪”、“八路”威脅進步同學，監視進步學生的活動。班會改選時，韓國屏企圖掌握這個組織，進行干涉，他的陰謀被群眾識破，沒有達到目的。但是韓國屏和邢連仲等一群反動分子並不甘心，就用威脅同學退出班會、寫信恐嚇進步學生和毆打班會主席，搜查宿舍等無恥手段，破壞進步的班會組織。

輔仁大學進步學生范光斗被國民黨反動政府逮捕以後，

楊光烈、陸志芳即進行營救。韓國屏、邢連仲就追查營救范光斗的人。這樣，楊、陸兩人不得不離開學校。韓國屏在輔仁大學的這些惡跡，現在有當時被他迫害的人的檢舉；也有同韓國屏一起進行這些反動活動的人的揭發。

解放以後，韓國屏曾經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工作，還兼任某街頭成人夜校的教員，因為他繼續散布各種反動言論，在一九五一年被他所在的單位開除。到河北龍關縣工作後，還是不斷散布反動言論，污蔑黨和政府，並且耍流氓手段，玩弄女學生，行為極端惡劣。人民政府即於一九五五年八月予以逮捕，並由龍關縣人民法院判處徒刑八年。韓國屏家屬不甘心就找黃紹竑申“冤”。黃紹竑不問情況，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催促河北省處理。在再三催促之下，河北高級人民法院於一九五七年撤銷龍關縣人民法院的原判。當地人民群眾極為不滿，龍關縣民主人士高德陵說：象這樣的人都教育釋放，以後誰還檢舉反革命？黃紹竑却在政協會議上說這是個“冤案”。

現在要問問黃紹竑，象韓國屏這樣的反動黨團骨幹分子，要不要逮捕，該不該判刑？你身為人民代表，對反革命如此關心，對人民群眾的意見却不加理睬，偏要說“冤沉海底”是什麼道理？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報)

駁斥黃紹竑為反革命分子“申冤”

田 德 民

黃紹竑在今年三月十二日在政協會議上作為一個特別的

例子指責了所謂河北省龍關縣判處的一個案件，這就是反革命黨團骨幹分子韓國屏案件。黃紹竑的發言，登在三月十四日人民日報第三版的左上角上。他的發言的根據就是從去年七月起三番五次向他寫信和找他反映情況的被告者的家屬，並根據被告者家屬反映的情況嚴厲指責龍關縣法院判處韓國屏反革命分子八年徒刑，後經省法院改為教育釋放，“如果不是遇到認真實行監督的高級法院的話，就會得不到國家寬大處理，或者是冤沉海底了”。

請各位代表特別注意他的“冤沉海底”了這個結論。是否冤沉海底了？我現在將韓國屏在解放前後破壞學生運動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主要情況，介紹給各位代表分析。

韓國屏，男，現年三十歲，學生成份，山西沁源縣人。原在北京上學，後於一九四四年轉到太原市工業學校學習並在該校加強國民黨，擔任區分部書記和區黨部書記。在校內組織宣傳隊，並親任隊長在街頭、電影院從事反共講演，出版壁報，進行“統一中國就要滅共”等反動宣傳。

一九四七年韓國屏入輔仁大學歷史系學習，不久即與該校特務分子邢連仲（邢系國際間諜雷振遠、軍統特務刁化仁所領導的匪“保密局公教青年救國團”及“華北剿總戡亂先鋒隊”地下工作第二隊書記）、反動分子龐廣善等勾結在一起，操縱反動分子和落後學生，打擊和迫害進步同學，破壞學生運動。迫害我地下革命組織人員楊光烈、陸志芳、楊紹漢等人。有一天韓國屏等將楊光烈騙至他們的宿舍，在十幾反動分子的包圍下，向楊光烈武力威脅，幾乎動手，幸遇一常懷光同志想法將楊光烈拖走，才未遭意外。

韓國屏經常混在同學中，監視進步同學的活動，對進步

同学的書櫥、書包進行秘密檢查。輔大進步同學范光斗遭國民黨逮捕後，楊光烈、陸志芳等掀起營救運動，班中同學寫了營救信，韓國屏、邢連仲等曾兩次向楊光烈追問寫信人的姓名，致使楊、陸等人被迫離開北京。

北京解放後，韓國屏於一九五〇年四月到八月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當練習生並兼任東單象鼻子中坑成人夜校教員時，阻撓青年參軍入團，乘機散布反動言論，夜校學員王淑賢（女）要參加軍事幹部學校，韓國屏到王淑賢家中，偽裝善良，利用王淑賢母疼女兒的心情，對王淑賢母親說：“女孩子參軍不好，工作地點又遠……”，又對王淑賢說“你要考慮，別後悔，你媽向我要人我可不管，你媽上了吊怎麼辦？”就這樣阻止了王淑賢參軍。韓在夜校同學中造謠誣蔑說：“共產黨巧使人，黨團員是玩陰的（男女混雜的意思）。”韓國屏聽到教師陳幼和要入團的消息後，便對陳說：“你真不知道團的厲害，團是不許和非團員結婚的，入團以後可就沒自由啦。”班內女團員到街道團支部學習，韓對錢蘭英同學說：“還不是一塊胡鬧。”

韓在郊區借宣傳抗美援朝的機會，對農民說：“你們看見了地主的下場，將來你們生活提高了也會掉下來的……”，破壞土地改革。

根據所的这些反動表現，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和領導夜校的東單區文教科，於一九五一年八月和十月分別將韓國屏開除。

一九五二年韓國屏到察南工農幹部補習學校後，並不安心教學，繼續進行破壞活動。韓的宿舍是住在老鄉家裏，他當着房東老太太撒尿，違反群眾紀律，引起老鄉反感，老鄉

当即向校方反映了他。此事引起广大师生的不满，全体师生联名告发了韩国屏。教育机关为了进一步帮助韩国屏转变，使他参加了一九五二年秋季教师思想改造的学习，并将他调离察南文化补习学校，分配到龙关县干部业余学校工作，一再等待其觉悟，但韩国屏到龙关后仍不老实，挑拨同事闹不团结，煽动学生向领导和政府对立，拉拢教员常元度说：

“你要往我这边倒，让杨松年（教导主任）下台。”

根据国家惩治反革命条例，韩国屏是反革命党团的骨干分子，是国民党区党部书记，不仅在解放前破坏学生运动，进行反革命活动，解放后韩国屏在过去的肃反运动中沒有彻底交代自己的罪恶，仅交代了一般问题，隐瞒了主要情节，并坚持反动立场。在数年的教学过程中，仍不老老实实的承担人民教师的义务，经常散布反动言论，破坏革命工作。龙关县于一九五五年八月依法逮捕了他，经过深入教育和对破坏事实的多次查证，经过预审和公判调查，韩对全部破坏事实仍沒有正确认识。对于这样的反革命分子，龙关县逮捕韩犯是正确的，也是应该判刑的。

我要问黄绍竑，韩国屏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受到人民政府的教育和应得的处分是“冤沉大海”了吗？请你不要一味的为反革命分子“申冤”，还是听听人民的意见吧！你的指责是沒有根据的。我认为你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代表反革命。人民不能允许你借着人民代表的身份，来包庇反革命分子。

我们一定要继续贯彻“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彻底粉碎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进攻，坚决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步向社会主义。

（1957年7月16日人民日报）

民革成員何任生指責黃紹竑

右派分子黃紹竑是我們民革的領導同志之一，他可能領導我們向何處去？代表我們什麼利益？鑒於他最近的言論，不能不使我們特別注意。

我們要問黃紹竑，是代表什麼人的利益？今年春天他來過南寧，按照民革的組織制度，就應該來民革南寧市委會報到，參加我們的組織生活，但是他竟不來，當時我們還以為他很忙，可以原諒原諒。現在我們才清楚，他確實是忙的，一個被判勞改的家屬，在他走后就曾經告訴我，見過黃紹竑幾次。黃交代她做報告以便帶到中央，為他“申冤”。這個“他”又是誰呢？原來是一個反共的師長馬振雄，又是黃紹竑的同鄉，親戚，嫡系舊屬；也可以說是他的政治資本。直到今天還在勞改，怎能不免“冤死狐悲腸欲斷，同聲一哭舊江山”。黃紹竑是代表這些人的利益，因為在他看來，這些人的利益就是他的最高利益——“主席，內政部長”。我們真要大聲疾呼，你在做夢了。就是勞改已成為新人的人，也會反对你代他們“呼冤”的。

(1957年7月7日廣西日報)

質 問 黃 紹 竑

劉 茂 林

在七月十六日的人民日報上，看到黃紹竑的發言（我的

錯誤和罪行的檢討)。他說：“我在政協座談會上根據一些人民來信，百之九十九都是反革命分子或其家屬的來信，或視察中所見所聞的事件，不加分析研究隨便反映，如反映……鐵道小學的劉茂林問題……。”這些話使我非常驚異。我和黃紹竑素不相識，我和我的家屬並沒有給他去信，他也沒到我校“視察”，為什麼他會知道“劉茂林問題”，而且拿到政協座談會上去“隨便反映”呢？所謂“劉茂林問題”又是怎麼回事呢？

解放以前，我在北京市立師範學校念書的時候，加入了三青團。畢業後到西直門扶輪小學工作，校中有個特務，我和他有些往來，解放前夕，他逃到南京去時，我曾送給他一雙球鞋。解放以後，我入了團。可是，我在三青團的活動並沒有交代清楚。和特務的往來也沒有提。加之我還有一些反動、糊塗思想。特別見到報紙上不斷揭發特務的案子，我深怕連累上我，開始恐懼起來。但是由於覺悟不夠，立場不堅定，因此，顧慮很多：怕母親着急，怕組織上不再相信自己，怕在群眾中失去威信，便不肯向組織上坦白，拖一天算一天。

當時，組織對我很信任，我擔任工會主席。可是，就是因為心裡有病，工作上總不安心，工作中沒有長遠計劃，好象隨時要準備着辦交代。回到家裡，見到大家快快樂樂，我又嫉妒又生氣，脾氣暴躁，也不和鄰居打招呼，不耐心幫助侄女溫課，侄女的牙齒壞了，也沒有心思帶她去治。飯總是匆匆地吃完，吃不出什麼味道，有富裕錢也不肯儲蓄，隨便用掉，因為對自己的前途沒有信心，不知道自己是個什麼結局，年青青的，對自己的愛人也有見一次少一次的感覺，真

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一九五五年暑假，开始了肃反学习。学习班特别召集党团员开了一次会，对党团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其中有“知情不报，开除党籍、团籍”的话。会后，我便利用休息时间，把自己的一些反动思想、糊涂思想写了出来，并进行了批判，同时交代了社会关系，又检举了一些本单位可疑的情况。可是对于三青团的活动，以及和特务的往来，并没有提，写好了就自动交了上去。在小组学习会上，也主动争取检查自己。大家对我的反动思想和糊涂思想进行了批判，我感到很不舒服，开始顽固地辩解。第一次会闹个不欢而散。这时组织上对我开始了帮助，同时由工作上开始启发我，说：“为什么工作做得不好呢？”我当时认为这样武断是不对的，我没有回答，只指着工会奖给我的钢笔叫他看，意思是说，工作坏哪里来的钢笔？给他软钉子碰。以后，组织上常找我谈话，我不但没有更虚心的检查，反而产生了对抗情绪，我有一种预感：对我的斗争难免了，我对于被斗的对象便开始表示同情，背后对他讲：谁斗错了谁负责。领导上和群众把我的表现和历史问题联系起来看，对我表示怀疑，便进行了小组斗争。暴风骤雨来了，我的恐慌样子，越发使人怀疑。他们的問題那样尖锐，立场那样鲜明，对我真是一个当头棒喝，使我猛醒。首先我感到需要清算自己的一贯的主导思想了。同志们热情很高，目的是要我交代历史政治问题，交代社会关系。我虽然采取了拒不坦白的顽抗态度，可是同志们还是继续分析，帮助，再分析，再帮助，又经过领导上的个别帮助，终于使我把所有的问题坦白出来了。

肃反办公室特别关心我的工作情绪，告诉我工作中要安

心。党、团的负责人，以及分团委，全对我进行了个别帮助，专门和我谈了思想问题，立场问题，讲得是那样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使我有好多收获。团组织还特别为我开了支部会，根据事实，帮助我把解放前后的言行，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最后还从各方面提出对我的希望，使我把过去的一切，整个清算一番。组织上对我一系列的教育，逐步提高了我的觉悟，坚定了我的革命立场。我感到这次运动中受到的教育，胜过了解放以后六年学习的总和。我认识到，组织是一贯关怀我的，组织并没有忘掉我，而我在很多方面是对不起组织的。后来，我的问题弄清楚了，作为历史问题作了结论，并没有给予行政处分，只在团内给予适当处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包袱彻底丢掉了，轻松愉快了，以后的问题只是争取撤销处分，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了。我开始积极起来。工作情况和肃反以前完全相反。工作塌实、安心，有长远的计划，效率也高了。和同志们关系更密切了，脾气也不暴躁了，对邻居也和藹起来了，能够系统地帮助侄女学习了，薪水也肯好好支配了，对孩子也疼爱起来了。总之，我看到了自己光明的前途，开始正常地生活了。

组织上对于我，也更加信任了。肃反以后，薪金给我评在二级，月薪增加了十四元，家中的经济，显然宽裕了。除了我的小学工作以外，又让我兼任中学班的历史课，参加保卫工作，担任教研组长，学习小组长。由于上级和同志们的帮助，使我的工作有了一些成绩，在一九五六年底学校评奖中，我被评上二等奖，得了奖金。我对学校的责任感也越来越强。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对他们弄清了疑点，做出了结论，使他们去掉了精神负担，便于积极工作。这无论对于人

民事业或者对于他们本人，都是有利的”，我亲身体驗到这是千真万确的。深深感到肃反政策的偉大和正确，感到組織的溫暖。我并没有象右派分子黃紹竑想象的那樣，和党对立起来。組織沒有錯，我也不冤，結論也不是“反革命”。对我來說，肃反是搞好了，而不是搞糟了。

黃紹竑为什么提出了“刘茂林問題”呢？他的妹妹是在我校工作，亲身参加了肃反，据她說是“同情”我，把关于我的事說了出去。恰好黃紹竑戴着有色眼鏡在到处寻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資本，他本能地“注意有錯必糾”和“为反革命分子喊冤”，便去“随便反映”“刘茂林問題”了。做为人民代表，“随便反映”四个字，交代得下去么？

(1957年7月31日人民日报)

揭发黃紹竑的罪惡历史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會議七月二日上午分組討論。在广西、安徽两省的代表小組会上，代表們揭露了黃紹竑反党反人民的罪惡历史。曾經同黃紹竑在戰場上斗争过二十多年的广西省代表黃榮，最熟悉黃紹竑的反党反人民的罪惡历史，今天他在小組会上說，黃紹竑在一个恶霸地主家庭长大，在广西他以殘暴聞名。一九二七年四月黃紹竑到南京参加了蔣介石召开的清党會議，在蔣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当天早晨，黃紹竑在南宁逮捕了九十名共产党员加以杀害。从这一年的四月到九月，黃紹竑在广西各地逮捕了成千上万的人，其中包括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进步群众，慘酷地加以屠杀。

黃榮說，一九二七年紅軍南昌起義後，黃紹竑起先派出他的­一個師去攻打賀龍和葉挺將軍的部隊，後來黃紹竑又自己率領兩個師兵力去攻打賀龍和葉挺部隊。黃榮還憤怒地指出，在一九四一年，黃紹竑曾同顧祝同合謀過皖南事變。

黃榮指出，黃紹竑過去是一個血債累累、堅決反共反人民的反動分子，解放以後人民寬恕了他，給了他為人民服務的機會，但他卻繼續反黨反人民。他說，黃紹竑今天回頭還不晚，只要深刻檢討，老實交代，人民還是會給他一條出路的。

廣西民族學院副院長韋章平說，大家知道，解放以前廣西的土匪是很多的，這對人民生活是一個重大的威脅。解放後經過鎮反和肅反運動後，廣西出現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空前安定的社會秩序。可是黃紹竑不願意看到這些，他在廣西視察時專找岔子，說這個鬥錯了，那個反革命分子處分重了。他對幾年來廣西省取得的偉大成績一概閉眼不看，充耳不聞，這是為了什麼？

(1957年7月3日人民日報)

控訴黃紹竑大批屠殺廣州工农羣眾

大革命時代工人 羅慎之 林紹奎 吳鵬

張振祥 梁廣林 梁嘉甫 李漢文

右派分子黃紹竑乘黨整風之機，發出反社會主義的荒謬言論，我們讀了非常憤恨。大家都知道，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幾年來，經過各種社會政治改革運動，和第一個

五年計劃的建設，使广大劳动人民都翻了身，在生活上也进一步获得了改善。但黃紹竑对这些明显的成績却感到不滿，硬說政府对待地主，对反革命分子的处理太过分。我們要反对他这种反动言論。

我們回想一下黃紹竑的反动行为吧！早在大革命时代，黃紹竑大批屠杀革命工农群众、学生及进步分子。当时我們在党的领导下，和罗少彦、陈勉恕、黃家直等同志搞工运工作，黃紹竑以伪广西省主席兼伪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宣傳部部长的职权，向我們进行利誘、威胁，企图收买我們作反革命的活动，但他的阴谋沒有成功，便乘一九二七年四月国民党进行所謂清党时，大批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骨干和积极分子，我們幸得工人的掩护才脫了險。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党领导工农紅軍曾一度解放广州，但被黃紹竑調兵包圍退出后，他又进行大屠杀，曾在一個深夜里，將所逮捕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用兵艦运出黃埔灘外，用大石墜入海中。

我們沒有忘記黃紹竑对广西人民的血腥屠杀，我們也要警告黃紹竑：人民的力量是偉大的，絕不容許你再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你应及早回头，交代你的罪恶活动，否則，人民不会再寬恕你！（1957年8月9日广西日报）

黃紹竑杀害革命人士罪恶重重

广西革命烈士家屬揭露

一九二七年被黃紹竑杀害的广西南宁市的革命烈士家屬

們，七月三日联名給黃紹竑写了一封公开信，表示不能容忍他对社会主义、对党的领导的恶意攻击，要和他斗争到底。

这封信写道：我們要揭露右派分子黃紹竑过去在广西的罪恶，使他認識到自己过去罪恶深重，体验到党和人民对他的寬大。

大革命时代，黃紹竑身任广西省主席、十五軍軍长、特派員和“清党”主任委員等职，广西“四一二”清党，是他一手主持的，虽然事隔三十年，但在黃紹竑應該是記憶犹新的。在三十年前，黃紹竑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遺志，杀害了我們的先人和許多革命先烈。他靠这一生的“得意杰作”，得到蒋介石的青睞，官居要职，飞黃騰达。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前夜，黃紹竑亲下密令大捕广西革命人士，仅在南宁被捕的共产党員、共青团員、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和妇女，就达千人以上。同年九月一日，黃紹竑在南宁枪杀了当时广西革命工作的主要骨干雷沛濤、周仲武、雷天壯、陈立亞、梁六度、何福謙、邓哲等十三位革命先烈，接着又在桂林、柳州、梧州、貴县等地公开、秘密地大量屠杀革命人士。我們要問：当时法紀何在？黃紹竑反而把今天的人民天下說成“暗無天日”，詆毀肃反“造成多少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他的这些反动論調，正好为他自己当日所作所为下了結論。肃反和鎮反打击了反革命分子，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巩固了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政府对認罪悔过的反革命分子是寬大处理的，反革命家屬生活困难者得到救济和介紹就业。而黃紹竑無視于此事实，肆意进行恶意攻击，夸大缺点，含血噴人。他为什么要为反革命分子作“包青天”？其居心何在？

信中接着說，黃紹竑是人大常委，曾兩次回廣西視察政法工作。優撫工作是政法工作的主要內容之一，但他來到廣西，從未訪問、接見過烈、軍屬。當他回北京後，烈屬寫信給他，要求他對在大革命時代在廣西犧牲的烈士們作個正確的評論（因為解放前，他在“五十年回憶錄”一書中誣蔑了革命先烈），但他至今拒不作復。他來廣西視察只是查查司法工作的檔案，在其中找岔子，為反革命分子呼“冤”。

信中最後說，我們革命烈士家屬向黃紹竑提出嚴重的警告：我們的親人犧牲在你手里，但在黨的教育下，我們認識到統一戰綫的重大意義，八年來我們對你總是抱著寬宏大量，既往不咎的精神，希望你能深省過往，重新作人，好好地為人民為社會主義事業老老實實工作，以贖前罪。但是你今天却“忘恩負義”，竟施展出這樣陰險的伎倆，來攻擊黨攻擊人民和社會主義事業。如果你不徹底悔過，將自絕決於人民。

在這封信上簽名的南寧市烈士家屬，有周君實、陳可夫、雷成、雷榮恩、羅啟拔、羅啟芝、周孝先、陳炳夷、馮永莊、林坤培、郭君濤、阮細妹、黃秀群、何福齡等十四人。

（1957年7月6日人民日報）

烈士家屬們憤怒控訴

黃紹竑的罪行

“我們要說話！”被黃紹竑殺害的烈士的家屬雷成在六

月二十八日代表广西省南宁市十多位在大革命时代牺牲的烈士家屬提出了他們的愿望。他說：“要分清是非！我們看見報紙上刊載了黃紹竑的发言和大家对他的謬論的駁斥，却發現了他奇妙的‘解釋’。作为烈士家屬，我們有权利提出我們的意見。”

六月三十日上午九时，这十多位在大革命时代被黃紹竑杀害的烈士的家屬，相約一起控訴了黃紹竑的罪行。

“黃紹竑說，肃反在全国範圍內不知造成多少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究竟是黃紹竑造成多少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呢，还是誰造成的？有人反对算老賬，賬是要算的，賬不算不明。广西人民寬恕了黃紹竑过去的罪恶，选他作了人民代表，他却忘記人民对他的寬恕，恩将仇报，睜开眼睛說謊話，反誣蔑党和政府的肃反政策。烈士家屬們憤怒地控訴了黃紹竑杀害了他們的亲人，使他們家破人亡的罪行。烈屬馮永庄說：“我父亲馮蔭西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一日被黃紹竑杀害后，祖母一气吐血而亡，母亲無所依靠，被逼改嫁，剩下我兄弟二人。那时我兄才五岁，我只四岁，我們就此过着流浪兒的生活，靠叔父撫养长大。”烈屬雷榮恩說：“我父被杀害时，我才四岁，姐才十岁，我母亲含辛茹苦，勤勞种田、車衣，又辛苦又悲伤，积勞成疾，到我十岁就丢下我們去世了，姐弟二人，相依为命，好不容易才得成人。”烈屬罗启拔說：“一九二七年，我父亲罗子卿在梧州被黃紹竑杀害，家被抄沒，还给赶出大門。六十多岁的祖母，十来岁的姐姐，三岁的我，还有在襁褓中的弟弟，無家可归。这种情景，任何人一想可知。”烈屬罗启芝說：“我父亲牺牲时，我年紀太小。至今連他的面目是怎樣的，都沒法想起来，我想黃紹

竑現在你的生活該還好吧！你的兒女們也還住在一起常得相見吧！”烈屬們還控訴了自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后，黃紹竑帶領了三團人馬，血洗田東、百色、東蘭、鳳山、萬岡一帶的罪行。真是慘絕人寰，數百里無人烟。烈屬羅啟拔在解放前后曾兩次到過田東，他說：“田東對面的林蓬鄉百谷村，一向人烟稠密，千百戶人家，后被黃紹竑燒殺得片瓦無存，只剩一家地主的房子，連兩三歲的小孩都無法幸免，直到解放后，劫后余生的人才得重建家園。烈屬們忿怒地質問黃紹竑：“到底是誰造成人家破人亡，流離失所？”

黃紹竑借視察法制工作為名，表現了對反革命分子莫大的關懷，要做他們的“包青天”。但是，客觀的事實，會駁斥他的謬論。烈屬們說，我們悲慘的遭遇已是人所共見，但是人民政府對反革命分子是本着首惡必辦，脅从不問，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行事，而且刑只及其本人，對家屬並不株連。烈屬羅啟拔說：“我們不說別的，就以黃紹竑的幫凶過去做過廣西人民劊子手的藍呈祺來說，他的罪大惡極，不可數計，在公審時只有點頭認罪，藍處決了之后，他的家屬仍然留下了生活必須費用，他們的房子仍在南寧市，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就是反革命分子的兒女仍然可以得到工作，學習，並不歧視。相反，我們可以比一比黃紹竑當時的情況，他提出了“寧可殺錯千人，不可放走一個。”的口號。一人有事，全家擔當。這才真正是使多少人家破人亡，流離失所。”

烈屬雷榮恩以憤慨的心情說：“解放后，我們得到了黨的教育，認識到我們的仇恨是和廣大人民的仇恨是一致的。解放了，鎮壓了一些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就可以說是報

了仇。我們了解到党的政策，我們并不要求一报还一报，一命抵一命，我們寬恕了黃紹竑，認為他在党的教育下是会改造、悔改的，能为人民做点好事。但是他現在的事实并不这样，却反而为反革命分子呼冤！我要問他，他是不是恩将仇报！

大家都談到了黃紹竑所提的法制問題。他們都說，社会主义的法制，是最好的法制，是人民的法制，維護了公民的权利，保障了人民的利益，他們向記者談到黃紹竑在广西进行“清党”时的情景，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黃密令他的參謀长黃劍鳴大肆逮捕，几月之內，不下千余人，五月一日在南宁公开枪杀十三人。但是后来判刑的不到一百人，其他的人到那里去了呢？烈屬陈可夫談到当时秘密刑訊的情景，每晚在監獄中都听到凄慘的叫喊和沉悶的枪声。……他們說，黃紹竑的法制到那里去了？这些事，我們真是說不完，講不尽，我們对这些事并不特別感到兴趣，既然黃紹竑先生爱高談法制，对新社会的司法制度挑剔百端，这也就引起了我們的回忆。

烈屬們非常憤恨黃紹竑在解放后的一些表現。他們說：別的事我們不知道，黃是人民代表，他解放后几次回广西，就沒有見他接見過广大的人民，更沒有接見過我們。去年來時，我們曾要求和他談話，他亦避而不見，他並沒有代表广大人民的意見，也沒有听取广大人民的意見，他在广西省人民代表大會上的发言，只是不关痛痒地說了一些，他过去的事情，为什么不談一談呢？他为什么不去左右两江和他的故乡慰問一下呢？关心一下过去在他洗劫下遭受了苦难、至今仍元气未复的群众呢？

烈屬陳可夫說：“尽管现在的时代和过去一九二七年已大不相同，但是黃紹竑今日的活动和过去有相同的意义，从他所发表的言論來說，他今天还想走他的老路。”烈屬馮永庄說：“有句俗話說‘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們經過革命的教育，知道了革命的道理和政策，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从團結出发，过去沒有向黃紹竑提过什么，希望他能改造思想，重新做人。因为事实上他多年来在广西所作所为的事人民都是清清楚楚的。我們沒有提，但他現在倒反为反革命分子呼冤了。他为什么不为被反革命分子所杀害的人民呼冤呢？”烈屬們一再提到黃紹竑在解放前所作的“五十年回忆录”一書充滿了血腥，对革命者极力詆譏。他在書中把他杀害了的人叫做政治野心家，到底誰是政治野心家？烈屬們都一致說：“黃紹竑應該好好的檢查，他最好自己算一算賬，对比他五十年回忆录，再写一本七十年回忆录，回忆回忆，認識認識，选择他應該走的道路。”在談話中，烈屬們都一致贊成雷成同志的意見，写一公开信給他。并建議省人民代表大会应根据他的表現，重新审查一下他的人民代表資格。他們說：“根据黃紹竑現在的发言和表現，真不配做一个人民代表。”

(1957年7月4日广西日报)

控訴黃紹竑屠杀青年的罪行

六十八岁高龄烈屬 高植兰

正在省人民医院就医的广西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六十八

岁高龄烈属高植兰老先生，躺在病床上愤怒地控诉了黄绍竑的罪行。他说：“我年老了，但我也要 and 右派分子黄绍竑的反党反人民的言行作斗争！我也要控诉黄绍竑在一九二七年他的刽子手蓝呈祺到桂平去‘清党’杀害青年们的罪行。”

他说：“黄绍竑在当年进行血腥屠杀时是非常残酷的，未成年的人也無法幸免。我弟弟就是一个例子。”高植兰老先生的弟弟高鹏鹏烈士，牺牲在一九二八年初（旧历十二月二十六日），当时年仅十七岁。原在潯州中学讀書，是一个共青团員，曾参加当时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后在平南新隆乡七新村被捕惨受杀害；同时被害的还有七、八人。他说到他弟弟惨死时，痛不成声。他说：“我弟弟是一个活生生的青年，到底犯了什么罪，要杀害他。”他指斥黄绍竑说：“黄在‘清党’时，不仅是‘暗無天日’，所做的事简直是‘惨無人道’！”

他说：“我們要支持南宁市烈属們所作的斗争，密切注意右派分子的言行。要进行严正的駁斥，保卫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使生者死者，永無遺憾。”

（1957年7月7日广西日报）

控訴黃紹竑欠下右江人民的血債

前紅七軍二十一師六團排長 黃振光（僮族）

我們廣西省右江革命根據地的人民沒有忘記黃紹竑的滔天罪惡，我們要控訴！

那是一九三〇年春天，紅七軍由百色進軍南寧。當時黃紹竑做偽廣西省主席，他在南寧派了軍隊趕到隆安一帶抵抗紅軍。同年秋天紅七軍主力奉命轉移江西，只留下以韋拔群同志為首的紅七軍二十一師部分兵力堅持右江革命鬥爭。從那時起，黃紹竑就親自指揮他的軍長廖磊盤據百色，對右江革命根據地施行“三光”政策，把根據地無辜的各族人民掃蕩到“雞犬不留”。在田東林蓬區和任茶區兩地，凡是十五六歲以上的抓到就殺。有一次，在坡墟、那板、巴麻等五個屯共搜捕五十八個群眾，一起拉到百弄屯用輕機槍掃射。一個年紀十八歲姓黃的姑娘，被輪奸到死。在東蘭巴馬一帶，除了地主惡霸的房子之外，群眾房屋全部被燒光，連山上林木野草一根也不留。黃紹竑下了這種毒手，以為可以達到他要撲滅右江革命火焰的目的，然而事實並不如他的蠢想，右江革命根據地的人民卻團結得比鐵函更硬。

黃紹竑在當時更採取了極端殘忍和卑劣的手段來對付我們右江革命幹部及其家屬，他卑鄙地到處出布告懸賞洋四千元捕捉領導右江革命的韋拔群同志。因為抓不到鳳山縣某鄉蘇維埃主席黃榮章同志，他的爪牙把黃榮章同志的弟弟活埋；把黃榮章同志的愛人強姦之後，用繩子捆綁象釣魚一樣，掛在樹枝上，放到河裡去拉上拉下弄死，黃榮章同志的兒子和一個小弟，也被用石頭活生生地打死了。

我當時在二十一師六團工作，他們也到我的家鄉把我哥哥吊上屋梁上，威嚇我哥哥把我交出來，但他不上他們的當。以後他們又迫我哥哥拍賣全部家產得東毫三百六十元交給他們做懸賞金，不久，他們又來抓我哥哥去坐了三年牢。

上面列舉的事實，只不過是黃紹竑統治廣西時所製造千

万件血案中的一二件。黃紹竑在右江革命根据地所欠下的人民的血債，右江人民是不会忘記的。今天黃紹竑竟胆敢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事业进攻。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各族人民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坚决保护三十多年来用无数鮮血换来的革命成果。我们要向右派分子的狂妄进攻予以无情的反攻！反击不胜利，坚决不收兵。

(1957年8月9日广西日报)

杀害刘英同志的是黃紹竑

浙江永康县宅六村农民 程兆修

这里要揭露黃紹竑一桩罪行。

在这以前，許多人只知道前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刘英同志和温州市委書記張貴卿同志被国民党杀害了。可是誰杀害他的？知道的人不多了。現在告訴你，杀害这两位同志的就是右派分子黃紹竑，我是見証人。

抗日战争时，黃紹竑是国民党的浙江省主席，日本鬼子快打到浙江省会的时候，黃紹竑赶忙带着自己的爪牙逃到永康县方岩乡，躲在方岩山的岩洞里。到了方岩乡，黃紹竑并不去打日本鬼子，而是大批大批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的人民。在浙閩边区坚持抗日的共产党领导人、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刘英同志和温州市委書記張貴卿同志，就是被黃紹竑手下的特务头子陈家璧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在永嘉和龙游捕去的。

刘英同志被押到方岩以后，最初被关在程洪品旅店楼上

(这房子被黃紹竑作为监牢)，离我的家只隔几間空屋基。張貴卿同志是同其他十几个人被关在程宅祠堂的牢房里。在这个时光里，我因为挑粪下地违反了黃紹竑的禁令，也被拉去坐了三回班房。有一回，同刘英同志关在一起。刘英同志一見我，就問我为什么也被关押起来？我就把被关的原因說了一下。刘英同志說：你們是穿草鞋的人，不要和这些人硬干。……在这样的时候，刘英同志还这样关心我們农民。

黃紹竑对刘英同志的种种迫害，我知道得不少。最初，黃紹竑用軟的手段，听說派了浙江省調查統計室主任、特务头子刘怡生和浙江省民政厅长程某同刘英同志談話，企图誘騙刘英同志自首。但是都被刘英同志罵了回去。刘英同志說：“你們不会从我口里得到什么的，你們沒有資格同我談政治。”

軟的办法不行，黃紹竑就改用硬的办法——整夜审讯。一到天黑，黃紹竑的爪牙就把刘英同志带去审讯，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送回来。听人說：有一次刘怡生审讯刘英同志的时候說：“顧祝同有电报来，叫你表示态度，否則就要……”刘英同志回答是：“我就是这样的态度。”

审讯失败后，黃紹竑把刘英同志关到方岩寿山坑万静廓（这里是黃紹竑屠杀共产党人的一个刑場），动了酷刑。刚好这一次我住的班房就在刘英同志班房的隔壁，从窗戶可以看見刘英同志双脚带上了一副大脚镣，身体已經被折磨得不象样子。張貴卿同志也因为一直不屈服被折磨得天天吐血。就在这样的时候，刘英同志还在牢里鼓励其他的同志坚持斗争。从这以后，我才清楚地知道刘英同志是一条真正为了人民、为了抗日的坚貞不屈的硬汉。回家后，我常常想念刘英

同志。当时，方岩乡宅六村的农民，虽然还不知道刘英和張貴卿两位同志是共产党员，但是大家背后都说这些人是好人，是硬骨头。

一九四二年五月，日本鬼子打到了永康县，黃紹竑赶忙向云和逃跑。在逃跑前，黃紹竑指示自己的爪牙一定要杀死刘英和張貴卿。五月十七日晚上，刘英同志在就义前最后一次被傳审回来的时候，将自己的一件大衣送给了一位住在班房隔壁的、給刘英等同志煎过药送过开水的老太太。刘英同志还对这位老太太說：“老媽媽，謝謝你照顧过我，今天晚上我来同你告別了。”五月十八日清早，天还没亮，宅六村程氏宗祠左边的小山上响了几响枪声，刘英、張貴卿同志就这样被黃紹竑杀害了。

等劊子手走完以后，我才把刘英、張貴卿同志的尸体掩埋在宅六山上，在这两位烈士的墓前我栽了一棵小柏树。

想起这件事情，我是很悲痛的。請大家想想：应该怎样来为刘英同志和張貴卿同志报仇？应该怎样来对待黃紹竑这个劊子手？

(1957年7月21日人民日报)

黃紹竑在浙江欠下的血債

浙江省小組的代表七月五日揭露了黃紹竑在抗日戰爭以前兩度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时的反共反人民罪行。曾經遭到黃紹竑反动武装逮捕監禁的邱清华代表說，单平陽一县被黃紹竑殘杀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就有一千五百多人，燒毀的房子达六百多座。黃紹竑在一九四二年还謀害了中共浙江省

委書記劉英。邱清華在發言中還揭露了黃紹竑包庇血債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張韶舞。張韶舞在一九四三年當平陽縣長時殺人凶狠，並在平陽縣城舉行“人頭展覽會”。張韶舞從這時起得到了黃紹竑的賞識，封張韶舞為“模範縣長”。在解放以後，黃紹竑包庇張韶舞，把張韶舞介紹到北京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後經浙江人民檢舉，張韶舞才被政府法辦。代表們說，黃紹竑的罪惡是極為深重的，如果他對現在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再不認真交代，悔過認罪，他將得不到人民的饒恕。

(1957年7月6日浙江日報)

黃紹竑在浙江屠殺人民 舉行“人頭展覽會”

林 樹 中

國民黨統治年代，黃紹竑在浙江當“省主席”期間的“德政”可以“劣凶極惡”四個字加以概括。他當時是浙江的土皇帝，下面的專員和縣長們，就是他的嘍囉。這些嘍囉們，一面拼命的搜刮民脂民膏，一面卻又拼命的向他們主子賄賂，花花綠綠的鈔票，最好的土特產以至吳昌碩的精品名畫，都被送進了這位土皇帝的家門。至於金華的火腿、紹興的老酒，塘栖的枇杷等等，更是把黃紹竑的屋子塞滿了。

特別可恨的是他通過平陽“縣長”張韶舞，殘酷鎮壓人民，開“人頭展覽會”的事實。因為平陽北港山區，原是革

命的根据地，很多共产党人如粟裕、刘英等，都曾在进行活动。因此黄绍竑和张韶舞便把这一带的人民恨死了，一而再再而三，率领了他的爪牙和流氓，到这里来“清乡”总计在平阳一地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数当以千计。有一次杀得最多（约有百人以上），张韶舞就把这些人民的头都砍下来，拿到“县政府”去开“人头展览会”，还拍了照片登在反动报纸上。也因为这样，张得到黄绍竑更大的信任。而当时地下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同志，便是由温州“专员”张宝琛逮捕送省，被黄绍竑杀死的。这些事实在今日温州二十五岁以上的人，大都知道的。

解放以后，黄绍竑还把张韶舞掩藏起来，送到北京一个革命干校去“学习”，后来因为平阳人民众愤难平，人民政府把张韶舞解到平阳，开了群众斗争大会，就地枪决。但是黄绍竑却安然无事，并且还身居高位，这说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多么宽大为怀！

（1957年7月17日文汇报）

来自四明山老区的声音

俞松青

右派分子黄绍竑等人的反动言行揭露以后，激起了浙江省四明山区老革命根据地——嵊县浦口乡东畈庄村的人民万分愤怒。该村益民、民丰两个农业社的社务管理委员会，于七月六日联合邀集了烈士家属章全仁、魏德海、曾友棠等举行座谈。他们控诉了黄绍竑的罪行，并驳斥他的反动谬论。

革命烈士章咪全（共產黨員）的哥哥章全仁說：黃紹竑帶給我們的災難訴不盡。那還是在一九四三年，黃紹竑當偽浙江省主席的時候，他養着大批的爪牙、狗腿和特務。他的主要爪牙——“浙保”部隊按照黃紹竑的指示，不抗日，反到處搜索地下共產黨員和正直善良的群眾進行殺害。一九四三年農曆二月十九日，“浙保”的陳見富部隊根據本村惡霸地主魏仁法的秘密報告，派來了一百多個兵，如狼似虎地把村莊團團圍住，把村上十六歲以上到六十歲止的人都迫到村前站着。當場抓去了地下黨員章咪全、魏海木和群眾曾水棠、徐榮正等五人，不分青紅皂白地上“老虎凳”，嚴刑拷打。說他們都是三五支隊，是“共匪”。一個反動軍官還大聲地說：“寧可錯殺一千，不肯漏過一個‘三五’。”接着，他命令士兵，把幾個人綁在桑樹上，用刺刀刺死。五個人除一個老頭兒毒打後釋放外，其餘就這樣被活活刺死了。章咪全被刺了七刀，曾水棠被刺了十七、八刀，烈士的肚腸隨着明亮的槍刺流出來。在行凶的時候，還迫着一百多個群眾觀看。在場的群眾個個吓得面色如土，低頭流淚。“浙保”部隊臨走時，還責令群眾在三天內不准收屍。章全仁接着說：“我娘本來有點病，加上我弟弟被害，嚇了一場後，過了二十多天也死去了……”。他說到這裡，再說不下去了。

曾友棠的弟弟水棠，是一個農民，也是那次被無辜殺死的。曾友棠沒等章全仁說完，就接着上去說：“黃紹竑說‘肅反搞糟了’，這是他在替反革命說話。”曾友棠說：“我村惡霸地主魏仁法，平日依靠反動勢力——“浙保”部隊殘害共產黨員和農民，正好象一隻見窮人就咬的惡狗。在鎮反時，魏仁法被鎮壓了，那時的農民，真是人人稱快，個個喊

好。都說共产党为农民除掉了一只‘恶狗’。从此，农民的生产劲头也来了。作为一个人民代表的黃紹竑，不但不为人民說話，反为反革命說話，象这种人怎么有資格当全国人民代表呢？

(1957年7月21日浙江日报)

声討右派分子譚惕吾

譚惕吾是反共反人民的两面派

民革中央小組和北京市委員会七月二十七日上午联合举行座談会，进一步地揭发了右派分子譚惕吾的反动言行，以及她勾結黃紹竑、林希翎組織陰謀集团的反动活动。

苏从周、于振瀛、赵寿瑞等人在会上揭露譚惕吾是一个一貫反共反人民的十足的两面派，絕不是象她自己所說的那樣一貫“忠心耿耿”拥护革命的人。譚惕吾在做學生的时候就参加了国家主义派，参加青年党。在国民党内政部做科員时，得到了黃紹竑的賞識，連升三級，青云直上。因此，黃紹竑掌握了她的灵魂和命运，她死心塌地地作了黃紹竑二十多年的反动伙伴。当李宗仁竞选总统时，黃紹竑为李宗仁出謀定計，譚惕吾从中搖旗呐喊，做黃紹竑的工具，滿以为李宗仁一旦成功，她可以跟黃紹竑飞黃騰达。在香港的时候，譚惕吾完全和黃紹竑一个鼻孔出气，散布了許多反共言論。

一九四八年夏季，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伪立法院內成立了秘密的政治小組，在同年夏秋之間，譚惕吾以請吃飯为名，把民联的全体人員暴露給黃紹竑。

据赵寿瑞揭露，譚惕吾也曾經承認自己是两面派。有一

天，譚惕吾在自己家里对一个青年学生說：“紅樓夢的薛宝釵、王熙鳳是两面派，是值得学习的。这种社会（指社会主义社会）也需要两面派。”她还說：“历史上就是这样，这一派，那一派；这一党，那一党。倒向哪一派哪一党都不行。比如解放前国民党要杀共产党的头，现在共产党要杀国民党的头。”譚惕吾还竟然無耻地說：“我自己过去、现在由于两面派，所以过去、现在都能有职务，有权力。你看我現在的生活多好啊！”接着，譚惕吾又說：“如果不是两面派，要是国民党回来就要杀我的头。”

譚惕吾曾經惡毒地咒罵革命，咒罵毛主席。据吳茂蓀揭露，在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間，王昆仑和賴亞力当面劝告譚惕吾必須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时，譚惕吾暴跳如雷地說：“什么革命反革命！毛澤东、蔣介石死了，还不是一样！”

談到譚惕吾同林希翎的关系时，赵寿瑞說，譚惕吾說她是“受了林希的欺騙，被她利用了”。实际上，譚惕吾直接指揮了林希翎的反党活动。赵寿瑞說，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論发表后，譚惕吾就指使林希翎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去提抗議。六月三日到六月十日，是右派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攻最猖狂的几天。林希翎住在譚惕吾家里，在林希翎离开学校以后，林的嘍囉們就制造謠言，說林是“受迫害”“失踪”了。另一方面，譚惕吾的家里变成了反动小集团的大本营。这个小集团的人物，是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的一些反动分子。他們聚集在譚惕吾家里，策划于密室之中，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有一天，譚惕吾小集团的嘍囉去找她，在院里和她說話。譚惕吾說：“对面是公安局派出所，

讓他們聽見不方便，到屋里去吧！”

在六月十日林希翎离开譚惕吾家之前，譚惕吾对林希翎說：“現在形勢有些不对头了，我看整风就不是那么回事。这是一个大策略，是誘敌深入的騙局……。”又說：“目前，方向有所轉移，回去有錯誤可以承認。看情况，該低头时就低下头，否則就过不去。两面都要看一看，該低头，就低头，到了該起来时就起来。”

赵寿瑞說，譚惕吾和黃紹竑、林希翎做了这么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但她却說她对党“忠心耿耿”，說她“干淨得很”，“沒有一点肮脏的东西”，“根本沒有反党”。她明明白白地是在扯謊。

周范文、焦实斋在会上揭露了这样一件事：六月七日，反动学生崔德甫（“广場”副主編）曾到譚惕吾家里向黃紹竑、譚惕吾、林希翎汇报北京大学鳴放的情况，和有关筹办反动刊物“广場”的事情。当时，譚惕吾曾讓崔德甫到东四六条找一个画家取款二百元作“广場”的經費。

据周范文揭露，譚惕吾还包庇石油工业部的一个犯罪分子王裕丰，唆使他在街上貼反动标語，叫喊要杀共产党。当石油工业部向法院起訴王裕丰时，譚惕吾当天夜里就跑到王裕丰家里去密商对策。

在座談会进行过程中，譚惕吾多次起来大喊大叫，打断别人的发言，搗乱会场秩序。她百般地狡賴，企图賴掉反动言論。她甚至誣指揭露她的人是“造謠”。她的这种极端恶劣的态度，激起大家极大的憤怒。朱学范和朱蘊山都指出，这完全是自絕于人民的态度。

主持座談会的民革中央組織部长朱蘊山最后发言。他指

出譚惕吾六月五日提出的四點建議，是一個反黨的具体綱領，是很完整的東西，不是隨隨便便提出的，後面有很大的陰謀。

朱蘊山說，過去有很多人被譚惕吾的兩面手法蒙蔽了眼睛，包括他自己在內。最近，他才完全知道了她的底細，原來她是一個國家主義派，她很早就和黃紹竑勾搭。他說，譚惕吾的靈魂早已出賣了，在過去那個危險的時候，她將“小民革”（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的組織秘密公開。朱蘊山最後指出，根據今天揭發的事實，完全證明譚惕吾是個徹頭徹尾的右派分子。

（1957年7月28日北京日報）

譚惕吾不要再耍兩面派要老實交代

民革北京市委員會常務委員 蘇 從 周
鐵道部教育局副局長

譚惕吾是最頑固的大右派分子。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革中央和民革北京市委會以及這次市代表大會上的揭發、批判，鐵案如山，她還不低頭認罪。在西單區代表小組會上，她竟然暴跳謾罵。在民革中央和民革市委聯合擴大座談會上，她大喊大叫，說別人“造謠”、“我沒有說”、“記錄靠不住”等。譚惕吾太猖狂了！我要在莊嚴的人民代表大會上把她的偽裝一件一件地剝下來，讓大家看看她的丑惡面貌和反動罪行。

第一，譚惕吾的反動活動有一套完整的綱領。譚惕吾一向耍兩面派手法，口頭上對黨忠心耿耿、擁護社會主義，暗

地里做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勾当。她趁帮助党整风的时候，在民革中央几次座谈会上发出很多谬论，最后抛出了反动纲领，就是所谓四项建议。她主张取消党的各部，反对党发号召，发指示，连党发内部指示她都反对。她不同意党直接指挥党员。她的中心企图就是解除党的武装，取消党的组织，否定党的领导，使党变成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壳，最后目的是要资产阶级复辟，以资产阶级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她这个反动纲领是一套完整的东西，是经过深思熟虑并且和她的伙伴反复研究才提出的，是有计划地配合章罗联盟在向党进攻最高潮的时期提出的。

第二，我揭发黄、谭联盟的事实。谭惕吾的反党活动不但有纲领而且有组织。谭惕吾和她的伙伴黄绍竑是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等一小撮反动集团的领导人，谭惕吾的家是他们的指挥部。黄、谭的关系不是一朝一夕，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黄绍竑是国民党反动派桂系的大将，是桑人不眨眼的魔王。他当伪内政部长的时候，谭惕吾当科员。黄绍竑到内蒙古去宣抚德王，谭惕吾当随员，在百灵庙两个人闹的声名狼藉，回到南京谭惕吾连升几级。她对黄绍竑感恩不尽，忠心耿耿，二十多年如一日，死心塌地做黄绍竑的反动伙伴。一九四四年，谭惕吾混进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从此以左派自居。但是，她并不真心革命，脚踏两只船，施展两面派的手法。组织上叫她做黄绍竑的工作，实际上，黄绍竑做了她的工作，她在南京把组织名单泄露给黄绍竑。解放前夕，谭惕吾在香港，她的反动言行更为露骨，作黄绍竑的应声虫，为桂系作宣传，发出很多反共言论，引起在港民主人士、文化界和妇女界的不满。从历史上挖一挖，揭开她的伪装，谭惕

吾根本不是左派，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老牌右派分子。

第三，我揭发譚惕吾在学校点火和毒害青年的活动。黄、譚联盟在人民大学抓着林希翎，串連一小撮右派分子到处点火。据人民日报揭发，林希翎的父亲受过黄紹竑的訓練，也是有历史关系的。林希翎和黄、譚情感深厚，已經参加黄、譚联盟的领导核心，这是肯定的。林希翎崇拜譚惕吾是美丽的、独身的、慈祥的老媽媽，譚惕吾說林希翎是勇敢有为的青年作家，黄紹竑說林希翎灵牙利齿，很能反对共产党，真可謂臭味相投，物以类聚。他們互相勾結向党进攻，其他同志談的很多，我不重复。譚惕吾散布毒素，毒害青年，关系太大，应当严厉批判。她最毒恶的是教青年学习两面派，教孩子們向薛宝釵、王熙鳳学习。她还現身說法地說：

“我过去是两面派，現在还是两面派，国民党来，我还不会杀头。”代表們，这只毒箭已經射进一些青年的心灵，他們正在演习譚惕吾的两面手法。我們要不赶快消毒是很危险的。我正告譚惕吾，現在是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封建主义社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大观园。你所学的薛宝釵、王熙鳳两面派手法，無論多么巧妙，在光天化日之下随时可以揭穿，一定逃不过人民的巨掌！

第四，我揭开譚惕吾的“包公”假面具。黄、譚联盟从政法方面向党进攻，从反革命分子、劳改队、囚犯、管制分子、違法乱紀的坏人以及不滿現狀的落后分子中找群众。他們以包公自居，替“民”申冤。把他們的假面具揭开，就看出他們是别有用心。他們利用人民代表的职权在視察时顛倒是非，包庇反革命分子，为反革命分子和違法乱紀的坏分子鳴冤叫屈，把我們的檢察机关說成是“無法無天，一团黑”。

他們提出的案件很多，我只舉一個案子來說明他們的罪惡活動。石油工業部的一個技術員王裕豐辱罵共產黨，一貫不滿社會主義，違犯勞動紀律，被開除了。王裕豐到昆明、重慶、成都等地招搖撞騙，大罵共產黨，吃飯、住旅館不給錢，回京後又到處“控告”。人大常委會派譚惕吾了解情況，她只听王裕豐一面之詞，為他撐腰，有意煽動他，使他態度更加惡劣，公然在大街上張貼反動標語，要殺共產黨，帶領老婆孩子闖進石油工業部李聚奎部長的宿舍，尽情辱罵，並企圖行兇，一直鬧到深夜，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市人民檢察院批准依法將他逮捕，是完全正確的。譚惕吾却說這是人民內部矛盾，硬要替王裕豐開脫罪責。她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身份提出抗議，說檢察機關違反法令，侵犯人權。她還要民革中央反映上去。各位代表，譚惕吾利用人民代表的身份橫行霸道，破壞法紀，這是我們絕不能容忍的。

第五，從譚惕吾的本質和作風看看她的立場和所走的道路。譚惕吾一腦子封建主義思想，個人野心很大，做學生的時候參加國家主義派，長時期跟着青年黨走，有根深蒂固的國家主義思想，政治品質非常惡劣。解放後八年來她專門爭名譽、爭地位，從不踏踏實實地做工作，那件出頭露面的事沒有她，心裡就不痛快。她報名參加土改，已經出席會議，並帶上了符號，因為沒安排她當團長、組長，她就堅決退出，不但名位觀點濃厚，而且拿土改當兒戲。她一身兼了一、二十個職務，還不滿足，中蘇友好協會和中國政治法律學會理事名單原來沒有她，她吵吵鬧鬧，只好臨時把她加進去。她每天東奔西跑，這裡開會，那裡出席，不知忙些什麼。實際上那件事她也沒有做好。在任何機關團體都免不了

鬧意見、出問題。在國務院參事室她反對很多人，她反對金城同志參加赴朝慰問團，她反對沈鈞儒同志到民主德國去，在亞非會議中國代表團，她和莫藝昌、關世雄同志鬧了不少意見。在民革市委她反對寧武同志，寧武同志調東北，民革中央派蔣光鼐同志代理市委領導職務，沒有派她，她大不滿意，處處和蔣光鼐同志為難。在革命隊伍里她不反對的人很少。再從另一方面看，譚惕吾二十多年來處處為黃紹竑打算，從來沒說過黃紹竑的壞話，煞費苦心地把黃紹竑拉進民革。她和林希翎成了母女關係；在民革市委會和右派分子許寶騫、周穎最親近。她的一切右派分子都談得來。

譚惕吾反對誰？贊成誰？她的立場站在哪一邊？她走的哪條路？她對誰忠心耿耿？這不是清清楚楚的嗎？根據她二十多年的丑惡歷史，充分說明譚惕吾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是一貫的，而不是偶然的，她不是從左到右，而是徹頭徹尾的老牌右派分子。鐵的事實擺在面前，你譚惕吾還能狡賴嗎？你們右派分子如果執迷不悟，繼續頑抗，人民的力量會把你們打個粉碎。

(1957年8月4日北京日報)

擊破譚惕吾的反黨陰謀

民革北京市委常委兼宣傳處處長 李文標
東四區副區長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里面有一撮右派分子，他們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樣，借共產黨整風的機會，散布他們荒謬透頂

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論。民革北京市委常委兼組織处处长譚惕吾，就是一个頑固的右派分子。請代表們听听她在五月二十五日民革中央小組扩大会上的发言吧！她罵說公道話的盧郁文同志是“言不由衷”。她說：“他現在还不是黨員，还是民革成員，也許他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她还罵盧郁文对党不實，对国不忠。罵靠攏党的人是“無耻之尤”。她蛮橫無理地不許別人說党和政府的好話，只許說坏話。

譚惕吾把她自己装扮成唯一对党忠心耿耿的人。她說現在党已經长了毒瘤，她要替党来割毒瘤。接着她就拿出了四点建議。是什么建議呢？实际上就是要根本取消党的領導。她狂妄地想把她那一套腐朽透頂的国民党的老办法，強搬到我們的社会主义制度上来。

譚惕吾！我正告你，社会主义制度是六亿人民所拥护的！共产党的領導是六亿人民所衷心愛戴的！党領導的社会主义革命百分之百的正确，党没有什么毒瘤。我看譚惕吾倒是滿身长了毒瘤！請你把你自己的毒瘤割掉吧！否則将会病入膏肓，不可挽救。

当时，在右派分子們的心目中，他們的天下快到来了，于是右派分子譚惕吾就象瘋魔似地到处活动。勾結双手沾滿了革命人民鮮血的反動分子黃紹竑，和右派分子林希翎，发动了向党向人民的猖狂进攻。譚惕吾和黄紹竑亲自指揮林希翎煽动風潮。他們采取了極其惡毒的詭計，先叫林希翎在几个大学里发表煽动性的演說，打算等待时机成熟以后，拿林希翎“失踪”作为导火綫，叫那些和林希翎一帮的右派学生向党、向政府来个所謂“反迫害”运动。他們以为这样一来，幻想中的“匈牙利事件”就可以鬧起来了。

在所謂林希翎“失蹤”的日子（也就是六月三日到九日，林希翎住在譚惕吾家的六天）里，譚惕吾从人大常委会請了假，和黃紹竑、林希翎策划于斗室之內！譚公館变成了“司令部”，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右派学生在这几天里，你来我往，紛紛到譚公館里来請示机宜，共商大計。

右派分子們的想法也太天真了。共产党非常强大，天下并没有大乱，他們的阴謀詭計很快就被人民戳穿了！粉碎了！

譚惕吾一看妙計未成，就急急忙忙收兵。她打算把鬼臉暂时隱蔽起来，就立即和林希翎訂立了攻守同盟，指揮林希翎写为她开脫罪行的說明信。她并且把自己最专长的两面派手法傳授給林希翎。她要林希翎在被群众揭穿的时候，就暂时向群众低一下头，忍耐一时，伺机再起。譚惕吾对林希翎的运筹决策，使林希翎对譚惕吾推崇备至。林希翎把譚惕吾形容为“最美丽、最慈祥的一个独身主义的老媽媽！”我看人民对你譚惕吾也有一个推崇：“你是最恶劣，最頑固的一个极其無耻的老妖精！”

譚惕吾！大家不会相信你騙人的鬼話，你不承認和林希翎有过任何密謀，你說你“警惕性不高，立場不穩，被林希翎利用了！”正如代表們同声說的，連三岁小孩也不相信。难道一个飽經世故的譚惕吾，会被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学生利用了？告訴你！譚惕吾，你和黃紹竑、林希翎的阴謀詭計，一定要老老实实地交代出来！

当民革中央小組和民革北京市委会举行反右派斗争扩大会议的时候，譚惕吾屢次装病，拒絕出席，抗拒交代。在这次极其庄严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上，她还是来这一套抗拒的手

法。当迫不得已出席會議的时候，她又耍起极其恶劣的無賴态度。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在全国人民無比憤怒的压力下，她做了个假檢討，把自己說成是主观上爱护党，客观上被右派分子利用了的人。我要正告譚惕吾！你这是枉費心机，在广大人民面前，在人民手里的照妖鏡面前，什么牛鬼蛇神，都会原形毕露！

(1957年7月29日北京日报)

請看譚惕吾所提出的“三害典型” 案件的眞象

人民日报記者

資产階級右派分子譚惕吾，在六月五日民革中央小組扩大會議上，对我们司法机关的工作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污蔑。譚惕吾說司法机关犯有严重的“違反法律、侵犯人权”的錯誤，并举出石油工业部王裕丰事件和由山西省人民法院判决的郤盘石事件作例子，說：“这两个案件是‘三害’的典型”，因此，譚惕吾“要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資格提出严重抗議，要求政府立即釋放王裕丰，要求共产党严格檢查郤盘石案件。”

王裕丰應該釋放嗎？

王裕丰事件是不是“三害”的典型呢？王裕丰案件的眞

象到底如何呢？为了弄清事实，分清是非，記者最近訪問了石油工業部、北京市東四區人民檢察院和東四區人民法院了解和处理王裕丰案件的同志。

王裕丰在解放前是一个伪職員，解放后被留用在撫順礦務局工作，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被調到原中央燃料工業部石油總局工作。他本来不懂技术，也沒有上过大学，只是由于他冒充哈爾濱工業大學肄業，假造曾当过二年化驗員，因而在解放之初騙得了助理工程師的职位。这个假造的历史后来才发现；在实际工作中也証明他确实沒有具备工程師的条件。因此，在一九五二年評薪时，王裕丰被評为技术員，但当时領導上为了照顧他，暫時仍旧按照他原来的高工資标准发給他工資。按理，他应当感激政府对他的照顧和寬大，更好地努力工作。但是他却消极怠工起来，抱怨政府把他的职位放得太低了，在工作中不服从領導，謾罵領導，江輔濟工程師領導他，他就罵江工程師，侯美生工程師領導他，他說侯領導不了他。他高兴时就上班，不高兴时就不上班。組織上派他去做石油資源展覽会的工作，他却私自去逛公园、观名胜。据統計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三年底王裕丰無故曠职、在工作時間做私事的時間就在一百个工作日以上。

一九五六年一月王裕丰又向石油工業部提出了三項無理要求：“第一、不在甘寧（煉油司副司長）領導下工作；第二、堅決不接受侯美生的領導；第三、必須提他為工程師。”如果領導上不答應，就不上班。這種挑戰式的無理要求，該部領導上当然不能答應，于是王裕丰就从一九五六年一月到七月，六個多月沒有上班。在此時間內，組織上會对他进行过多次的教育，除部里的干部司司長、處長、黨委辦公室主

任、部長助理和工會主席找他個別談話外，煉油司、技術司的同志們也曾多次到他家里多方勸他認識自己的錯誤，回心轉意重回機關工作。但是王裕豐始終不聽同志們的勸告，并于一九五六年二月九日私自跑到長辛店等地去旅行一個多月，回來後洋洋自得，并給石油工業部寫信說：“我到北京的西、南、北三方走了十四個縣市，十餘個鎮，數十個鄉，路經一千三、四百里”，要求組織上對他這一個多月的旅行看作是“因公出差”，把他出外遊逛期間的花費當作“出差費”報銷。他還對人說：“他們不答應我的要求，我就不上班，不給他們干活，共產黨還是要給我飯吃。”這時，石油工業部為了維護國家的行政紀律，并促使其悔悟，只好決定給這個只想吃飯，不願干活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蛀蟲”以停職停薪令其反省的處分。

但是，右派分子譚惕吾對石油工業部給王裕豐以停職停薪令其反省的處分決定是怎樣看法呢？在她給“人大”常委會的報告中，把王的這種目無組織、屢次曠職、公餘六個月不上班的嚴重違反勞動紀律的錯誤，輕描淡寫地說成“只是舊知識分子的一般毛病，對王不能要求過高”，因此下結論說：“石油工業部這樣做是犯了嚴重的主觀主義的錯誤。”

所以，這時壞分子王裕豐的態度就更加蠻橫無理。當王裕豐接到“停職停薪令其反省”的通知以後，就馬上找到石油工業部的幹部處，憤憤地把工作人員証交出來，并聲色俱厲地向幹部處的同志說：“要開除就早些開除吧！”回家之後，即携妻帶女到昆明、重慶、成都、漢口等地繼續招搖撞騙和罵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王裕豐吃飯不給飯錢，住旅館不給房金，到醫院看病不給藥錢，人家向他要時，他叫人家把他

欠的錢上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賬上。如有一次他在成都榮頤食堂吃了飯以后說：“我是被共产党害窮了的，不能付給你們飯費，請你們把我的飯費記在中共成都市委的賬上，或者記在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的賬上。”他还冒充共产党员。

王裕丰在外到处碰壁之后，不得已又回到了北京。石油工业部为了給王裕丰再一次的悔过和劳动的机会，李聚奎部长曾亲自找他談过三次話，耐心地教育他，要他承認錯誤，并告訴他只要他肯承認錯誤，部里就可以考虑重新分配他的工作。以后干部司司长又找他談話，并准备給他分配工作。但是王裕丰故意避而不見，只派他的妻子（家庭妇女）來談，并且更無理地提出四項要求：“第一、要补发停职停薪后的全部工資；第二、石油工业部必須包干他全家九口人的生活；第三、馬上提他为工程师；第四、要求处分炼油司副司长和支部書記。”当他的这些無理要求得不到滿足时，又大罵起該部的領導同志。石油工业部几次挽救他無效最后只好把他开除了。

王裕丰被开除之后，因为得到譚惕吾的庇护和支持，就蛮干起来。他一方面給一些机关、学校和他的亲友一連写了三十四封专门罵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書信，而且一律用明信片，好讓更多的人看到信的內容；另一方面在大街上張貼反动标語，告市民書（現已查获的有六張），罵“共产党员都該枪毙”，罵共产党所提倡的馬列主义“是害人主义”，把那些和党联系密切的人比成“特务”。不仅如此，王裕丰又于今年二月十五日手持小刀，同他的妻子、兒女闖进石油工业部李聚奎部长等所住的宿舍，破口大罵，并打碎牛奶瓶等物。王裕丰还唆使他的妻女說：“你們勇敢些，見到司长打

司长，見到部長打部長”。并大聲叫喊：“我沒有槍，如果有槍非槍斃你們不可。”

石油工業部認為王裕丰的這種行為已達到嚴重違法程度，即向北京市東四區人民檢察院提出控訴，要求依法處理。東四區人民檢察院經過調查之後於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依法逮捕了王裕丰，東四區人民法院（本報前曾誤為東單區人民法院）依法判處王裕丰二年半徒刑。

王裕丰為什麼對社會主義、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一直採取這樣惡劣的態度？為什麼要白吃社會主義的飯，還要專門罵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呢？說穿了也並不奇怪，王裕丰原來是一個大地主而又不甘心讓自己的階級死亡的人，因此，他對社會主義制度懷着極度的仇恨。王裕丰的家在解放前有一千一百畝地，一九四四年王裕丰又在偽中央銀行的資助下組織了永丰农垦有限公司，親任經理科長、專門做買賣土地的投機生意。他曾毫不隱晦地說：“我過去過的地主生活標準如果是200%的話，在日偽和國民黨時期只有130%，而現在竟降低到60%了。”因此，他說“我的生活的改變決定我應該擁護什麼？走什麼道路？”由此可知王裕丰的所作所為決非是偶然的了，而譚惕吾對這樣的壞分子進行百般地庇護，其用心是很明顯的。

右派分子譚惕吾把王裕丰以上這些嚴重違法行為說成“只是思想落后”，因此，她質問道：“王裕丰既然是思想落后，為什麼不把他當成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反而把他逮捕起來呢？這豈不是抗拒執行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指示嗎？”請問譚惕吾：王裕丰僅僅是思想落后嗎？王裕丰應該釋放嗎？告訴你，處理王裕丰的問題時，我們只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典，决不能根据你过去所在国民党伪立法院制定的“法典”。

奸商郗盘石该不该法办？

郗盘石案件的真象又如何呢？

郗盘石原是上海私营生茂煤厂的股东，又在私营上海鸿基煤厂担任采購員。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間，他代表上海十四个私营煤厂，到山西的阳泉等四个煤矿采購煤炭。在采購煤炭过程中，郗盘石用請干部吃飯，送鋼笔、手表、衣料等办法来賄賂干部，腐蝕干部，盜窃国家煤炭。据已查清的，郗盘石进行賄賂的干部共有二十多名，賄賂的財物，共值一千七百多万元（旧人民币）。

在这些受賄干部的帮助下，郗盘石开始了盜窃国家煤炭的行为。郗盘石盜窃国家煤炭的主要方法是每次从山西往上海运煤时，总是偷偷的多装和超装。如他从山西富家滩煤矿运往上海去的煤，在原地購买的每次都是七十吨，而运到上海之后，就有七十多吨或八十多吨。这样郗盘石大量盜窃了国家煤炭，据已查清的共值一亿七千六百多万元（旧人民币）。

同时，郗盘石还到小型煤矿去套購煤炭。一九五一年九月山西省煤建公司根据原山西省人民政府指示，規定山西省西山地区各小型煤矿所产的煤統一由国家包銷，私营煤厂一律不得采購。而郗盘石却千方百計地破坏政府的这个規定，私下同这些小型煤矿簽訂購煤合同，大量套購煤炭。他为了掩盖这种犯罪行为，还故意把簽訂合同的时间改在政府发指示的时间以前。

在盜窃和套購国家煤炭中，还偷漏了大批国稅和运输費。

“三反”开始以后，山西省煤建公司根据郗盘石賄賂干部、盜窃国家煤炭和偷漏国稅、運費等犯罪事实，于一九五二年三月經山西省人民法院批准将郗盘石予以扣留。扣押后，即对郗盘石案件进行严肃慎重的調查和审訊。一九五三年六月由山西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郗盘石一年半徒刑。刑滿后即予釋放。

人民政府对奸商郗盘石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而譚惕吾却說：“这是‘三害’的典型之一”，并說：“山西省煤建公司不是法院，为何把郗盘石拘留起来，这不是侵犯人权嗎？”其实大家都知道，在“三反”运动中，根据一九五二年三月政务院“关于‘三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規定”，凡专区以上的机关在当地司法机关的主持下就可以成立处理貪污、盜窃等違法分子的临时法庭。因此，当时山西煤建公司經山西省人民法院批准将郗盘石扣留，并由該公司所設的临时法庭負責审訊，弄清案情，最后由山西省人民法院判决，是完全符合法律規定和当时处理貪污違法分子的实际需要的，根本談不上侵犯人权的問題。譚惕吾当时是政务院參事室的參事，难道不知道政务院的这个法令嗎？既然知道，那么为什么要故意顛倒黑白血口噴人呢？至于譚惕吾所說的：“硬迫郗盘石承認他和山西省工业厅长有勾結”，“戴的脚鐐由五斤重增加到十五斤重”，“每隔二十分就提审一次”，“郗的双脚無好肉，两脚肿到大腿”等聳人听聞的話語更是無中生有的凭空造謠，是对党和政府的惡毒的污蔑。

× × ×

請看，右派分子譚惕吾，就是这样捏造事实来破坏党的
領導，破坏社会主义建設的！

(1957年8月28日人民日报)

譚惕吾为政治流氓鳴“冤”

光明日报記者 張西洛

6月5日上午，民革中央委員們举行帮助中共整风的第五次座談会。譚惕吾在座談会上“慷慨陈詞”，她自認為在“揭发”一个所謂的“三害”典型的“冤案”。她說，石油工业部有一个由工人提拔起来的工程师王裕丰，此人能力很强，平时埋头工作，只是思想落后，不善交际，与其他工程师不团结，領導上又对他歧視，使得王裕丰“一气之下，卖了自己的一些东西作为旅費，到昆明、成都旅行了一趟。回到北京，竟被石油工业部借破坏劳动紀律为名，把他开除……”

她接着說：“今年2月，王裕丰因为同石油工业部部长說理，爭吵起来，北京东四区人民檢察院就不依法律手續，把王裕丰逮捕了。”

最后，她气势凶凶、声嘶力竭地叫道：“这个‘冤案’是‘三害’的典型！我要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提出抗議！我們要进行监督，我要求民革中央迅速反映出去，要求立刻釋放王裕丰！”

譚惕吾在为王裕丰鳴“冤”之前，花了很大的力量，作了調查。她調查的結果認為王裕丰是“無辜的好人”；認為

北京东四区人民檢察院“無法無天，侵犯人权。”

現在，我們先看看譚惕吾所謂“無辜的好人”的真面目。

王裕丰是辽宁昌图县人，地主家庭出身，現年三十八岁。1937年在长春伪滿州国經濟部财务職員养成所受訓时，被一个日本督学賞識，在王裕丰快要毕业的时候，被带到日本“參觀”，半年之后，王裕丰从日本回来就历任日伪稅捐局股长，农产株式会社經理科长等职务。日本投降后又到国民党稅捐局当課长。1947年10月到撫順第一化学工厂（現在的石油四厂）任工务員，解放后留用。

由此証明，王裕丰不是由工人提拔起来的。他是否如譚惕吾所說的是“埋头工作，能力很强”的人呢？

王裕丰于1951年被調到北京石油总局工作，領導上发现他隱瞞和伪造历史，原来是一个假工程师。重新根据他的能力，被評为二級技术員。从此，他就消极怠工，以致在1956年上半年的半年時間，拿着人民的錢，游遍了北京附近的十四个县，还硬要領導把他用的旅費，作为出差費報銷。这就是譚惕吾所說的：这是王裕丰热爱旅行，不算曠职的事实。

对于王裕丰长期擅离职守，屢教不改，石油工业部决定对他停职停薪，但还是給以一定生活补助，希望他反省自己的錯誤。但是，王裕丰不但不反省自己，反而在1956年8月23日却帶了他的妻子和女兒，到武汉、重庆、昆明、成都等地遊逛。石油工业部发现后，才于8月30日宣布将他开除。

王裕丰哪来的錢供他在各地遊逛呢？他卖掉自己的一些东西作旅費，另一方面在沿途各地进行詐騙。在飯館吃飯不給錢，住旅館不給錢，还利用这些場合恶意謾罵共产党和石

油工业部的领导人。例如他在成都朵颐食堂吃完饭不给钱，反说：“我是被共产党员害的不能付你们的饭费，请你们记在对共产党员缺德行为负责的成都市委的账上，或者写在直接负责的石油部长李聚奎的账上”。他还对共产党进行恶毒的辱骂。别人劝他说：如此谩骂不好。他问明这人不是共产党员，又骂道：“你是共产党员培养出来的王八蛋，给共产党当狗腿子。”

去年11月王裕丰回到北京，石油工业部为了给他悔改机会仍在给他安排工作，又继续给他生活补助。而他，不仅毫无改悔之意，反变本加厉地到处对党和石油部的领导人进行攻击、谩骂，骂石油工业部的共产党员“没有一个好东西”。他还到处写明信片（已搜集到三十二件）和张贴“告市民书”反对党。写了許多恶毒的言词。

更为严重的是，今年2月15日晚九时，王裕丰带了他的妻子和女儿闯进石油工业部李聚奎部长的宿舍，破口大骂，说了許多不堪入耳的话。他还唆使他的妻女“勇敢些”，什么也不要怕，叫她们见了部长打部长，见了司长打司长。

王裕丰有神经病吗？经过医生鉴定，证明不是；王裕丰是因降级受了委屈因而不满吗？经过检查，证明他只能担任技术员；反党信件和“告市民书”是王裕丰亲自写的吗？经过笔迹鉴定，证明是。

谭惕吾所谓的“无辜的好人”，真面目就是如此。

谭惕吾说，东四区人民检察院逮捕王裕丰是“无法无天，侵犯人权”。真是这样吗？首先我们先来看逮捕有没有根据？东四区人民检察院根据石油工业部的控告逮捕王裕丰。石油工业部的控告说，王裕丰在该部的办公室与宿舍到处辱

屬干部，摔毀東西，妨礙辦公和機關秩序，東四區人民檢察院經過調查，認為石油工業部的控告屬實，即依法逮捕了王裕丰，並按照法律規定進行了偵查。偵查結果，不但證明王裕丰侮辱謾罵機關干部，妨礙公務，破壞機關秩序是實，而且更發現了他在各地假借機關工作人員名義，招搖撞騙，在北京市散發內容極為反動的“明信片”和所謂“告市民書”等謾罵共產黨和擾亂社會秩序的犯罪行為。因此在6月14日向東四區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訴。東四區人民法院經過審訊，認為王裕丰犯有妨害社會秩序和侮辱罪。因此，判處二年又六個月有期徒刑。

檢察機關按照法律規定的職權，根據控告並依法進行了偵查的案子，怎麼能說是“無法無天，侵犯人權”呢？譚惕吾說東四區檢察院無法無天侵犯人權的根據何在？

譚惕吾既然對王裕丰的案子親自進行了調查，應該是知道案情的了，為什麼還包庇明明犯有侮辱謾罵，招搖撞騙，擾亂社會秩序罪行的人？

譚惕吾是人大代表又是自稱“懂法律”的人，當然懂得“在一件案子未定案以前是不應該向外公布的”這個道理，那末在東四區檢察院對王裕丰案正在進行偵查的過程中即向外公布，而且是斷定違法逮捕，侵犯人權，還提出要“迅速釋放”，譚惕吾的真實意圖應該是很清楚的了，她想以歪曲事實的方法製造“冤”案，借以混淆視聽，激起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不滿，向黨和政府進攻。從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譚惕吾居心何在了！

(1957年7月17日光明日報)

声討反革命分子趙鴻翥

抗議反革命分子趙鴻翥利用黨整風

進行翻把污蔑肅反！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五日東北財經學院

全體教職員工學生大會通過

在黨開展整風運動以後，我院法律教研組教授趙鴻翥，假借幫助黨整風的名義，向黨展開了瘋狂的進攻。他以莫須有的罪狀，對肅反運動進行惡毒地污蔑，極盡其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反對人民民主專政的煽動。作為正直的公民，我們對此不能不提出嚴重的抗議！

趙鴻翥在五月八日光明日報編輯部召開的座談會上就曾說過：“肅反運動時，要我們對不相識的人進行鬥爭，實在令人為難。”趙鴻翥在“為難”的感慨之下，又於五月二十三日在中共遼寧省委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對我院肅反運動進行了一系列的歪曲與污蔑。他說：“肅反運動，我院領導上假定舊知識分子都有反革命嫌疑，普遍搜查，翻箱倒篋，十家就有九家搜（我未被搜查），特別是對年歲較大的與平素對領導上有意見的教師，搜查尤為嚴重。集中反省的教師有七、八十人。美其名曰集中學習，而實質如同拘禁一樣，不

准回家外出。此外，錯斗、錯捕者更是不一而足。……現已陸續釋放回校工作者有三分之二。”接着又說：“这些人……根本無罪，遭受莫須有之冤……。这样冤屈，向誰申訴？”請看！这就是赵鴻翥充滿冤声的“申訴”。

赵鴻翥是善于造謠惑众的，他懂得：人們是信任事实的。因此，为了欺騙群众，混淆視听，他千方百計地捏造出各种“事实”甚至举出具体数字来，以便使人看了之后，大有“逼真”之感。赵鴻翥的恶毒手法真是处心积虑了。

但是，事实胜于雄辯，既然赵鴻翥所举的是我院的“事实”，那末就讓我們用事实来揭穿这位“正人君子”的假面目吧！首先，赵鴻翥說：我院的肃反运动是在“領導上假定旧知識分子都有反革命嫌疑”的情况下开展的，而这些旧知識分子就是那些“年岁較大的与平素对領導上有意見的教師”。这就是說我院的肃反实际上是宗派主义的打击报复。即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扰之”。事实是否这样呢？事实是我院肃反运动，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清查出了披着人民教師外衣的反革命分子（現行与历史的）与坏分子共六十一名，占全体人員的百分之一·八，其中按反革命分子論处的三十二名，补作結論的反革命分子被国家寬大处理，不以反革命分子論处的二十九名。在六十一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中，教師中的反革命分子四十二名，占教師总人数百分之九·八八（內按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論处的十九名，占教師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四）。在这些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中，有的是血債累累、罪大恶极，有的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的間諜特务。如反革命罪犯白純义，曾历任伪县长、少将代理督察官、“勘乱委员会”委員等反动要职。亲

自迫害共产党党员和非法审讯进步人士李公仆。枪杀共产党工作人员一名，先后抓捕共产党地工人员李澤中、陶芝田等二十一人，經严刑拷打后分别送往伪中統局，警备司令部处理。同时白犯在任职期間还积极搜集我方党政情报，为国民党抓兵四千余名，征民夫万余人。該犯以反共反人民活动有功受蔣介石嘉奖。再如反革命罪犯朱济，在任蔣政权粮食部督导室副主任、河南省财政厅厅长等反动职务时，督催征粮工作，强迫河南二十余万人在寒冷雪地上搬运粮食，終日不得温飽，折磨民工死亡者甚多。当地人民对此事件至今仍切齿痛恨。此外，該犯还曾組織地主武装，任三乡联防主任，枪杀張刘氏一人。由于該犯长期效忠蔣介石有功，曾获得五等金星勋章及胜利勋章各一枚，并将他反动罪行記載于河南省“名人录”中。又如特务分子顧善和，入中美合作所第九訓練班受过通訊、武器、爆破等十余种特务技术訓練。因其“成績优良”被选拔为蔣介石侍从室特別警备組中尉組員。解放后仍与特务有过联系。又如，現行反革命罪犯吳健华，一貫仇視党、仇視人民。考入我院后，涂写反动标語达十余次，其中有的写：“我敬爱的元首希特勒”，“赴朝慰問团是瘋狂的野兽”……。（上述罪犯由于在肃反运动中拒不交代，已被逮捕法办。）把这些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清查出来，难道不是依据事实而是“假定”的嗎？难道这是宗派主义的打击报复嗎？当然，这对于反革命分子來說，是不会甘心的。赵鴻鸞硬說“假定旧知識分子都有反革命嫌疑”，其目的不外是要挑起群众，特别是知識分子对党不滿，企图混淆視听，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尾随在赵鴻鸞的“帅旗”之后，向党“兴师問罪”。

赵鴻翥为了达到彻底否定肃反，使反革命复辟的卑鄙目的，还不满足于“假定”的謊言，他还想通过詆毀肃反整个过程及其成果的办法，来煽动群众。他把我院肃反运动整个过程都說成是錯誤的，錯搜查、錯集中，“十家就有九家”，“錯斗、錯捕者更是不一而足”，“使三分之二的被捕者遭到莫須有不自之冤”。最后赵鴻翥竟声嘶力竭地大声疾呼：“这种冤屈，向誰申訴？”在此我們还是用事实來說明我院的肃反运动的真实情况吧！

(1) 搜查：赵鴻翥說：“普遍搜查，翻箱倒篋，十家就有九家”（只有赵鴻翥一家偶得幸免——“我未被搜查”）。真是这样嗎？不，不是的，这不过是赵鴻翥造謠煽动的“神通”罢了。我院被搜查的只占全体人員的百分之五·三。这些被搜查者，都是反革命和反革命嫌疑分子。“对年龄較大的与平素对領導上有意見的教师，搜查尤为严重”，只是赵鴻翥的故意捏造。

(2) 集中学习：赵鴻翥說：“集中反省的教师有七、八十名，美其名曰集中学习，而实际如同拘禁”。首先，集中学习的教师不是七、八十名，而是六十一名。在当时这些人所以要集中学习，一方面是为了不致由于肃反影响我院教学活动的正常进展，另方面通过集体学习、相互启发教育，便于反革命嫌疑分子繼續交代問題。在集中学习过程中，院領導虽对被集中学习者有一定的約束（这种約束，是为了保証集中学习者人身安全，并促使他們迅速交代問題所必需的），但并未限制他們行动与言論的自由；有事可以請假去办，星期日可以回家……。而且經常組織他們学习文件，參觀农場等等。而赵鴻翥却把这种集中叫作“拘禁”。赵鴻翥！你作

过多年的反动少将军法处长，亲自领导过残害革命志士的拘禁所，难道你们的“拘禁”就是这样的吗？

(3) 斗争与逮捕：赵鸿翥说：“错斗、错捕者不一而足”，被捕“释放回校工作”的“三分之二”，“遭莫须有的不白之冤”。事实是怎样呢？先说小组斗争：我院肃反清查对象二百五十六名，占参加肃反全体人员的百分之七点八。在这些肃反清查对象中：①定案为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的三十二人；②按照当时的政策界限属于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后来政策界限放宽不算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的二十九人。以上二类是完全斗对了的共六十一人，占全部肃反清查对象的百分之二十三点八；③补作结论的反革命分子，被政府宽大处理，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的，因当时未查证清楚或者因表现不好而被斗争的二十九人；④伪造历史，隐瞒了政治历史问题，被群众怀疑有反革命嫌疑而被斗争的一百二十八人；⑤思想极端反动被群众怀疑有反革命嫌疑而被斗争的十七人。以上三类共一百七十四人占全部肃反清查对象的百分之六十八。当时对这些人斗争是有根据的，并不算错；⑥因检举材料失实或仅因思想落后而被斗争，或虽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但过去基本上已经交代清楚，对其斗争缺乏根据者二十一人，占全部肃反清查对象的百分之八点二，这些人才是真正错斗了的。因此有百分之九十一.八的肃反清查对象是斗对了的，或者当时对他斗争是有根据的。但赵鸿翥却把这说成是错斗了很多（“错斗者不一而足”），试问你的居心何在？至于说“错捕”那也只是极个别的。我院共逮捕了三十二名反革命分子，释放回来的有十六名。其中真正错捕的只有二人。依法判处机关管制的一名；是反革命分子而

被寬大教育釋放的三名；按當時政策界限應該逮捕，現在政策界限放寬了而被釋放的十名。上述十四名當時逮捕他們是應該的，沒有捕錯。如釋放回來的張復筱為什麼逮捕他呢？僅就他任蔣政權貴陽縣長期間就曾先後殺死十條人命，其中有的是被嚴刑毒打致死的；有的是他就地槍決的；有的甚至被張割頭示眾。他以“准予隨時槍斃”的命令，命其走卒到處搜捕“行迹可疑的”“異黨分子”。不僅如此，張在任職期間，積極供國民黨反共“炮灰”，以“月月足額，人人合格”的標準，強行抓兵達五、六百名之多。甚至獨生子也難幸免。由此，引起無數農民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張以反共、反人民顯著“功績”頗得蔣政權貴州省主席吳鼎昌的稱贊。吳說：“如果每個縣長都象貴陽縣長一樣，那麼我主席成天睡覺都可以了。”這就足以說明張復筱當時反共反人民的“赤胆忠心”了。象這樣的人，難道捕錯了嗎？至於對錯捕的人，黨與政府進行了多次地調查，錯了就平反，釋放回來領導上又向其進行了賠禮道歉。這不正說明了我們的黨和政府是實事求是、光明磊落的嗎？歷史上有那個政府能對人民這樣負責呢？

上述事實證明，我院的肅反運動並沒有冤枉了好人，其進展基本上是健康的，成績是主要的。經過肅反運動，不僅查出了大批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而且大大地教育我們，劃清了敵我界限，提高了我們的思想覺悟；搞清了我們二百多名同志多年沒有搞清的历史問題，使我們放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因此，我們說肅反運動好得很！但趙鴻翥却在那大喊：“錯了”“冤”哪！足見趙鴻翥是站在什麼立場，為誰喊冤了。是啊！肅反運動查出了反

革命、挖掉了反革命的老根、徹底摧毀了反革命復辟的基礎，使趙鴻鸞作少將軍法處長，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日子一去再不能復返，這怎能不叫他叫苦連天、萬分痛恨呢？但是，先生們，你們好過的時候，人民却在受着苦難的折磨，倒轉你們的“乾坤”不正是人民的願望嗎？

當然，肅反運動中的缺點，甚至個別錯誤也是有的。由於經驗不足，加上象領導上已經檢查了的，在工作中有官僚主義與主觀主義的作風，在小組鬥爭階段，錯鬥了占肅反清查對象百分之八·二的好人；搜查面也寬了一些；個別小組鬥爭方式較粗暴；錯捕了兩個好人；傷害了一些好人的感情。這些缺點、錯誤，經過檢查發現之後，都已作了糾正。領導上還在廣泛徵求意見繼續檢查糾正。現在看來，肅反工作還有另外一個缺點，這就是可能漏掉了一些反革命分子。我們決心共同努力、繼續追查，不叫一個反革命分子漏網！

以上這些都充分地說明了，趙鴻鸞所有的“論據”，都是無中生有，蓄意捏造的。有的至少是惡意誇大。作為法律教授的趙鴻鸞雖然知道：無事生非，造謠惑眾，是犯罪行為。但對於他來講，“生活”和“犯罪”只是同義異語。趙鴻鸞所以知法犯法，正是要履行反革命固有的陰毒的“天職”，他就是想要通過他的罪惡言行來顛倒黑白，爭取群眾，煽動其餘反革命分子及右派分子，向黨領導的肅反運動進行翻把，從根本上否定肅反，達到破壞黨群之間的團結，削弱黨在群眾中的威信，最終搞垮黨，反對社會主義，反對人民民主專政，使反革命死灰復燃的目的。在我院“鳴”“放”中，不正是有些人與趙鴻鸞互為呼應，向肅反進行惡毒地污蔑與謾罵嗎？如有些人說：肅反運動是“莫須有的，是含血

噴人，借刀殺人……” 还有些人說：“肃反錯誤是主要的，成績是次要的……，” 赵鴻翥的开头一炮，燃起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一股“狼烟”，他真不愧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元老”了。在此，人們不免要問：是什么力量促使赵鴻翥这样作的呢？是由于他不了解事实真相，还是因为他老而無知、一时糊涂呢？回答这个問題，只有揭开他“正义老教授”的假面具，来看看他的原形了。

日常有些人总把赵鴻翥称之为“赵老”，以表尊敬之意。但殊不知这位“赵老”就是当年右手揮血笔，左手舞屠刀的，反共杀人的凶犯。赵鴻翥是老了，但与其說他是“岁月催人老”的，不如說他是反共，杀人的心血熬煎老的。在他杀气尤盛的历史篇章里，字里行間無一处不渗透着革命烈士的鮮血。現在讓我們揭开他的反共历史来看看他的殘忍凶相吧！赵鴻翥从一九三五年就开始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忠。由于他有凶狠的反共杀人的“才干”，曾历任多年少將軍法处长：先任“武昌行营”少將軍法处副处长，繼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少將軍法处长，后又任“江苏綏靖公署”少將軍法处长。随着这个反共“杀神”在杀人屠場上的“南征北战”，革命烈士的鮮血也随着洒遍在祖国各地。仅就其在“武昌行营”和“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少將軍法处副处长、处长期間，已查証經他判处死刑的共产党地工人員、紅軍战士就有四人：有共产党地工人員一人，因策反事泄被捕，被处死刑；另在一地工人員身上搜出三枚銅錢，被認為是联系紅軍的暗号以“中共間諜罪”，由赵判处死刑；有我被俘紅軍战士，十六岁小同志，虽受敌人囚牢生活的百般折磨，但毫不动摇对革命事业的忠誠，經常在放獄澡时，在敌人枪刀

的威胁下，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这种英雄的气魄，实堪称为革命青年的表率。但是，由于他正义的呼声，冲伤了这个军法处长的耳膜，就被判处了死刑；另一位我红军被俘干部唐大浩，虽经敌人几次审讯，坚贞不屈，在血案前表现了共产主义军事干部的高贵品质。当然，赵对这样一位对敌人威武不屈、对革命坚定不移的红军干部，是不会甘心放过的。他为了得到屠杀的“证据”，派特务假充犯人入狱骗套，终于套出了唐的真正身份——共产党员、红军干部。结果，我们这位身经百战、对革命忠心耿耿的英雄，在赵的屠刀下壮烈牺牲了！此外，据检举材料未及查实的，被赵屠杀的红军干部、战士及地工人员，还有四十余名。是凡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看到这些令人发指的滔天罪恶，除了为我们那些死在赵屠刀下的英勇健儿致以默哀外，不能不对这个反动阶级的刽子手切齿愤恨！

正因为赵鸿翥在杀共产党、杀英勇不屈的革命烈士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博得国民党反动派对他的赏识与信任。在一九三九年，经陈果夫、陈立夫的介绍加入国民党，成为特字党员。并于同年参加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据查席位是620号）。而当赵鸿翥的母亲病死的时候，蒋介石为对他这个积极效忠于反动派的反共爪牙、走狗，表示信任、宠爱还亲自勒令用飞机送挽联进行追吊。但是，无情的岁月却与人愿相违。赵鸿翥为反动派尽忠的血醒一生，终于到了“风烛残年”。国民党反动派为了使这个反共杀人“劳碌”多年的罪犯度过“安静”的晚年，终将他安排到东北大学任法学院院长。从此，这个双手血迹尚鲜的“军法处长”，一变而为高等学府里的“法律教授”了。

由以上事实可知，赵鸿翥原来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这就不难了解赵鸿翥为什么那样替反革命分子大声喊冤、恶毒地攻击肃反了，俗語說的好：

“兔死狐悲”哪！他的所有一切謬論都不过是渗透在他骨髓内的反共反人民的“一縷折光”。

这样一个罪恶昭彰的反革命分子，依据人民肃反的法制，早应伏法归案了。但政府与人民念其是一个高級知識分子，又年老多病，且又名列民主人士的行列（赵鸿翥是民革成員），为爭取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共同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本着人民利益为重的原則，对其重大罪行并未給予追究法办。在肃反运动中，既未斗他，也未搜他。肃反将結束时领导同志根据掌握的材料亲自找他談話。当时，他曾拒不坦白沒有交代过的肯定的两件血債（另两件肯定的血債，在肃反运动前已基本交代了），一直到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九日，当他知道領導上已掌握了他的确凿材料时，才吞吞吐吐地交代了。尽管如此，人民仍对他实行寬大。肃反后，省人民政协仍聘他为政协委员。試想：当年赵鸿翥仅因为喊共产党万岁，是共产党员就大揮屠刀，而今天，人民对他累累血債不仅不予清算，反給予他一定的政治地位，使他享受着人民教授的崇高荣誉。这种寬大的胸怀是多么令人心悅誠服呵！但是，赵鸿翥反而以怨报德，借党整风之机，向党肆意反扑。这种“狼性”未改的反革命罪魁怎能还容許他逍遙法外呢？“物极必反”，既然赵鸿翥对其历史罪恶毫無省悟，且忘恩負义，一直与人民为敌到底，那么人民就不应当再給予寬恕了。作为人民中的我們，不仅对他挑起翻把的阴谋表示严重的抗議，而且我們要求：

撤銷他的政協委員的身分；對其嚴重的罪惡給予徹底地清算與嚴懲！翻把是趙鴻鸞自己主動發起的，人民向他討還血債是理所當然的。不這樣，就不足以爲死者申仇，爲生者吐氣！

（1957年7月16日遼寧日報）

東北財經學院舉行大會聲討趙鴻鸞

遼寧日報記者

東北財經學院二千七百餘名師生員工，七月十五日下午舉行聲討大會，抗議反革命分子趙鴻鸞利用黨整風的機會進行翻把。參加大會的還有沈陽各大、專學校的師生八百五十多人。

自展開反右派鬥爭以來，財經學院師生憤怒地揭發和批判了趙鴻鸞的反動言行。在七月十日全院深入反右派鬥爭的動員大會上，有二千七百四十二人以個人或集體名義遞條子給大會主席，一致要求聲討趙鴻鸞。這次聲討大會就是根據群眾的要求召開的。

大會一致舉手通過對趙鴻鸞的抗議書。抗議書首先指出：趙鴻鸞在黨開展整風以後，假借幫助黨整風的名義，向黨展開了瘋狂的進攻。他對肅反運動進行了惡毒的污蔑，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反對人民民主專政。抗議書說：“作為正直的公民，我們對此不能不提出嚴重的抗議！”抗議書用事實有力地駁斥了趙鴻鸞誣蔑肅反的謬論，指出趙鴻鸞的陰險企圖是“想要通過他的罪惡言行來顛倒黑白、爭

取群众，煽动其余反革命分子及右派分子，向党领导的肃反运动进行翻把，从根本上否定肃反，达到破坏党群之间的团结，削弱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最终搞垮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使反革命死灰复燃的目的。”抗议书指出赵鸿翥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他的一切言论都不过是渗透在他的骨髓内的反共反人民的“一缕折光”。抗议书最后义正词严地说：“赵鸿翥对其历史罪恶毫无省悟，且忘恩负义，一直与人民为敌，那么人民就不能再给予宽恕了，作为人民中的我们，不仅对他挑起翻把的阴谋表示严重的抗议，而且我们要求：撤销他的政协委员的身分；对其严重的罪恶给予彻底的清算与严惩！”

在大会上讲话的有教师、学生、工人等十二人，一致愤怒谴责赵鸿翥翻把罪行，并表示要在思想上更好地武装起来，与右派分子进行坚决和无情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方信副教授说：“反革命分子赵鸿翥乘整风之机，倒打一耙，向人民进行反扑，妄想卷土重来，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他们过去虐杀革命志士的血迹未干，今天又想绞杀我们神圣的社会主义事业。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一定要粉碎他们的阴谋。”工会副主席周清泉说：“暗无天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赵鸿翥想再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操生杀予夺之权是办不到的，人民不答应。”学生会主席张珉代表全院近两千名学生对赵鸿翥反共集团分子及其他一切右派分子提出警告：“老老实实的向人民缴械投降，低头认罪，重新作人，才是你们的唯一出路。”共青团委书记李文说：“为了保卫人类永久不逝的春天，为了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利益，我们共青团员要站在反右派斗争

的最前列。”

沈阳俄专学生会主席俞紀美代表俄专全体同学講了話，沈阳医学院参加大会的三十五名同志写条子給大会主席，表示完全支持財經学院师生声討赵鴻翥。

东北財經学院院长何松亭、党委書記苏生在大会上号召全体人員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彻底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反动言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們并告誡右派分子：要彻底交代，幡然改悔，不要自絕于人民。

(1957年7月16日辽宁日报)

决不允許反革命分子反撲

沈阳市各高等学校广大教师、职工、学生于十六、十七两日分別集会，表示坚决支持东北財經学院全体师生員工对反革命分子赵鴻翥利用整风进行翻把的抗議，并表示以更坚决的态度来参加当前反右派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东北工学院的教师和学生于十六日从报纸上获悉財經学院声討反革命分子赵鴻翥污蔑肃反的消息，当天便在各系出版了大字报，一致憤慨地斥責赵鴻翥的反扑罪行。第二天，全院八千名教师职工和学生紛紛举行了会议，他們在发言中一致表示坚决支持东北財經学院师生对反革命分子赵鴻翥的声討，要給妄图翻把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和污蔑肃反的右派分子以坚决回击。左耀先教授說：鳴放初期，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真是猖狂极了，現在我們一切都明白了，他們就是妄想把国家搞垮，妄想把大家都吃了。赵鴻翥以及我院的反革命分子的反扑的事实，不就最清楚的告訴了我們：肃反不是

过火了，而是不够么？我們应当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提高警惕，给反革命分子及右派分子以坚决的回击！”全院师生和职工经过会议讨论一致通过的声讨赵鸿翥的抗议书中指出：“在我们东北工学院这次‘鸣’‘放’过程中也出现一些类似赵鸿翥这样的企图趁党整风之机翻把的反革命分子和一些猖狂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如受到宽大处理、免于刑事处分、留在学校内部继续工作的反革命分子、电力系副教授韩格坤在鸣放会上不愿事实的企图翻案，叫嚷着要‘平反’；右派分子陈尚焯说：‘肃反错误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右派分子许冶同说：‘把对领导有意见的人当反革命嫌疑斗争’，右派分子孙文山说得更加恶毒，他说：‘肃反的成绩是用许多无辜被害者的鲜血换来的……这是宁错杀三千（善良人），不漏掉一个（反革命）’。这些企图反把的反革命分子也好，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也好，他们都是切齿痛恨肃反运动的，他们异口同声捏造、歪曲事实，扩大肃反的缺点，企图以此否定肃反和通过群众运动进行肃反斗争的必要性，最后一概否定了肃反运动的伟大成绩。”抗议书最后表示：“东北工学院全体教职工、学生坚决表示，我们绝不讓企图翻把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阴谋得逞，以更坚决的态度来参加当前反右派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沈阳药学院一千三百多名师生员工集会，支持财经学院的抗议，声讨赵鸿翥。在会上发言的有二十多人。青年教师刘崇铭说：赵鸿翥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政府宽大为怀，未予追究，然而他竟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我们药理教研组的同志表示极大的愤慨。高禎玉代表药师进修班的全体同学

說：反革命分子趙鴻翥借整風機會向黨進攻，誣蔑肅反，企圖翻把。請問你有什么冤可喊的，有冤的是人民！告訴你，你當權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你得向人民認罪。全體到會者一致建議有關部門撤銷趙鴻翥的省政協委員身分、教授學銜，並嚴加懲處。

沈陽農學院教職員工、學生十六日下午分別舉行了座談會，表示全力支持東北財經學院全體教師職工和學生的正義要求。植物保護系全體教職員工當天寫信給遼寧日報編輯部，表明了他們嚴正的態度。他們在信中寫道：“趙鴻翥是個血債累累的反革命分子，早應辦罪。但黨和人民寬大為懷，不咎既往，給他悔過自新的機會，並且重用他作教授、省政協委員，希望他立功贖罪，徹底改造成新人。但他沒有痛改前非，反而利用人民給他的職權和榮譽從事反革命活動，利用黨整風的機會向黨進攻，這是我們絕不允許的。我們深深知道這一點：對敵人的姑息，就是對人民的殘忍。”

沈陽醫學院全院五千餘名教職員工和學生在十七日午後於校部大禮堂舉行了集會，駁斥反革命分子及右派分子污蔑肅反的謬論。在會上發言的師生和職工，對反革命分子趙鴻翥的翻把行為表示萬分憤慨，到會者一致通過一項“支持東北財經學院全體教師職工學員對反革命分子趙鴻翥的抗議的決議”。

沈陽師範學院、沈陽俄語專科學校的師生也集會聲討趙鴻翥的反撲罪行，一致表示決不允許反革命分子及右派分子向社會主義進攻。

(1957年7月18日遼寧日報)

我們堅決支持財經學院對反革命 分子趙鴻翥的聲討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東北工學院

教職員工學生全體通過

我們東北工學院全體教職工學生在看到七月十六日遼寧日報和沈陽日報刊登的東北財經學院全體教職工學生的抗議書和社論以後，舉行了座談，一致憤怒斥責反革命分子趙鴻翥利用黨整風的機會進行翻把和污蔑肅反的罪行。我們全院人員一致支持和聲援東北財經學院教職工學生對反革命分子趙鴻翥提出的嚴正抗議！

趙鴻翥是一個血債累累，罪惡昭彰的反革命分子，本應早就歸案法辦的罪人，但是人民寬大了他，對其嚴重罪惡未予追究。在肅反運動中，未斗爭他也未搜查他。人民對他可以說是仁至義盡了，但是居心險惡的趙鴻翥却趁黨進行整風的時候，肆意歪曲事實，污蔑肅反運動，財經學院的同志們舉出的活生生的事實，已令人信服的辯倒了趙鴻翥的謬論，我們全體教職工學生對此表示同意和支持。

無独有偶的是在我們東工這次“鳴放”過程中也出現一些類似趙鴻翥這樣的企圖趁黨整風之機反把的反革命分子和一些猖狂向黨進攻的右派分子。如受到寬大處理免于刑事處分，留在學校內部繼續工作的反革命分子電力系副教授韓格坤在鳴放會上不顧事實的企圖翻案，叫嚷着要求“平反”。

右派分子陈尙焯說：“肃反錯誤是主要的，成績是次要的”。右派分子許治同說：“把对领导有意見的人当反革命嫌疑斗争。”右派分子孙文山說得更加恶毒，他說：“肃反的成績是用許多無辜被害者的鮮血换来的……这是宁錯杀三千（善良人），不漏掉一个（反革命）”。这些企图反把的反革命分子也好，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也好，他們都是切齿痛恨肃反运动的，他們異口同声的捏造、歪曲事实扩大肃反的缺点，企图以此否定肃反和通过群众运动进行肃反斗争的必要性，最后一概否定了肃反运动的偉大成績。

但是，事实是不能抹杀的。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在事实真相面前他們就原形毕露了。经过肃反在我院共查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五十五名。另外还有补作結論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不以反革命分子論处）八十八名。在这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中有些罪恶是非常严重的。如反革命分子刘仰山系恶霸地主，解放前当过伪保长，一九四六年春与蔣匪游击队大队长唐汉卿，帶領匪游击队抓我解放军战士两名，严刑拷打后将他們活埋；一九四七年七月刘仰山参加还乡团回村进行反把倒算并主謀把我村干部十二名抓去毒打后活埋；此外还强奸妇女三名。又如反革命分子刘孝書，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在山东淮县参加匪游击队第二十六大队当兵，在此期間曾打死無辜群众两名，以后刘犯在二十六总队任特务长、連长期間，繼續为非作歹，大肆捕杀群众，仅一次刘犯領着匪兵就活埋群众三十余名。这些反革命分子殘杀無辜群众，屠杀革命战士，誰能說把这些反革命分子清查出来沒必要呢？誰能說肃反沒有成績呢？此外，肃反运动还提高了我們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这些确凿的事实，岂是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

的歪曲污蔑所能抹杀与取消的嗎？

因此我們說肅反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运动中的缺点錯誤是有的，但是次要的，而且这些缺点、錯誤已經糾正或正在糾正。

这些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运用什么“宁錯杀三千，不漏掉一人”等等的謬論来污蔑肅反运动，所以我們也需用事实来回击他們。

东北工学院在肅反运动中清查出来五十五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另外，按照过去的政策界限应算反革命，由于全国形势的变化，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了比过去更为宽大的政策，因而不把他們算作反革命分子的有三十五名，在肅反清查对象中还有补作結論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被政府寬大处理，不以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論处的三十八名，在整个肅反中被斗錯的肅反清查对象只占肅反清查对象总数的百分之十一。

污蔑肅反运动的都是些什么样人呢？如今已經真相大白了，这就是企图翻把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前者是肅反肅到他們头上，他們不仅不滿，而且切齿痛恨，后者和反革命分子有着千絲万縷的联系，不仅他們的血肉牽連着，而且阴谋企图通过污蔑肅反运动来爭取不明真相的人或立場不够坚定的人跟着他們走，以达到他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我們全体教职工学生坚决表示，我們决不让企图翻把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阴谋得逞。我們全体教职工学生完全支持东北財經学院全体师生員工撤消反革命分子赵鴻鸞省政协委员，对其严重罪恶給予彻底的清算与严惩的正义要求。我們全体教职工学生以更

坚决的态度来参加当前反右派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们全体教职工学生严正警告企图反扑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赶快幡然悔悟，立刻老老实实向人民低头认罪，只有如此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1957年7月18日沈阳日报)

支援财经学院声讨反革命

分子赵鸿翥

东北工学院八千多名师生员工集会

七月十七日东北工学院全体师生员工八千多人分别集会，对进行翻把的反革命分子赵鸿翥和右派分子污蔑肃反运动的卑劣行为表示坚决的抗议和声讨。一致通过了坚决支持东北财经学院对反革命分子赵鸿翥声讨的声援书。

一致要求撤消赵鸿翥的省政协委员职务，并逮捕办法。并又一次的表示了坚决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斗争到底的决心。

吴寿祺教授在会上说，反革命分子赵鸿翥罪恶重大，本应伏法归案，政府宽大了他，但他以怨报德，不接受改造，反过来倒算一把。对这样的人不能再容忍，应该给予严厉的镇压。体育教研室讲师许敬达说，我们对一切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都不应有丝毫的温情主义。对他们温情就是对人民的不忠。电力系讲师何文兴等人在会上说，肃反运动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缺点是个别的次要的。只要是维护真理的人

都能看到这一点。对一些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歪曲事实，污蔑肃反运动的行为一定要给予狠狠的打击。

十六日，有色系五十七金加全班同学就出了大字报，声讨反革命分子赵鸿翥。昨天，各系的学生在会上纷纷表示，一切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不向人民低头认罪老老实实重新做人的话，我们就坚决和他们斗争到底，不得胜利，决不收兵。六十金加一班张洪远等同学在会上说，对象赵鸿翥这样企图翻把的、双手沾满鲜血的反革命分子一定要给予严惩，给生者吐气、死者申冤。

广大师生员工经过这次集会座谈，反对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一致认识到有他们就没有人民没有社会主义。对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必须斗争到底，不取胜利决不罢休。

(1957年7月18日沈阳日报)

沈阳医学院举行辩论大会

声讨反革命分子赵鸿翥并通过抗议书

沈阳医学院党委于七月十七日召开了全院四千余人的辩论大会。大会上一片充满着激昂的情绪，在许多同志的发言中驳斥了污蔑肃反运动的谬论，说明肃反运动的必要性。并在大会上全体同志一致抗议反革命分子赵鸿翥利用党整风进行翻把污蔑肃反的活动，并通过抗议书。

大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陈洪权教授。在他的发言中例

舉了許多事實說明肅反的必要性，並說明肅反成績是主要的。陳教授有力地駁斥了右派分子的論調——“肅反運動搞錯了”，“要算舊帳”等等謬論，他說：這是右派分子對肅反運動的惡意污蔑，借着肅反的個別偏差造謠生非。醫學院為了辨明是非組織了一些人檢查了肅反工作，陳教授參加了這一工作，他認為肅反是全完實事求是的。陳教授激昂地說：肅反是必要的，只有肅反後才能順利地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人民是擁護的，也只有敵人反對。

接着呂毓鑑介紹了東北財經學院反革命分子趙鴻翥的陰謀活動。這時會場上的情緒更加激烈了，許多人寫了條子送往主席台，要求政府依法逮捕反革命分子趙鴻翥。

劉光漢，陳熾賢、王需等人都是肅反當中被鬥爭過的，他們都以親身的經歷說明了肅反的正確性，說明了黨對他們實事求是的處理，他們與黨的感情更加密切了。陳熾賢在發言中說：右派分子就利用我們在肅反當中不可避免的偏差，向我們展開猖狂的進攻。有些偏差是不可避免的，正象我們做醫生的能都保證對每個病人都診斷的沒錯嗎？王需是四十三期的學生，他說明肅反後，搞清了我的歷史，使我更加熱愛黨了，我還要加入共產黨，因為我感受了共產黨的公正、偉大。

最後，大會通過了一項抗議書，抗議反革命分子趙鴻翥利用黨整風進行翻把污蔑肅反活動。抗議書上一致要求撤銷趙鴻翥政協委員身份，對其嚴重的罪惡給予徹底清算與嚴懲。抗議書中還說明不能允許這種怙惡不悛的反革命罪魁逍遙法外。要求政府立即給予法辦。

(1957年7月18日沈陽日報)

沈阳市民革民盟民建等民主党派人士

一致要求将赵鸿翥依法严办

沈阳市各民主党派人士七月十六日看到财经学院对反革命分子赵鸿翥利用整风进行翻把的抗議書以后，紛紛对赵鸿翥的反动行为表示憤慨，民革沈阳市全体成員一致要求政府将赵鸿翥逮捕法办，并要求将这个混入民革的反革命分子立刻开除。

民革辽宁省副主任委員周达夫、吳家象七月十六日都发表了書面发言。周达夫說，反革命分子赵鸿翥曾有反革命罪行，人民政府对他寬大不究，他本应革心洗面，戴罪图功，不料他怙恶不悛，以怨报德，向党进攻。我建議主管部門速将赵鸿翥移送法院处理。吳家象表示，人民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对赵鸿翥决不能寬恕。民革市委員会委員潘貴綿、市組織处长佟鉄肩、市宣傳处长朱瑛都說，看过赵鸿翥的血腥罪行，已万分憤恨，他又阴谋翻把，更不能容忍，要求开除民革党籍，撤銷省政協委員职务，并逮捕法办。

民盟盟員罗貴鈞、白靖寰、毛桂芝等，都表示，对这个忘恩負义、恩将仇报的反革命分子必須法办，才能为死者申冤、生者吐气。

民建省委員会副秘書长呂宗海、市委員会組織处副处长于子敬、市委員会宣教处副处长刘永慈十六日联合发表書面发言，对披着民主人士外衣的反革命分子赵鸿翥表示切齿痛

恨。发言最后說：“我們說肃反的成績是主要的，但是却过于寬厚了，因为还把赵鴻翥这样的劊子手留了下来。我們要向他討还血債，要为死者申冤，为生者复仇。我們坚决听毛主席的話跟共产党走，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是沒有含混的，不把一切右派分子打垮，不把一切反革命分子肃清决不罢休。”

(1957年7月17日沈阳日报)

赵鴻翥反共今昔

辽宁日报記者 霍庆双 姜性善

在东北財經学院，有一位法律教授，名叫赵鴻翥，陡然看来道貌岸然；日常人們也真称他“赵老”，尊其年高。可是，在这次整风运动开始后，这位挂着老法律教授招牌的先生，却彻底露了原形；他向党 and 人民展开了瘋狂的进攻。

在平时，赵鴻翥总說他“年老力衰”了，但是在整风开始后，人們却看到他“老当益壯”，精神十足，到处活动。赵鴻翥是政协辽宁省委员会委員，过去曾当別人說过：政协会上尽是“歌功詡德”，因而他是不愿发言的。那时人們常在政协会上見到他“閉目养神”。但是在五月初的政协第三次全体會議上，他却活跃起来了。

省政协第三次全体會議的召开，是四月末五月初，正是右派分子所說的“迎春”时节，赵鴻翥一反过去的寡言沉默，亲自出馬搜集“炮彈”了。他对財經学院講師楊錫勇說：你对工薪不是有意見嗎？可以写成書面材料交我，到政

協去提。趙鴻鸞准备好材料之后，便在会上攻击起党的领导，挑撥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在台上津津有味地念打油詩：“党群誰使牆高隔，民主原来未发揚，深坐公厅听汇报，偏听偏信事堪伤。”他恐怕人們对这首打油詩注意不够，后来在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談会上又第二次朗誦一遍。

光明日报两記者到沈阳点火，找对党不满的人座談。趙鴻鸞（民革成員）經陈彥之提名，五月八日应邀出席了座談会。他在会上恶毒地說什么：“……肃反运动时，要我們对不相識的人进行斗争，实在令人为难。”

到五月下旬，趙鴻鸞就更加得意忘形了，公开替反革命分子喊“冤”，“申訴”了。在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談会上，他爭着第一个发言，他無中生有地污蔑肃反运动，說：“肃反运动，我院领导上假定旧知识分子都有反革命嫌疑，普遍搜查，翻箱倒篋，十家就有九家……錯斗、錯捕者更是不一而足……遭受莫須有不自之冤……”講到这里他加重語气地質問：“这种冤屈，向誰申訴？”趙鴻鸞在号召遭“不自之冤”的人向共产党和人民反扑了。

趙鴻鸞这种翻把斗争的策略是，首先对知识分子进行煽动，挑撥离間党和知识分子之間的关系。因此，他口口声声不离知识分子，在肃反問題上攻击党时說什么“假定旧知识分子都有反革命嫌疑”，利用工薪問題攻击党时又說“加薪者多屬党团干部，……特别是对年老教师历史較复杂者一律降至最低級薪”。他还进一步挑撥，說什么“对年老教师歧視，認为他們是廢物，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垃圾……”等等。趙鴻鸞为了使人相信他是“言之有据”，于是公开挂出法律教授招牌，在统战部座談会上第二次发言（書面发言），

板尽誣蔑之能事，說什麼由于“建国至今，主要法典尚未公布施行，給了党员领导干部”“違法乱紀、侵犯人权”等等以“可乘的机会”。

在学校里面，除非十分必要，赵鴻翥不亲自出馬，而是通过亲信門生臧显和李耕瑤进行活动。。臧显和李耕瑤都是赵鴻翥过去的学生，特别是臧显，依附赵鴻翥达十四年之久。在旧社会，臧显在赵鴻翥的卵翼之下，扶搖直上，当选过国民党沈阳市候补参議員。臧显始終不忘赵鴻翥栽培之恩，按照他的說法，他們的关系如同“父子一样”。

五月下旬，省委统战部邀請赵鴻翥座談时，赵鴻翥便叫臧显和李耕瑤給他搜集攻击党的材料。一天，財政信貸系工业會計教研組鳴放会剛結束，臧显就跑到李耕瑤家，問有什么“特殊情况”？李耕瑤說，一个团员說苏院长在一次“德才資”會議上指示过評薪的原則是：党员第一；团员第二；群众第三。臧显听到以后，喜出望外，馬上将这个“惊人的消息”告訴給赵鴻翥。赵鴻翥更如获至宝，高兴地說：“来得正好，我正缺乏材料！我准备把这一段加进去发表（指到省委统战部会上发言）”。赵鴻翥并要臧显替他写下来。臧显在写的时候，便把三項原則加以引申，演繹成为五項原則。增加一項积极分子，列为第三；把群众分为一般群众和好提意見的，列为第四、第五。而赵鴻翥在统战部座談会上发言时，又对第五項加以补充，添上“尤其是老教师”云云。赵鴻翥的发言在报纸上发表以后，臧显到处对人說：“赵老的发言太好了。”

赵鴻翥这“五項原則”在財經学院曾轟动一时，煽起了某些群众的不滿情緒，而右派分子江东更把它比拟为公、

侯、伯、子、男的封建等級制度；陈家芷在全院教師大會上質問蘇副院長，“五項原則”是不是黨給的“秘密指示”，對黨大加攻擊。在反右派鬥爭中，群眾憤怒地揭出了他們的鬼把戲：李耕瑤說的那個團員，根本未說過蘇院長指示什麼，而且他從來也沒有參加過評薪工作會議。學校也根本沒有召開過什麼“德才資”會議。那個團員只是說，他在總務處工作時，有這樣一個印象：覺得組織上衡量幹部是德重於才，而有德的首先是黨員，其次是團員，最後是群眾。別有用心的李耕瑤、臧顯、趙鴻翥，却利用這一不夠正確的說法，加以歪曲，添枝加葉，捏造出所謂評薪的“五項原則”。他們不僅造謠惑眾，而且直接找對工資待遇不滿的人點火。例如臧顯對吳樹常說：“你工作這麼久了，也不該只給這一點工薪”，他還對貿易經濟系一位教師說：“你應該是講師，為什麼還是助教？”

趙鴻翥“父子”反黨聯盟在院內也是抓住肅反興風作浪。趙鴻翥在教師中散布說：“肅反違法”，“胡風不是反革命。”鼓動駱子東講師對肅反提意見。趙鴻翥、臧顯還以“法律專家”的身份，給不滿肅反的人作“法律顧問”。陳自成想以“肅反違法”攻擊黨，但無“法律根據”，便去請教趙鴻翥未遇，又經李耕瑤介紹找到臧顯。臧顯說：“搜查違法”，“一切都違法”。李耕瑤和臧顯還慫恿陳自成在學校肅反座談會上發言，攻擊肅反，並提供材料說，某些人在肅反中“被鬥流產”，臧顯還說這“違反勞改法”。其實，這又是一個別有用心的捏造。反右派鬥爭中被他們舉例的這個人發表聲明，說她“並非流產，也未有過流產打算，孩子活着，很健康。”

赵鴻翥“父子”反共联盟还利用党委召集肃反座谈会之机大肆活动。李耕瑤在会上进行煽动說：“肃反用相面的方法是极大的錯誤”“肃反的效果是大伤元气”，会上有人說肃反的成績之一是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他則誣蔑說：这是“把人打肿了臉，还說人家长胖了”。可是他們否定肃反的企图破产了。李友生在会上发言，抵賴血債，企图翻案，遭到与会同志的严厉駁斥后，李耕瑤埋怨李友生說：“第一天（指肃反座谈会）我們打了一个大胜仗，第二天打了一个平仗，第三天叫你給打了一个敗仗”。可是他們还不服輸，臧显、李耕瑤极力支持李友生登报声明，否認他有血債，臧显并帮助李修改声明稿，以爭取沈阳日报发表。

臧显还对李友生說：“你不了解，現在这是政治斗争！”并說：“現在是对毛主席的考驗，毛主席能不能掌住舵，我看不保險。”原来赵鴻翥、臧显之流，認为共产党会“掌不住舵”，才大举进攻的。然而他們打錯了算盘。

在反右派斗争中，东北財經学院教师憤怒揭发和批判了赵鴻翥的反动言行。这时，赵鴻翥又企图藏头露尾蒙混过关了，說什么他感到愧、悔、恨。还說什么用鏡子照也照不出他有反共、反社会主义阴谋。然而在赵鴻翥这些右派先生們給群众上了最深刻的政治課之后，还有誰相信他的謊言呢？

赵鴻翥反共不是从今天才开始；他大喊大叫，为反革命分子“申冤”不是偶然的。翻开赵鴻翥的历史就可以看到，他自己原来就是一个血債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的老劊子手。一九三五年，当紅軍还在南方革命根据地的时候，赵鴻翥便担任伪“武昌行营”軍法处副处长，亲手用血笔判决，屠杀了我方一名策反东北軍王以哲部

的地下工作人員，雙手接收了由六名匪兵保護從南昌送去的
一個人頭。（據說這是我高級幹部徐彥剛同志）。當紅軍長征
的時候，劊子手趙鴻翥也“轉戰西北”，升任偽“西北剿匪
總司令部”少將軍法處處長。一九三七年又任偽“江蘇綏靖
公署”少將軍法處處長。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趙鴻翥在西安
任偽“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少將軍法處處長時，正是紅軍北上
抗日之際。軍法處拘押我被俘紅軍二百餘名，趙鴻翥及其部
下審訊時嚴刑拷打，威逼利誘，最後有些人判處死刑，大部
判處長期徒刑，僅一小部分“押解回籍交地方嚴加管束”。
被俘紅軍戰士中，有一名十六歲的青年，在押期間堅貞不
屈，每天早晨“放風”時高呼“共產黨萬歲”。一天，被殺
人不眨眼的軍法處處長趙鴻翥聽到，立即下令槍決。紅軍干
部、共產黨員唐大浩同志，在趙鴻翥送次審訊時表現了對革
命赤膽忠心的英雄氣概，不吐實情，趙便令其親信假充犯人
入獄，套出“口供”，終于屠殺了這位革命戰士。劊子手們
從一位同志的身上搜出銅錢三枚，趙鴻翥認為銅錢是聯絡紅
軍的暗號，便判處死刑。

最近趙鴻翥開始大談“良心”，說什麼“在舊社會我是
為統治階級服務的，但是我的良心未泯滅”。從上面的事實
可以看出趙鴻翥的“良心”是什麼東西！他忠心耿耿效忠國
民黨反動派，一手拿着血筆，一手提着屠刀，喪盡人性地殘
無人道地屠殺為人民、為革命赤膽忠心英勇奮鬥的戰士們！

僅據現有檢舉材料，經趙鴻翥親自審判處死的我黨地下
工作人員和紅軍指戰員，即達四十多名，已查實者有四名。
正因為趙鴻翥有着如此的反共才幹和“偉績”，所以頗得國民

党反动派賞識。一九三八年八月經陈立夫、陈果夫介紹加入国民党，为特別党员。一九四五年出席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赵鴻翥母亲病故时，蔣介石亲自特派飞机送輓联。赵鴻翥在历任軍法处长、法院院长等重要反动职务之后，又到伪东北大学担任法律系教授，后升为法学院院长。赵鴻翥的“法律专家”招牌就是这么挂上的。因为是这样，赵鴻翥解放后只講半年課，不仅錯誤百出，而且講稿是出自別人写好的东西。有一次他临时上課，保存講义的人因对他有意見不交給他，竟急得他落淚一場。

在解放后的这些年里，党和人民政府对待赵鴻翥这样一个血債累累的反革命分子，真可說是仁至义尽，不仅未严厉懲办，还本着团结旧軍政人員建設社会主义的精神，給他改造机会，繼續令他担任人民高等学校教授，并选他作了省政协委员。就是在肃反运动中，对他也未进行斗争和搜查，只是在运动末期，学院領導上找他談两次話，耐心教育他悔过自新。除了共产党，还有誰能做到这样大仁大义！

然而，狼总是要吃人，赵鴻翥对党和人民是恩将仇报。他一直是拒不交代严重的罪恶或只是避重就輕的交代点滴，蒙混过关。如把他和他部下审处的二百多名被俘紅軍說成“长征掉队男女老弱农民”，并不交代直接审处实情。就是在肃反运动中，檢举材料紛紛，他还向学院領導上說什么“对我的历史來講，知我者同情于我，不知我者不免大吃一惊！”是的，頑抗到底的反革命分子自然会同情他这个劊子手，而他对反革命分子也一直在倍加同情，并且与一些反革命分子往来甚密，相互勾結。他曾为他的部下、伪軍法处軍法官桂承阳伪造历史証明材料，欺騙人民。肃反运动中，在

財經學院被捕的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白純義，要求趙為他出庭辯護，趙欣然答允，白純義入獄後，趙鴻翥還入監探望，真是表現了高度“同情”。他還主動對一個肅反被鬥對象說：“如你被捕，我願以法律觀點為你辯護。”知道了這些，我們就更加容易理解，趙鴻翥為什麼特別賣力氣地為反革命分子“申冤”了。

在反右派鬥爭中，東北財經學院師生以極為憤怒的心情，聲討了反革命分子趙鴻翥利用黨整風之機進行翻把。他們說：“翻把倒算是趙鴻翥自己主動發起的，人民向他討還血債是理所當然的。不這樣，就不足以為死者申仇，為生者吐氣！”這是中國人民的正義聲音，是對仍然處心積慮圖謀不軌的反革命分子的嚴厲警告；如果繼續與人民為敵到底，就一定遭到人民正義的裁判！

(1957年7月16日遼寧日報)

聲討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趙鴻翥

東北財經學院副教授 修哲暉

趙鴻翥是一個罪惡重重、血債累累、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在蔣介石黑暗統治的年代里，趙鴻翥曾先後任偽武漢行營少將副軍法處長、偽西北剿“匪”總部少將軍法處長達數年之久。現僅就初步調查証實的，在此期間死在趙手中的我紅軍中、高級幹部就有十人，一般幹部達二十人之多。趙鴻翥真不愧為一個雙手沾滿了革命烈士鮮血的特號劊子手！

趙鴻翥混入革命隊伍之後，黨和政府念其為高級知識分

子，期望他能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力量，乃本着既往不咎的寬大政策，給予他大學教授的崇高榮譽，又聘請他擔任遼寧省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委員。黨和人民可以說對他仁至義盡了；但趙鴻鸞不僅毫不感激，相反的却恩將仇報。

趙鴻鸞一貫敵視人民，仇視社會主義，對中國共產黨更是刻骨地仇恨。在土地改革運動時，趙就為反動的地主、富農喊冤、辯護。他說什麼“土改只要分土地就行了，殺人是對的。要殺人也要經過法律手續而不能讓群眾在大会上活活殺死”。這真可以說是“冤死狐悲，物傷其類”！在肅反過程中，趙千方百計地袒護反革命分子並願為他們作法律辯護人。在這次幫助黨整風過程中，趙借着大“鳴”、大“放”，捏造事實，顛倒黑白，大肆攻擊肅反，污蔑我院肅反全部過程都搞錯了（即荒謬地認為小組鬥爭、搜查、集中學習以及逮捕等都搞錯了），企圖翻把倒算。更惡毒的是，趙竟勾結臧昱、李耕瑤等右派分子組成反黨聯盟，有組織、有計劃的到處點火，造謠生非，挖尽心機地污蔑和丑化肅反，煽動群眾對黨不滿，猖狂地向黨進攻。此外，趙還惡毒地捏造評工薪的所謂“五項原則”（即所謂“黨員第一，團員第二，積極分子第三，一般教師第四，老教師第五”），挑撥黨群關係，破壞黨與群眾的團結。趙鴻鸞這一系列的陰謀破壞活動，目的就在於破壞黨的威信，動搖黨的領導，取消社會主義，妄想把歷史車輪拉向倒退，使反動的地主和資產階級復辟。對於這樣忘恩負義的反革命分子，我們不能不進行堅決的聲討。

趙鴻鸞對於他所犯的重重罪惡、累累血債，幾年來不僅不坦白交代，反而千方百計地企圖隱瞞、抵賴；對於他在这

次趁党整风之机所进行的一系列的阴谋破坏活动，一直拒不交代，而且毫無悔改的表现。必須指出，赵不仅是一个双手沾滿了人民鮮血的罪大恶极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而且是一个有着严重破坏活动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为此，我坚决要求我院組織上应将赵鴻翥从人民教师队伍中立即清洗出去；要求辽宁省人民政治协商會議立即将赵鴻翥的委員职务撤消；要求我們人民政府对赵鴻翥严肃处理！

最后，我們还要郑重地警告那些跟赵鴻翥結成反党联盟的右派分子以及其他右派分子：你們必須馬上站出来，老老实实地向人民交代你們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种种罪行，彻底地繳械投降、低头認罪。否則，你們必将自絕于人民。

(1957年7月17日辽宁日报)

不容許反革命分子污蔑肃反

东北財經学院 副教授 方 信
工业經濟系

双手沾滿烈士鮮血，罪恶深重的反革命分子赵鴻翥，对人民給他的寬大和荣誉，毫無感激之意，反而以怨报德，利用党的整风，与其罪恶联盟，四出活动，無孔不入，無洞不鑽，平空祭起一陣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杀风，企图翻把倒算，猖狂跋扈，达到了瘋狂的地步。

根据业已揭发的材料，他們在帮助党整风的幌子下，采用了以下的方法，来进行其反党的活动。

首先，他們大肆宣揚我院評定工資的标准有所謂“五項原則”（黨員第一，團員第二、積極分子第三、一般群眾第四，好提意見的第五），而事實上，這完全是他們的虛構，無非是想以此挑撥黨群關係，造成思想混亂，為他們的陰謀活動尋求更多的市場。

其次，他們密室畫謀，暗暗拋出一張塗有十三個圈圈、陰陽怪氣的所謂“教授治校”的組織設計圖，四處傳播，策動各民主黨派內的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廣為叫囂，企圖造成聲勢，以奪取共產黨在學校的領導權。“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們的這種企圖，其最終目的，無非是要動搖國本，進行資本主義復辟。這真是一批狂妄無知、異想天開、中風狂走、放縱卑劣的蠹賊鄙夫。他們的幻夢，不出一月便在人民的回擊下煙消雲散，只落得一個向隅而泣，欲降不降的可憐樣子。

當他們猖狂的時候，為了要达到上述罪惡的目的，會和其他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一樣，企圖在業已取得巨大成就、會為我社會主義革命高潮的到來鋪平道路的偉大的肅反運動的問題上，打開缺口，向黨進攻。他們披着“法律專家”的外衣，借着大“鳴”大“放”的由頭，不顧是非，顛倒黑白，對我肅反運動極盡其污蔑的能事，他們認為肅反過程中的小組鬥爭、專案鬥爭和定案的各個階段，都完全錯了。

試問，沒有在小組鬥爭中所發揮的群眾力量，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能夠自動的投降嗎？敵人不會自願地退出歷史舞台，難道這不是一個盡人皆知，最起碼的常識問題嗎？敵人之能夠自首投降，毫無疑問，群眾的壓力是起着巨大的作用。鬥爭而不要群眾，這就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難道這是難於明

白的道理嗎？而趙鴻翥却在說甚么“肅反運動時，要我們對不相識的人進行鬥爭，實在令人為難”。我必須指出，小組鬥爭是揭發和清查反革命分子所必不可少的武器，反對小組鬥爭是右派分子代表反革命分子向人民進攻的謠言。當然，趙鴻翥本人就是反革命分子，無怪乎他自己要再三言之了。

總之，趙鴻翥及其反黨聯盟之所以要千方百計地污蔑肅反運動，其目的就是要造成更大的混亂，以便混水摸魚，並為他們的反黨陰謀招募更多的同盟軍。

誰也不能否認，我院肅反運動乃至全國的肅反運動，成績都是主要的，而錯誤偏差是極其個別的，這是有目共睹的客觀事實，不容任何人予以歪曲。

就我院肅反而論，定案為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壞分子的有三十二人之多，有了一個反革命分子都不得了，而我們清查出來三十二人之多，難道這不是巨大的成績嗎？至於按照當時的政策界限屬於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壞分子，後來政策界限放寬不算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壞分子者也有二十九人之多，以上二類是完全鬥對了的，共有六十一人，占全部肅反對象的百分之二十三點八。至於補作結論的反革命分子、被政府寬大處理、不以反革命分子論處的，因當時未被查證清楚或者表現不好而被鬥爭的共二十九人，另外偽造歷史、隱瞞了政治歷史問題、被群眾懷疑而被鬥爭的一百二十人，再加上思想極端反動、被群眾懷疑有反革命嫌疑而被鬥爭的為十七人，以上三類為一百七十四人，占全部肅反清查對象的百分之六十八，我們對這些人鬥爭是有根據的，並不算錯。如將以上五類人員相加，則共占肅反清查對象的百分之九十一點八，難道這還不足以充分說明肅反運動的成績是主要的嗎？鬥錯

的人仅二十二人，只占全部肃反清查对象的百分之
其中高級知識分子仅为两人而已。这还不足以說明，偏差錯
誤是极其个别的嗎？而反革命分子赵鴻翥却再三的在說，
“錯斗者不一而足”，这不是無耻的謔言，又是甚么呢？

我便是极少的几个被錯斗者之一，但是我就始終沒有認
为肃反运动是不正确的。我和其他絕大多数的同志一样，都
清醒地看到肃反运动是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設事业所必不可缺
的，它的成績是主要的，而偏差缺点是极其个别的。办一件
事，并且办这样大的一件事，要絲毫沒有缺点，那岂不是太
不合事物进展的客观規律嗎？那岂不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
的想法嗎？而且組織上对我们个别錯斗的人，及时进行了平
反和賠礼，試問古今中外，除了我們的共产党外，又有那一
个执政党能够这样做呢？經過了肃反，我更靠近党了，而党
也更信任我了，就以肃反的个别缺点而論，也产生了这样良
好的后果。

但是，赵鴻翥及其反党联盟，則时时刻刻在对我們偉大
的肃反运动，极尽其污蔑的能事，我們無以名之，只能名为
这又是“好得很！糟得很”这个老問題的再一次的重复。这
無非充分說明了赵鴻翥一伙，以及其他对肃反污蔑的右派分
子，他們和我们絕大多数的人民是站在不同的立場而已。

罪行深重、血債累累的反革命分子赵鴻翥，几年来不但
对其过去的罪恶拒不交代，而且利用党的整风翻把倒算，企
图动摇国本，进行資产阶级复辟，实屬可恨已极。我完全同
意我院全体师生員工一致通过的“对反革命分子赵鴻翥利用
党整风进行翻把污蔑肃反”的声討書，并建議政府將他从人
民教师的队伍中清洗出去，撤銷他的省政協委員的身份，并

依法予以严惩，为死者申冤，为生者吐气。

最后，还必须指出，我们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斗争还在深刻发展，这一场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所广泛展开的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斗争是曲折和复杂的，并且在有些时候还会表现为非常激烈和尖锐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积极地投入战斗，使斗争深入下去，坚决地对右派分子进行彻底地批判，和无情地揭露，右派分子如不回心向善，从反动转向革命，那就表明他们要自绝于人民，而人民也决不会答应的。

(1957年7月18日辽宁日报)

赵鸿翥“教授”的反动行径

东北财经学院 陈福松 张文选

借党整风之机，血债累累的右派分子赵鸿翥认为反扑的时机已到，于是尽其所能大肆造谣挑拨、煽动点火，向党猖狂进攻，与其亲信门生李耕璠、臧显等结成“父子联盟”，妄想乘机推翻党的领导。过去赵鸿翥一直是披着人民教师的外衣欺人耳目。现仅据以下几点揭开他的头上黑纱来看一看赵鸿翥的狰狞面目。

赵鸿翥从“刀笔”起家之后，鑽入了旧东北大学，一跃而为法律教授。当“一二·九”及“一二·一六”学生运动时，赵鸿翥不惜一切以“要员”身份由陕西到北京阻止学生的爱国行动，再三力“劝”学生“救国莫忘读书，读书才能救国，敌强我弱，要待政府充分准备，目前忍辱负重，不可

輕舉妄動”，并建議將東北大學先行遷至西安，以便使學生安心上課。當祖國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嚴重情況之下，全國各地掀起了抗日民主運動的高潮，在中國共產黨組織和直接領導下爆發了“一二·九”及“一二·一六”青年抗日愛國運動。但卻遭到了國民黨反動軍警的毆打和刺傷。而趙鴻鸞當此大敵當前的時機，卻賣國求榮對敵“忍辱負重”，用另一種毒辣的方式——演講來阻擾這個轟轟烈烈的運動。不但如此，當祖國人民英勇鬥爭消滅了日寇在中國的侵略之後，全國人民一致要求和平，但是國民黨反動派卻不惜一切挑起反人民的內戰，因而遭到全國人民的激烈地反對，所以在北京的学生則于一九四八年七月五日，爆發了“反飢餓、反迫害、反對內戰”的大示威遊行。在此時趙鴻鸞也枉費心機地出面“勸告”學生安心讀書，切勿外出遊行，象趙鴻鸞這種站在反動階級立場，為了緩和革命鬥爭情緒的行動，這與“五四運動”時期帝國主義的忠實走卒胡適出面勸說學生復課之舉毫無區別之外。

趙鴻鸞自混入革命隊伍之後，也是一直站在反革命的立場與人民為敵的。他一直是隱瞞了他的嚴重歷史罪惡，披着人民教師的外衣，從事他不可告人的活動，因此與其舊屬、門徒往來甚密。趙鴻鸞為了掩護其女婿黃嘉漢（偽遼寧省財政廳長），當北京解放前夕，趙曾發給他一張偽東北大學的空白聘書（實際黃根本從未在東大任過教），同時還發給張振武（偽遼寧省稅務局長）及姜學謙（偽滿最高法院院長）各一張法律系教授的空白聘書，以便為其解放後掩蓋其身份。一九四九年十月，趙鴻鸞又為其舊屬原匪“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軍法處”軍法官桂承陽，向組織偽造歷史作証，以達

到他們彼此互相包庇、互相隱瞞罪惡的目的。

在肅反時，趙鴻翥不但為被鬥的對象撐腰，而且願為業已逮捕法辦的反革命分子出庭辯護（未遂）。肅反運動開始時，趙鴻翥即裝出一副“善人”的姿態，首先表白自己從舊社會到現在，對人的看法總是考慮好的一面為多，因此也就常常認為誰都是好人，……這裡不免要問一問趙鴻翥：既然如此你在蔣匪“武昌行營”“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江蘇綏靖公署”任少將軍法處長時，所屠殺的那些為祖國而鬥爭的共產黨員革命幹部和紅軍戰士，他們為革命而死于你的屠刀之下，應作如何解釋？那麼直到今天你仍然認為這許多死難烈士，在你來說都是應得之罪嗎？這些為革命英勇犧牲的烈士都不屬於你所謂的那種好人之列嗎？因此趙鴻翥在肅反運動中，竟欣然答應為現已判刑的反革命分子白純義出庭辯護，但當時趙原參加政協組織無暇，而公開要求法庭延期開庭，法院因而未允，所以他的心願未能實現，事後趙却親自前往監獄敘述衷腸，以免他的老朋友見怪。同時在肅反運動中群眾情緒正在激昂的時候，趙竟散布說某某被鬥是由于他“亂講”，把“問題講大了”。他又對某被鬥對象說：“如果你被逮捕時，我願以法律觀點為你出庭辯護。”從這些事實不難看出趙鴻翥是完全站在反革命立場。

趙鴻翥曾經大批屠殺我們英勇的革命烈士，死于他手下的人真是難以數計。請看下列事實吧！

當趙鴻翥任匪“武昌行營”和“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軍法處處長期間，正是我紅軍長征北上抗日的時候，他們俘虜了我大批長征紅軍，其中有一僅十六歲的同志，因在他們監押中喊了“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則被趙鴻翥的朱筆

一勾而杀害了；还有一次从一个人身上搜出三个銅制錢而被認為是“勾結紅軍的暗号”而被赵判处死刑。

除此而外，赵鴻鸞任軍法处长期間，为了达到他屠杀革命志士的目的，不惜一切使用刑訊、詭騙、威胁、利誘等办法，殘酷之甚，聞之发悚！

繼之又任了江苏綏靖公署的軍法处长和襄城地方法院院长，这就是时常自鳴为教过二、三十年書的文質彬彬的“教授”的資历。实际倒不如說他是右手勾紅笔，左手揮屠刀的大劊子手！

赵鴻鸞对土地改革进行污蔑，他認為不应斗爭地主，农民分得土地就行了，否則也应当有法律上的約束。土地改革本是五亿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領導之下，打垮了封建統治，摆脱了地主的压迫，改变階級关系的一个偉大翻天覆地的階級斗爭，但心怀巨測的赵鴻鸞却以法律的烟幕为地主階級喊冤！在肃反中又为一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喊冤。

特别是他对自己的血債累累的罪惡却外表安然，若無其事，向領導表示，对他的历史來講“知我者同情于我，不知我者不免大吃一惊！”这就是赵鴻鸞对自己罪惡历史所抱的抗拒态度。誰不曉得在国民党时做为一个軍法处长若不杀几个共产党员，恐怕赵鴻鸞自己也早已掌握不了那支“朱笔”了！从事实來講也早已断定他的血債难以数計，这岂能是他們的小集团中所謂“知我”的那些同案旧屬主观愿望所能否定的嗎？从你杀人的事来看，有那个正直的中国人民听聞之后不为大吃一惊呢？我想也只有是你和象你一样的劊子手，看殘杀共产党员是屬司空見慣平常的事！

赵对工資改革捏造“五項原則”歪曲工資政策，試問赵

鴻鵠人民給你的工資還算少嗎？究竟你混入革命后这些年来給人民干了多少事情？你在几年来开了一次課却以偽“六法”为基础、販賣反动統治階級統治人民的毒素，伤害了青年学生。你自認爲“懂法”，这样来做不是犯法嗎？当今天人民体察了事实向你提出責問时，你却無言以对，支吾搪塞地以“老糊涂”为借口，企图还要迷惑群众，今天事实已經大白，在鉄的事实面前無法抵賴了，这就是赵鴻鵠向党进攻污蔑党的政策的鉄証。

誰能容忍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劊子手列身于人民教师队伍、任其毒害我青年一代呢？于九泉之下的为祖国而牺牲的英勇烈士又何能瞑目呢？过去党本着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共同建設社会主义的方針，不咎既往，特別寬大处理，赵鴻鵠自应反躬自省，体会人民的寬大，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以贖前罪为是，但赵鴻鵠反而变本加厉以德报怨，处心积虑向党、向人民凶恶进攻，企图顛复社会主义制度，为蔣匪集团复辟开路，自絕于人民，其后果将必遭到人民正义的裁判！

(1957年7月18日沈阳日报)

揭穿右派分子赵鴻鵠一貫的反动言論

东北財經学院 王 冶 謝少卿
屠尚謙 王为汉

为了彻底揭穿赵鴻鵠的鬼臉，追溯他过去一些言行，就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出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一貫性。

(一) 在一九五四年赵鴻鵠在講民法基础的时候，曾經說过：“新中国的人民的法律（当然包括民法在內）……它

乃是反映着已取得胜利并掌握政权的四个阶级（工农、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意志，……”。从这段原话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赵鸿翥的思想深处所向往的是什么了。

我们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我们国家的法律只能是反映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同工人阶级的联盟继续存在，民族资产阶级有他一定的政治地位，然而他却是被领导的阶级，被改造的阶级，最后作为一个阶级将被消灭。我们的法不能反映资产阶级的意志。如果按照赵鸿翥的荒唐的谈法，我国的法律不是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力武器，将成为五颜六色的混合物。这不仅抹煞新中国法律的阶级性，而且也给资产阶级贩运旧法大开方便之门。赵鸿翥平时念念不忘“旧法零件可用论”，这个意思就是说国民党伪六法中某些具体部分，可以勿须改造直接应用。这种反动的谬言早在一九五二年司法改革运动中，批判得体无完肤。而赵鸿翥却对这种反动的谬论恋恋不舍，无时无刻不在企图使伪六法复活。

（二）在一九五四年讲课时说：“法权规范一般是指国家政权机关所颁布的法典而言。以外包括国家认可的习惯上面或其他共同生活规则上面”，后来曾遭受同志们的批判。因为法典反映法律规范的，但是法律规范并不等于法典。没有法典并不等于没有法律。如果按赵鸿翥的说法可以引伸出：法典就是法律规范，新中国法典尚未颁布，当然也就没有法律，这就是污蔑新中国没有“法治”。最近他在辽宁省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书面发

言中提出：“甚至个别党员干部有违法乱纪、侵犯人权的行为，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产生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法治”……，建国前夕、中共中央业已发布指示，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其他一切反动法令。建国至今，虽已颁行一系列的单行法令，而主要的法典如民法、刑法……迄今尚未公布施行，有的重要事情无具体明文规定。”又说“全凭主观判断”、“偏左偏右”、“是非不明”，这真是瞪着眼睛说瞎话，真是毒辣的恶意攻击。

虽然我们今天的法制还不够尽善尽美。但也绝不象赵鸿翥所说那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宪法颁布前后，已经制订了许多重要法律规范，约三千多件。宪法第十八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从宪法、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国家要求任何人必须严格遵守法制，而且在民事刑事以及反革命案件中，都是是非分明，公正判处的。赵鸿翥所以如此颠倒黑白，不过是变象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罢了。

(三) 在“鸣放”初期，文汇报登载了右派骨干分子杨兆龙的“法律界的党与非党之间”一篇反动文章，赵鸿翥极为赞扬。当时对教研组几位青年说什么一九五二年司法改革运动把旧法人员都调出司法机关，而把一些没“文化”的工农干部调去搞司法，既不懂法律又没有文化，造成当时司法的混乱。他并且说，当时在沈阳有两个人打官司，一个人是工人，一个是资本家，而审判员不问青红皂白，一听是工人和资本家打官司就判决工人的胜诉。我们看赵鸿翥是怎样在丑化我们的司法干部，把我们的人民司法说成什么样子，这难道不是造谣和污蔑吗？

不錯，我們的司法干部是有些工农出身的，他們都是有多年革命斗争經驗，忠于人民事业的优秀干部，他們認真地执行党的政策，立場坚定、实事求是，他們沒有资产阶级的旧法观点，比赵鴻翥之流可以說强百套。

（四）在一九五四年宪法頒布后，赵鴻翥仍然引用共同綱領講授民法基础。当教研組同志提出批評后，他却說，如果共同綱領条文不与宪法抵触，而又比宪法規定更为明确具体化，为了教学上更有深刻明确的認識，“还是可以引一下的”。那么，我們看看赵鴻翥是怎样引用的吧：

赵在講稿中写道：“宪法和共同綱領是我国民法主要的渊源，因为它是国家根本法”。認為共同綱領的經濟政策可以作为我国民法的渊源。赵在宪法頒布之后仍然把共同綱領作为我国的根本法是显然別有用心的，因为宪法明确規定了党的领导、規定了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性質、也規定了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这些极为重要的原則在共同綱領中不是不明显，就是不具体或是沒有。共同綱領的經濟政策是各种經濟各得其所，宪法則規定进行改造。赵鴻翥依然欣赏共同綱領，實質就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党的领导，梦想資本主义复辟。

（五）赵鴻翥的反动思想在教学檢查时得到应有的批判后，他並沒有真正拋棄，反而采用封閉的办法暗中潛伏。平时向不暴露。

整风运动开始以后，赵鴻翥認為时机已到，便大肆活跃。在政协、省委统战部、光明日报記者招待会上，接二連三的，別有用心的大肆造謠、污蔑，否認肃反成績，歪曲党的工資政策，从法律角度挑撥党群关系，向党进攻。

赵鴻翥不仅利用公开场合向党进攻，而且每次会后回来还要向群众散布一番，例如他向教研組一个同志說：“胡风不是什么反革命，而是和周揚这个家伙合不来就被关起来啦”等等。

同志們：我們必須提高警惕，集中我們的火力彻底打垮这一狡猾頑固的右派分子。赵鴻翥不向人民低头認罪，不交代出他和臧显、李耕璠的关系，我們决不罢休！

(1957年7月18日沈阳日报)

用事实反击反革命分子的反撲

辽宁省商业厅 陆 周、兰甲第

我們坚决支持东北財經学院全体师生員工对污蔑肃反并企图翻把的反革命分子赵鴻翥的声討。我們是省商业厅所屬单位肃反运动的参加者，我們要用具体事实来反击赵鴻翥的反动謠言。

省商业厅所屬单位参加肃反运动的职工，共有三千八百零四人，肃反对象一百六十九人。在党的正确政策指导下，在这些对象中清查出国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四十五人。其中按反革命分子論处的三十五人，补作結論不以反革命分子論处的十人。另外，查証清楚一百一十九人的政治历史并做出了結論。純屬于身錯的仅有一人（另有四人按审干处理的）。在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中，有的是罪恶深重血債累累民憤很大的反革命分子，有的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間諜特务分子。对这些坚决反人民反革命的分子难道不應該肃清

嗎？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並不是誰凭空捏造出來的，更不是“領導假想”出來的。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清查出來，是大快人心，人人稱是的好事。但是竟有人出來抱打不平，說“冤屈”他們啦，要“申訴”啊。原來喊叫的竟是一些雙手染紅人民和革命烈士鮮血罪惡深重的反革命分子。他們丑惡的嘴臉不難識破，他們借機興風作浪，大喊大叫，張牙舞爪，大罵肅反“搞糟了”，不外是企圖欺騙群眾，混淆視聽，進行翻把活動。

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說“肅反不應該搞群眾性運動”。事實證明，發動群眾搞肅反完全必要，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絕大多數是在群眾的揭發檢舉下真相大白的。反革命分子怕群眾運動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們的罪惡沒有比廣大群眾更清楚的了，群眾的眼睛是瞞不過去的，群眾性的肅反運動最能揭他們的老底。

當然，我們單位和其他單位一樣，在肅反運動中有過一些缺點和錯誤。由於我們學習與掌握貫徹黨的肅反政策不夠，在清查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工作中有錯有漏，特別是漏的較多。在復查階段中，發現五件結論的某些情節不夠恰當，按照黨的政策做了修改，並做了善後工作。同時也從錯定為政治歷史問題的人員中查出漏掉的十名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肅反運動告訴我們，清查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是一項既複雜又艱巨的工作，運動中產生某些缺點和個別錯誤是難免的。

我們的肅反運動搞得很好，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借機極盡其污蔑的能事，向黨進攻，這是我們絕對不能允許的。

（1957年7月19日遼寧日報）

声討右派分子張百生、黃振旅

張百生、黃振旅的言論是荒謬言論

六月十一日上午，沈阳师范学院全体教职員繼續开会鳴放、李承烈、于延年、吳宗涵等教师在发言中駁斥了張百生、黃振旅在十日会上发表的荒謬言論。

中文系講師李承烈发言批評了張百生、黃振旅的言論。他說：張、黃两人的发言，从他們接触到的一些事实来看，我們可以研究；但对他們对于这些事实所作的結論，我是不同意的。尽管他們发言时反复強調“要用历史观点”看待他們提出的問題，实际上恰恰是他們的发言很缺乏历史观点，而且缺乏階級观点，以致在根本問題上不能不得出錯誤的結論。

李承烈說，有人說張、黃两人的发言很明朗，我看还有不明朗处。他們說“关键在于取消党的絕對領導权”，这“絕對領導权”的說法就是躲躲藏藏的，什么絕對領導相对領導？不如明說了：党不應該說了算，應該不是說了算，應該取消党的領導权。他們說什么絕對領導权，不过是弄得概念混淆，讓我們分析起来发生困难。他們全部发言的三个标题——“中共中央是三害的发源地”“关键在于取消党的領

导”“根本問題在于彻底革新社会制度”，前后是有联系的，前面两个部分是为最后作出“彻底革新制度”这一結論打下基础。但是前两部分的立論站不住脚，要談改革就很难使人同意。

張、黃二人說鎮反杀人太多，肃反搞运动沒有必要，李承烈說，杀人是否太多，問題不在是七十万，还是五十万，还是五个，而在于是否該杀，是否根据政策办事。是政策錯了，还是执行政策有問題。党沒有說当过旧軍政人員就杀，我自己还当过国民党少校秘書，但我的脑袋还健在；我們学校里有的同志过去做过国民党的省党部書記，国民党軍令部的中将今天也在場；我父亲是地主，現在好好住在南院，亲戚中也有地主，但是我們乡里只有一名地主因为罪大恶极被关起来，并没有杀头。鎮反中发生偏差是可能的，因为这是运动，正如土改中农民起来后由于义憤填胸打死打伤地主，但是这是否應該由党中央負責呢；肃反中确定对象，也是應該的，既然有嫌疑，帮助他搞清楚，有什么坏处呢？是好人，誰也冤枉不了；是坏人，誰也跑不了。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下面在执行政策时可能偏左偏右，但不能因此就說鎮反杀人杀多了，肃反是搞錯了。張、黃二人說，反革命分子由公安部門对付就行，这也是錯誤的。正因为經過鎮反，敌人的活动更加隱蔽了，光靠公安人員不依靠群众是不行的。最近广州捉住放定时炸彈的特务，不也正是普通群众捉住的嗎？那些藏在牆里的、躲在天棚里七八年的，不正是他們的外甥、侄兒、邻居檢举出来的嗎？說肃反不需要发动群众，是不实事求是的，这样提問題对巩固社会主义沒有好处。

李承烈駁斥了把胡风問題說成是“新中国的文字獄”的

謬論。他說，所謂“文字獄”，乃是反動統治階級為了怕人民利用文字起來反對他們而進行的殘酷鎮壓，滿清、國民黨、偽滿時都有過“文字獄”。凡是罹“文字獄”之罪的，都是為了維護人民的利益。胡風在哪一點上和他們有相同之處呢？我們本來並沒有把胡風當反革命，他曾經是人民代表，曾經被認為是靠近黨的進步作家，他的有些問題一直被認為是文藝思想問題，並沒有一下子把他抓起來。直到人民日報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揭發以後，只要是擁護和熱愛社會主義的人，就會徹底認清他是反革命分子。胡風是不是僅僅反教條主義呢？不！他和他的嘍囉興風作浪、里勾外連，要把我們當作膿一樣“排出去”！這難道是“拯救文壇”“反教條主義”嗎？當然，對於胡風更具體的罪狀我們可以懷疑，甚至可以要求黨把內容公布，但是司法問題是複雜的，如果為了社會主義的利益而不便公布，我們認為也可以。總之，張、黃二人的發言全完沒有階級觀點，把肅反和反動統治階級鎮壓人民等同起來了。

李承烈說，說社會主義改造全面冒進也是不合事實的。社會主義改造的確有若干問題和困難，正因為如此，黨把它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之一提出來解決。我們今天正在解決這些問題。事實上是否把農民“改”苦了，“化”糟了呢？並不如此。譚震林的一篇調查研究材料充分地說明了農民在解放以後，特別是合作化以後，生活是提高了的。主張自由買賣土地，就是等於鼓勵農村發展資本主義，這不行。張、黃二人看到了一些矛盾和現象，就不加分析，不加判斷，不想辦法改進，而想用不改革來解決矛盾，甚至把錯都歸到黨中央身上，這是過分的。

李承烈着重駁斥了“取消党的絕對領導權”的說法。他重復地說，取消党的絕對領導權，就是要取消党的領導，“絕對”兩字不是遁辭，就是糊塗。中國共產黨不領導人民搞社會主義，那麼由誰領導？除了中國共產黨，誰敢說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自己領導的？誰能說他自己能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工人階級的事業，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要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怎麼能行呢？據張、黃二人說，共產黨說了不算，大家說了算，這“大家”是誰？他們沒有明白說。他們說要搞“兩院”或“三院”制，又說他們不贊成英國的上院、下院或美國的參議院、眾議院，但不知道他們所說的這三院是上院、中院、下院，還是天院、地院、人院？到底是怎樣一種“院”？如果合乎社會主義，搞什麼院我都贊成，只怕取消了共產黨的領導，馬上就天下大亂。

張、黃二人把國民黨作為共產黨的前車之鑒，仿佛不搞三院，人民就要象陳勝吳廣一樣揭竿而起，打倒共產黨。陳勝吳廣起義是因為在那時候有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矛盾；我們今天領導與被領導之間也是有矛盾的，但這不是對抗性的矛盾，今天不正為了克服矛盾而堅決地除三害嗎？我們和領導之間的关系難道是大皇帝和臣民的关系嗎？我看這個鑒用不着借，匈牙利因為沒有徹底肅清反革命而搞出復辟事件這個鑒到可以借來照一照，說明肅反要是不發動群眾，不搞得徹底，確實是很危險的。

二位勸告党中央要当心組織上、思想上僵化，講得有色。可惜他們沒有分析，看到个别黨員有三害，有毛病，一下子就與党的組織、党的隊伍、党中央直接联系起來了，

这太直接也太草率了，因而也說不服人。他們說党中央書記們坐在办公室里脫离群众，难道要毛主席亲自来主持我們今天这个会，政治局委員天天都去拿鋤头板，才算不脫离群众？張百生同志是团委宣傳部长，要貫徹一項工作也得通过下面干部，不見得天天往班級跑吧？怎么能够根据那些現象就說党中央思想僵化呢？

李承烈說：張、黃二人認為建国以前入党的才是好样的，新黨員都是名利之徒，这也缺乏历史观点。高崗饒漱石的党齡不短，可是他們成了叛徒；陈独秀的党齡最长，可是他是个机会主义分子。黨員的好坏不能絕對从他党齡的长短来看。

張、黃二人曾把“人大”和政协称作“两朵紙花”，李承烈說，人民代表不深入，可以提意見改进，事实上已經注意这个問題了，这根本談不上“根本問題在于彻底革新制度”。他們說現在沒有民主，要“放手发揚民主”，我看是有民主的，在国民党統治的时候，“彻底革新社会制度”这句话他們就不敢在大街这样說。今天我們容許这样說，不正好說明很有民主嗎？难道非要罢課八天上街去喊“大民主大民主”才过瘾嗎？这样敞开鳴还不滿足嗎？有問題，我們完全可以彻底討論，用不着来匈牙利事件。

張、黃二人把今天的工作干部說成“尸位素餐，力不胜任者比比皆是”，李承烈認為这种說法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話，我們祖国今天的强大和建設的成績倒成了不可思义的事，不用帝国主义来破坏，我們早就垮台了。

最后，李承烈認為，張、黃二人的发言中充滿了夸大、歪曲、討厌的諷刺，小資產階級的偏激，聳人听闻。

历史系助教吳渭濂說：張百生、黃振旅的言論，實質上是在反三審的名義下，以修正主義攻擊馬列主義。他們所謂取消黨的絕對領導權，實際上是否認黨的領導權。列寧認為，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奪取政權問題，奪取政權是有非常重大意義的，張、黃二人是否認黨應該掌握政權。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性質，他們也認識不清，黨綱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是中國工人階級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它的目的是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中國既然要實行社會主義，共產黨不領導，由誰來領導？

(1957年6月12日遼寧日報)

沈陽師範學院教職員辯論大會

繼續批駁張、黃二人的謬論

師範學院教職員辯論大會，六月十三日繼續進行。許多人對張、黃二人的荒謬言論予以批駁。

馬列主義教研室張濟民首先發言，就張百生、黃振旅二人的觀點，做了比較系統而尖銳的批駁。

在張、黃的文章中，完全否定了黨的偉大貢獻，否定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功績。關於鎮反問題他們認為是人殺的多了，黨缺少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我認為這不是事實。我們黨在鎮反中提出過該殺該不殺的可以不殺，毛主席也說過，我們絕不冤枉一個好人，並給反革命分子以改過自新的機會。他們又認為肅反發動群眾是不應該的，我認為在當時發動群眾

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者認為，群众是推动历史的动力，我們能在短短的时间內收到了那么大的成績，不正是因为我們发动了群众嗎？他們在文章中用了“爱民如子，以德治国”的話，这句话是缺少阶级观点的，我們給反革命分子以“德”，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行为。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不是冒进了呢？不能做这样的估計。他們認為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是命令的結果，他們还特別強調了农民个体經濟比合作社經濟优越，这是不切合实际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所以会发展的这样快，是因为党用了三年多的時間搞土改运动，又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結果富农被孤立了，农民認清了合作社的优越性。所以不是沒有群众思想基础，不是沒有干部条件。当然缺点是有的，但不是主流。至于說个体經濟比合作社經濟有优越性，我是根本否定的。去年粮食产量的增加可以清楚地說明这一点。因为农业合作社的建立，农民发挥了力量，保證了增产。他們的言論，實質是讓我們走資本主义的道路。

工商业的改造是有缺点，但这些缺点是非本質的，公私合营是一种自然的趨勢。我認為他們是顛倒了是非，把局部的片面的缺点看成是全面的。我認為“三害”的根源不是在中央，而是来源于旧社会，因此有些人就沾染了一些“三害”的旧习气，当然这需要改正。

張、黃說取消党的絕對領導权，就是意味着不要党的領導，無产階級要領導人民巩固社会主义，但必須通过自己的政党来領導，因此，要取消党的絕對領導权就是夺取党的領導权。他們提出取消党的絕對領導权的理由，是說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是一治一乱，因为出現了統治者掌握了政权，压迫

了人民，被人民推翻，他們還沒有從本質上看問題，共產黨根本不同於歷史上的統治者，今天的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是和廣大人民的利益沒有抵觸的，所以它能夠聯繫群眾，它不能被推翻的。

我認為，只要階級存在，共產黨就要存在，領導權就必須堅持，何況今天社會主義建設還沒建成，我們社會的現實要求有一個先進的政黨來領導。他們說要取消黨的絕對領導權，那麼誰來領導呢？他們沒明確的提出，只隱隱約約說成立新的政黨，這是反對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幻想，在目前，我們沒有成立新的政黨的要求。

根據張、黃的論點推下來，還需要革新社會制度。他們說的需要革新的社會制度含意是什麼呢？他們沒有明確的提出。今天我們的社會是社會主義制度，在政治上人民民主專政，在經濟上取消剝削制度，這是符合於人民的利益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我們是不需要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只有少數人的民主。他們硬說我們的憲法是一紙空文，我認為這是一種誣蔑，不是事實。黨的獨裁的說法我們也不能同意。階級專政，不是黨的專政，不能把黨看成是太上皇。人民代表大會如果失去黨的領導，它將失去靈魂。

從他們的文獻來看，實質上是否定了黨的一切，因而得出結論：取消黨的絕對領導權，這是對馬列主義一個修政主義的東西，就哲學觀點上看是唯心主義的。文章中有的是歪曲的，有的是片面的，把黨的局部的缺點，說成是整個黨的錯誤。所以這篇文章是以資產階級思想為基礎的右派言論。

劉岩講師在發言中首先說：他覺得在目前的“鳴放”中，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一種是為了加強社會主義制度，加

强党的领导，这是鸣放中的鲜花；但有少数人的态度和这相反，他们要把我们的社会往资本主义道路引。

他说，张百生和黄振旅二人把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某些暂时的和个别的缺点，夸大成为整个政策上的错误，这是非常错误的。他说在张、黄的文章中，运用许多马列主义词句，来证明他们的理论正确，所以会博得一部分人的支持。他们说镇反时杀人杀的太多了。可是他们却没有很好理解镇反时的历史条件，镇反是在建国之初，当时老百姓对那些反革命分子有很大的仇恨。我知道，当时群众对有些反革命分子义愤很大，要求杀掉，可是政府根据情况，认为可以不杀的就留下了。没有群众不要杀，而政府反倒杀了的。

王鹤年讲师接着发言说：张百生所谈的主要是取消党的领导权问题，他认为取消党的绝对领导权，反而是加强党的领导，我认为党的绝对领导权就是指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问题，如果取消了社会主义方向，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呢？

王鹤年说：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是不可分的，因此，既然拥护社会主义，那我们取消党的绝对领导权是决不行的。王鹤年指出，他们认为只有六个人说了算，我问他们全中国六亿人民都说了算行不？什么叫民主，集中大多数人的意见，那就是民主，党选举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名单逐个研究，反复协商，这不是民主吗？国民党的“国大”选举，尽选的那些人呢？有没有农民？有没有艺术家？只有代表大多数人利益才叫民主。王鹤年认为各项运动中是有缺点的，可是他们两人把局部的缺点扩大成全面了。王鹤年说，镇反运动中有没有杀错的呢？我没有作过调查，个别杀错的是可能有的，即使如此，整个运动还是正确的。我不敢说张、黄二人

有反社会主义的意見，但他們的言詞是很难听的，馬列主义决不是聖經，怎么說成是聖經呢？

王鶴年認為張、黃二人都年青，为什么提出这样的問題，是否是由于旧社会經歷不多，不知新社会的可貴，正如“长在芝兰之室，久而不聞其香”一样。他劝告張、黃二人，不要到处找理論根据去反駁，要冷靜一些。

敎务处職員樂宗峯发言說：張黃二人的文章，对中国共产党領導鎮反和肃反作了这样的估計：杀人多了，他們認為肃反是对的，但不應該发动群众。当我讀完他們这篇文章时，我觉得他們对肃反、鎮反的認識和举出的事实有矛盾。我感觉，他們文章的實質是反对整个鎮反和肃反运动的。

樂宗峯說：張、黃二人在文章中提到的那些被杀掉的反革命分子，并不是因为他們养活父母妻女而杀掉了（而是因为他們罪大恶极，他們杀死了养活父母妻子兒女的人而被杀掉的。）照他們的意見，凡是有上級命令的反革命分子都不應該杀，那么除了蔣介石別的反革命一个也不應該杀了？因此我怀疑，他們是提出我們鎮反中的缺点呢？还是反对鎮反运动？

对于肃反問題，他們把胡风当做文字獄来看待，我不同意，我認為胡风是反革命集团的，从揭发出来的材料上来看，胡风是个反革命分子已經是很清楚的了，他不是說要用皮鞭子象打囚徒一样的打我們嗎？他們把我們看成是强盜，是騙子。他們把自己的人打到共产党中来，偷盜机密材料，做为他們向党进攻的資本，这能說不是一种反革命活动嗎？

（1957年6月14日沈阳日报）

黃振旅丑事重重

沈陽師範學院七月十五日又召開了全院師生反右派鬥爭大會，嚴厲批判了右派分子黃振旅所謂“鎮反殺人多了，肅反運動錯了”和“不分青紅皂白、大加殺戮”等反動論調，會上並揭了黃振旅的老底。

黃振旅事先以所謂“群眾沒考慮他知識分子的特點”和“面子不看好”等為理由，逃避了大會的批判，他的同伙張百生搭拉着腦袋，坐在主席台下後側。

中文系講師王維琦、馬列主義教研室靳是今首先發言，批判黃振旅的反動觀點。王維琦特別以他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了肅反搞運動完全必要，有力地批判了右派分子所謂“肅反把對黨提意見的人肅了”、“把好人肅了”“肅反傷感情了”等錯誤論調。王維琦說，肅反前我的體重是一百三十六斤，現在却是一百四十九斤，說明肅反後我精神愉快，身體也健康了。

在會議進行的時候，同學們不斷遞條子給主席，要求派人把黃振旅找回來。有些社團都派了代表到宿舍找他，只見房門大鎖，這個狡猾的右派分子不知藏到那裡去了。

黃振旅曾在七月十日舉行的小組批判會上造謠說，四十七軍在湘西剿匪時，成批地殺掉了許多俘虜，用以證明他的所謂“鎮反殺人多了”的論調。曾經和黃振旅同在四十七軍而且還親自參加過湘西剿匪，做過改造土匪工作隊隊長的聶占山同志，用親身經歷的事實有力地粉碎了黃振旅的謠言。

他說，除了罪大惡極的土匪頭子送軍部，在群眾要求下依法槍斃了外，一般土匪俘虜都不殺，當時每個團都有改造土匪工作隊，監督他們勞動改造，然後送回原籍參加農業生產，根本就沒有成批地殺過俘虜。他十分憤怒地申斥黃振旅，穿人民的，吃人民的，却干着反人民的勾當，造謠誣蔑我們的人民軍隊。曾經參加過當時剿匪宣傳工作的湘西苗族自治州學生龍錦章說，他當時就一直是在群眾中宣傳“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的政策，他詳細地介紹了湘西人民激憤地要求槍斃幾個土匪頭子的經過，他說他從沒有看見過有什麼成批槍殺俘虜的事。他們兩人都質問黃振旅，當時湘西土匪那樣殘暴對待老百姓，抓了我軍戰士和工作幹部就砍頭、割耳朵，你為什麼就一字不提呢？這完全說明了黃振旅反動的階級本質。他們的發言對黃振旅製造的反動謠言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

曾經部分同意過張、黃反動觀點的該院研究部職員劉星，在大会上初步作了檢討，表示和張、黃劃清界綫，並揭發了黃振旅到師範學院後的一些表現。他說黃振旅一直沒認真干工作，整天鬧地位待遇，他不滿意社會制度，在選區人民代表時，他不參加，反而說，要我選，那我選孫悟空好了。他不但不買公債，反而埋怨組織上給他的薪金太少了，他誣蔑該院研究部為“烟酒部”，他認為所有科、處長幹部，只是些“彎弓射大鵬”的，而自命不凡，對不安心工作的同志則進行拉攏煽動。劉星在一次會上作了同意他們的觀點的發言後，黃振旅熱情地在宿舍里接待過他，鼓勵他同他們一伙。黃振旅還惡毒地攻擊遼寧日報社說，如果報社不登他的抗議就要在學生中搞出個大民主來，如果登了就會使報社的威

信扫地。刘星說，黄振旅看到人民日报登了“批判文汇报资产阶級政治方向”的社論后，他說他今后只有采取两条道路。一、坚持到底不“动摇”，就有可能被判定为頑固的右派，降薪、降职，甚至杀头，但有利的是不会使拥护他的人感到失望，坚持了“真理”。二、不然就来一个假檢討，虽然可能繼續坚持他的反动观点，但会使拥护他的人感到失望，以后不好“表白”。刘星的揭发告訴了我們，黄振旅是个很狡猾頑固的右派分子，直到今天还没有打算向人民低头認罪，还想蒙混过关。

根据师范学院院刊揭发的材料，原来黄振旅的哥哥，是个反革命分子，鎮反时被鎮压，他的大姐夫曾任国民党軍少校，解放后人民寬大了他，繼續留用，但肃反中他畏罪自杀。这就是黄振旅为什么說“鎮反杀人多了，肃反运动錯了”的阶級根源。該院审干办公室的卜鳳翔在昨天的大会上还揭发了黄振旅的另一些丑恶历史，黄曾两次加入过三青团，当过蔣軍的少尉軍官，参加过国民党的所謂抗日自卫軍，他参加革命后隱瞞了这段历史（只交代一次参加三青团），审干时被查出来之后，他才被迫作了交代。当时这支所謂抗日自卫队曾枪杀过两批难民，至于枪杀和黄有無关系，組織上正在調查中。卜鳳翔还揭露了黄振旅道德品質极端恶劣的一些事实。他在部队因男女关系不正常受批判时，他就誣蔑党組織是“海龙王”，党的政策是“海龙王的辞典”，“海龙王的王法”。

揭发的这些事实，使到会的群众十分憤慨，紛紛递条子要求黄振旅出来交代。有的人递条子叫張百生把大会的情况向他的同伴传达传达。

在群众愤激之下，陈英侠同学代表师范学院全体师生员工，在这个大会上庄严地宣布了反右派斗争决心书，他们一致表示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忠实于社会主义，坚决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晚上，在灯光下，会议又继续进行了。没等大会主席登台，台下的纸条就一个接着一个投向主席台前，一致要求黄振旅参加这次大会，并要求黄振旅立即登台辩论，在同学们的一再要求下，大会主席首先向大家声明说：黄振旅在今天午前就离开了学院，我们已派出了一些人到处寻找，直到现在仅距开会有五分钟，对黄振旅的去向仍然不明。

所有的到会全体师生，对黄振旅逃避会议这种可耻的行为，表示非常气愤，许多人都先后对黄振旅对肃反问题的谬论用事实进行了驳斥，会议进行中，许多同学要求张百生对黄振旅的丑恶历史表示自己态度和感想，大会主席虽然几次叫张百生登台，但张百生还是摇头不敢上台，只好要求主席转告大家下次会上表示自己的态度。

这次反右派斗争大会在十时结束。

(1957年7月16日沈阳日报)

张百生开始交代张、黄集团的阴谋

右派分子张百生，在沈阳师范学院部分教职员和学生七月十七日举行的小型批判会上，开始交代了张、黄集团的一些情况。

张百生说：“黄振旅在政治上是极端的个人主义野心

家，发展到反党的地步。”

張百生接着談了一些具体情况：第一、准备組織新政党。張百生說：“黃振旅要組織‘南斯拉夫学会’，做为組織政党的雛型，将来組織一个政党。要我注意学生中鳴放积极的人，将来組織他們入党。我說，我对組織政党沒兴趣。从这点上看，他要在政治上撈一把。他还主張办个人报纸，与党唱对台戏。只有通过报纸，我們的主張，才能为社会所承認。这样报纸，就能成为成立政党的准备。我对这一点表示同意。”

第二、积极煽动搞大民主。張百生說：“在我院，大字报大量出現后，他（指黃）想搞起大民主，迫使党委接受我們的建議。烏丙安写了‘一百个为什么？’他說是否和烏丙安联合起来……六月十一日晚上，他叫我在講演时特別注意講‘向辽宁日报抗議’事，如辽宁日报不登我們的抗議，我們好找同学帮助。我在晚上講演中，进行了煽动，用很多很多詞句，煽动学生对学院的不滿。”“六、一二事件，實質上是我們点的火。因为沒有十一日晚上我的煽动，同学们是不会要去抗議的。当时我還沒意識到可能引起大民主。六、一二事件，我和黃振旅要負完全責任。”“对大民主問題，我表示怀疑。我認为搞个大民主，鬧个匈牙利事件沒好处。”（在这句話中表明張百生是把“大民主”和“匈牙利事件”当做同义語的）。

第三、动机在于取消党。关于写新課題的动机，張百生說：“黃旅振談，我們两个写的文章，誰也不知道，講出来會認为我們骨子里反党。以后檢討时，我也避开不談。他的动机，的确不是帮助党整风。我在他的影响下，也不是为了帮

助党整风，而是取消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关于文章的第二个大标题，黄要写为‘取消党的绝对领导’。我们要叫党同各党派、团体一样，到议会中去竞争。为此，说党组织硬化了”，“党是太上皇”，彻底瓦解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达到取消党的领导的目的。把党员分成几种类型，说“人大政协是纸花”，也都是为了挑拨党群关系。黄和我的动机是取消党的领导。从我个人思想来检查，不是要把我们国家恢复到资本主义，而是改变到南斯拉夫那个样子。黄振旅则是利用我做工具，他别有打算。”我现在认识到，反右派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否则真可能在中国来个匈牙利事件，千百万人头落地。”

“关于我个人的立场问题，有关农业合作化的意见，确实是站在家庭、富农舅舅和姐夫的立场上。确实感到家中土地被分了，又入了合作社，没有根基了。总的看来，确实站在反党反人民的右派立场。现在想到以前错了，在某种程度上受黄的利用。今后要跟他一刀两断，下决心改造思想，重新做人。”

(1957年7月20日沈阳日报)

張百生开始“繳械”投降

黃振旅逃会被找回

师范学院七月十九日召开了全院师生反右派斗争大会，右派分子張百生就他对民主和自由等问题的议论作了初步检

討。右派分子黃振旅逃會在外，已由專人將他找回參加了大會。

張百生說，他之所以認為今天的社會沒有民主，主要是從選舉出發的，他說，這樣的看法是片面的。他說他有個人情緒，對團委會及區人民代表的選舉，曾認為是“變相的任命”，現在看來並非如此。他說，對於所有的候選人，個人的認識總是印象，而候選人名單是經多方面協商才得出的結果。我認識到光從印象未必合適。他說他過去對待“自由”問題，主要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從個人情緒出發。他說他寫了一些稿件投到報社和刊物雜誌社都被退回來了，因此就有了不滿情緒，認為文壇被教條主義所壟斷了，認為報紙除副刊外千篇一律。因此覺得沒有“自由”。他說，現在他認識到這些看法都錯了，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報紙登文章要看對誰有利。接着他又說他有一些看法是受了羅隆基、章伯鈞、儲安平等人的影響。

他說他參加肅反都沒參加完，不了解情況就得出肅反錯了的結論。他承認學院六、一二事件是他煽動的，他說這對社會主義事業有危害。他說正因為他認為“一黨專政”，所以才得出“黨是太上皇”的錯誤結論。

張百生說，他實質上是反對黨的領導，他說他是站在資產階級右派的立場，抓住一點事實來向黨進行攻擊，他承認他的論點是很錯誤和荒謬的。

到會的全體師生認為張百生的發言僅僅是檢討的開始，但是極不深刻，沒有從階級立場、是何居心？什麼樣的階級感情？等方面來檢查。大家向他指出，他必須進一步認真檢討，滑是滑不過去的。

作为区人民代表大会的陈光崇讲师在会上发了言。他說張百生根本的思想本質問題沒檢討出来。張、黃的文章是去年十二月写的，罗隆基、儲平安等還沒发表反党言論，受他們的什么影响？他举皇姑区作例子說明人民代表是解决問題的。去年他們在区人民代表大会上提了几个建議，說北陵应設立照相館、电影院、新华書店，他說現在不是都解决了么？

（利群分院即是一例）皇姑区人民代表去年經群众提出撤消的就有三个人，怎么能說“人大”象朵紙花，不民主？他警告張、黃二人要很好檢查思想，不要随便污蔑我們的人民民主制度。

历史系的閔广和同学以伪滿，国民党統治和現在三个时期当学生的感受，說明只有今天才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他說，在伪滿时讀書沒錢的不能升学录取，这到底是誰的自由！他說，伪滿时，高年級学生可以随意打下級生，这不是侵犯人权？难道是民主？是自由？他說，国民党时期，吉林长白师范学院、东北师大的学生流亡到北京，晚上住庙堂，白天拿着飯碗到街上游行，右派分子你对这些事怎么解釋？他說，据統計，一九四八年，五、六两月全国学生因学潮被国民党枪杀的有一万三千多。学生开追悼会，国民党軍隊还圍剿！这又是什么民主和自由？他激动地說，头可断、血可流，旧社会的假民主我不要！

政教系的郑小鶯同学詳細地叙述了旧社会时在重庆念大学的情形。她說，当时的大学生根本没有自由，連看看高尔基的“母亲”、“人間”也要被列入黑名单打入监牢，当时他們都称自己为“活的死人”。她最后大声地說，我們青年和共产党、社会主义是紧密联在一起的，我們不能沒有共产

党，不能沒有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要攻击党，要打倒社会主义，我們是坚决反击他們。讓我再重复一句，不打垮右派分子，决不回家！

經過大家批判以后，張百生最后作了簡單的发言。他承認他看待民主离开了“階級路綫”。他說他今天認識到，沒有超階級的民主，他过去所追求的百分之百的民主實質上是超階級的，是沒有的。他說他从前还認為黃振旅是个君子，今天才認識到他是个伪君子，要和他一刀两段，割断“朋友”关系，也割断其他一切关系。他承認他們总的目的是在于取消党的領導。

同學們提出了許多質問。問他“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不是百分之百的民主是什么？”問他“和黃振旅割断其他一切关系是指什么說的。”問他“合作化冒进了来源在那里？”

看来，也許是由于激烈的思想斗争的緣故，張百生面容有些憔悴，他帶着一大堆問号下台去了。剛从別的地方回学院的黃振旅，低着头坐在主席台的人群中，可能由于老底揭穿了，始終未抬起头来。会场四周随着他的到来陸續出現了“黃振旅，你跑！赶快交代”的大字报。

(1957年7月20日沈阳日报)

穷追右派分子張百生、黃振旅

师范学院两千多人集会

沈阳师范学院七月二十七日在实验中学礼堂召开了全院师生声讨右派分子張百生、黃振旅大会。上午十一时，这所

小礼堂內就挤满了人、台上、台下，走廊上，連台的两側放照明灯的吊樓上都站满了人，两千多新中国的大学生在这里激憤地声討这一对尙不繳械投降的右派分子。

头一个被“請”上台的是黃振旅，当这个几次逃会的右派分子經過人群走上台时，全場发了輕蔑的冷笑声。他理屈詞穷，一付狼狽相，他在事实面前节节退守，但却又不真誠交代，幻想減輕他的反党罪行。

会上，許多反右派斗争的积极分子，許多曾經被張百生、黃振旅一时蒙蔽、利用或者和他們有着同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的人，都一一上台和張黃二人对証，曾經撕过十多張反右派大字报的徐順章揭露黃振旅蓄意誣蔑党中央和人民領袖的事实，黃振旅曾对他談过：人民日报就是宗派主义的“大本营”，并告訴他：別那么“迷信”毛主席。并說，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沒有两样。毛主席装“白臉”，下边干部装“紅臉”，毛主席主張大“鳴”大“放”，下边干部說出了偏差，右派分子进攻，毛主席一糾正就“收”了，“反正”是毛主席偉大。黃振旅还多方誣蔑党中央和毛主席并詆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領導同志。群众問黃振旅这种話說沒有說？在人証面前，黃振旅虽然不得不承認了徐順章說的大部分是事实，但矢口否認他說过毛主席装“白臉”、“党和民主党派沒有两样”的話。这时，又有两个同学上台作証，黃振旅还是一再惶恐地抵賴。

黃振旅的狡賴态度激起了到会群众极大的憤慨，人們憤怒地指出，黃振旅恶毒地誣蔑党中央，是企图煽动群众对党不滿，达到推翻党中央的目的。

研究部的陈宝元揭露黃振旅利用院刊編輯的职务，擅自

刪改他在“鳴放”小組會上的發言記錄。企圖惡毒地通過他散布對黨不滿的言論。陳寶元說，他對肅反有意見，曾錯誤地舉例說明學院肅反成績是次要的，作為院刊“編輯”的黃振旅卻對他說，不光是這幾個人的問題，叫他刪掉例子，光說肅反成績是次要的。陳寶元曾說過，希望學院黨組織就肅反問題進行公開解釋工作，黃振旅在底稿上卻叫他改為要黨組織公開檢討，他未同意。陳寶元說，他希望學院黨吸取肅反中的教訓，黃振旅在編稿時卻把學院黨三個字刪掉了，歪曲了陳寶元的原意，惡毒地通過陳寶元的發言來誣蔑全國肅反運動。

有人遞條子叫張百生上台，於是這一對被人們駁得體無完膚的右派分子，又再一次站在光天化日之下。

曾經替張百生籌謀划策，說張百生寫“反對共產黨的領導權”太明顯，不如改寫反對共產黨的政策的王大光，在會上坦白說他和張百生訂有攻守同盟，並說他曾叫他的愛人去告訴張百生，但張百生卻矢口抵賴，不承認有此事。

共產黨員于慶波上台證明，在右派分子猖狂之際，張百生曾在人群中對他喊過：“打倒你這樣的共產黨員，打倒共產黨！”的口號。叶長生證明張曾對他說：舊社會有人宣傳蔣介石“好”的，國民黨中央也是“好”的，就是下邊搞糟了。共產黨和國民黨一樣，現在也這麼宣傳。張百生還告訴過他：“大丈夫要能屈能伸！要檢討就假檢討。”張德良老師揭發，張百生曾對某人講過：羅隆基、章伯鈞是部長，是大人物，必要時可以到外國大使館去避難，象我這樣的小人物，真當牛頭馬面砍了。最好能逃到外國，就是到中立國去擦皮鞋也是好的。曾經就肅反問題寫文章誣蔑黨的曾祥基揭

露黃振旅曾拉攏他，問他是不是肅反對象。

這一連串的揭發，激起了群眾極大的憤慨，張百生、黃振旅却在反黨的一些根本性問題上矢口抵賴，企圖減輕罪名，到會的人莫不憤怒。王化春同志就張百生的歷史、言行、到學校後的表現，反動思想作了全面分析和批判。王化春還揭露他一貫的反動言行。遠在反社會主義的“新課題”發表前，張、黃二人就在寢室裡談論，說什麼美國民主多、報紙多，散布崇美思想，並誣蔑東歐人民民主國家不是獨立國。當全國人民支援埃及抵抗英法侵略的時候，他們兩人反而重復英美帝國主義的話，說埃及人民不該把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他們在寢室內談論着要辦報紙，並經常誣蔑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王化春說，張黃二人發展到今天要成立反動政黨不是偶然的，是一貫的。他是由個人主義發展為卑鄙的政治野心家，是墮落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李芳鈞老師再一次就張黃反黨“新課題”作了全面分析。他指出張百生在遼陽中師讀書時就經常歪曲黨的政策，曾經被當典型批判過，他是一貫反黨的。在張百生的反動言行被批判後，他還誣蔑說“共產黨是執政黨，今天搞起了陰謀，多麼卑鄙！”李芳鈞說，他的幾次檢討都是假的，根本沒有涉及政治立場上的錯誤問題，我們也決不能寬恕張百生。

斬是今老師代表馬列主義教研室、教育教研室、圖畫科、物理科、外語系、歷史系一群教師，高志茹同學代表星火社、雄鷹社、尖兵連、掃雷隊、赤衛隊等社團，分別在會上激昂慷慨地宣讀了他們對頑固不化的右派分子張百生、黃振旅的聲討書。各社團的聯合聲討書上寫道“我們一定要狠狠地攻，窮追到底！準備長期戰鬥下去，直到把這個陰謀集

困攻垮，要他們全部投降繳械为止！否則，我們决不罷休！”

（掌聲雷動）王化春、李芳鈞、靳是今、高志茹等在發言時，都激憤地建議學院對這兩個頑固的右派分子停職，根據反省程度再作處理，建議團委開除張百生的團籍。他們的建議受到全場兩千多人熱烈的支持和擁護，當他們中每一個人發言後，全場長時間鼓掌，高呼“擁護”“同意”。

（1957年7月28日沈陽日報）

不讓反社會主義的言論抬頭

· 沈陽日報讀者來信綜述 ·

駁斥反社會主義的謬論的來信來稿，象雪片一樣飛到本報編輯部，僅昨天一天，即有一百二十余篇。來信者有工人、農民、幹部、知識分子、學生等各個階層的人。許多稿子是用集体的名義寫的，許多人來訪報社，要求報社表達他們對一切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的抗議。

孟錦霞、鄧廣文、何昌俊等許多人認為：張百生、黃振旅的“鎮反殺多了人，肅反運動錯了”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認為中央的寬大與鎮壓相結合、有反必肅有錯必糾、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贖罪立大功受獎等政策是正確的。孟錦霞在病中給張、黃寫了封公開信，說：反革命分子破壞活動是層出不窮的，如果沒有“鎮反”“肅反”，抗美援朝，社會主義建設是不能取得勝利的。他也指出，在工作中是有個別錯誤的。丁吼濤、段昭文都是公安工作者，他們說：從我實際工作的體驗，單純歷史職務沒有罪惡民憤的確定是不

捕的，沒有几条血債的确定証是不杀的。中央并且三申五令“強調可捕可不捕者坚决不捕，可杀可不杀者坚决不杀。”楊介浩說：人民群众的意見和張、黃是不一致的，記得一九五一年我在安徽太湖县时，当时人民曾向政府反映：“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共产党講寬大。”人民要求政府严厉鎮压反革命分子，以保护人民利益。何昌俊說：我們說现实一些吧，假如張百生和黃振旅两先生的父亲或亲人被这些“出于無奈”的反革命家伙所杀害，你們今天还能在沈阳日报上站在反革命分子的立場得出这个荒謬的結論嗎？还能絮絮不休地来袒护这些人是“出于無奈、执行上級命令”嗎？

曾經毕业于沈阳师范学院、現在实验中学工作的崔良本說：張百生、黃振旅認為“新中国有了文字獄”，这种看法显見是不妥当的。

張百生是学历史出身的，知道“文字獄”的来龙去脉，把新中国比作清朝、国民党的文字獄的黑暗反动統治，对爱国文人的大批杀害来比作胡风反革命集团問題显見是不当的。請問，胡风是爱国文人嗎？他要“用包着鋼絲的橡皮鞭子”打我們，要“排膿”，要用“孙行者鑽进肚皮去的战术”来进攻党和人民，难道这是百花中的一花嗎？这是一种文学流派嗎？黃振旅是师范学院院刊的編輯，我倒要請教一下。至于要求公布一下胡风集团的罪状，在对人民有利的情况下，建議中央作考虑。讀者書林指出：胡风給張中曉信中說“不要痛苦，千万冷靜，只有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一切都是为了事业，为了更远的未来！”胡风給牛汉一信說：“我在磨我的劍，窺測方向，到我看准了的时候，我愿意割下我的头顱抛擲出去，把那个脏臭的铁壁击碎”。另如張中曉給

胡风信說：“我几乎恨一切人，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等等事实，不必多举，請看看，这难道是“学术上的一个流派”嗎？难道是“对教条主义进攻”嗎，难道是“为党为人民”嗎！
(1957年6月13日沈阳日报)

共产党的根誰也挖不掉

河北涿鹿县西关初級小学教員 張銘聞

看了沈阳师范学院張百生、黃振旅的文章摘要以后，不由的使我和周圍的同志們感情激动起来。

張、黃二位先生說：中央在“肃反”和“鎮反”上是犯了“最大的主觀主义”。我不知道他們的根据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們县的伪县长毛焕清欺人过甚，积极反共，被鎮压了。在我們的小学教师队伍中隱藏着的少数反革命分子曾組織过“国民党地下工作委员会”，在肃反中坦白自首了。我还記得天津市“鎮反”时，每处决一批反革命分子，市民們都跟着去看，正直的市民并無畏失，而是拍手称快。許多三輪工人自言自語地說几个該！該！該！張、黃二先生却說：犯了“最大的主觀主义”！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二位先生說“肃反”和“鎮反”是“宁左勿右，打錯了好人，破坏了法制……。”关于“肃反”的方針政策我不想重复。我只想問問：“破坏了”誰的“法制”？反革命應該不應該肃？先生們作过多少調查和研究，因而知道“肃反‘左’了，打錯了”多少“好人”？“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扰之”，天下真無事嗎？看过罗瑞卿部长的报告沒有？看見过許許多多的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

动的通訊报道嗎？前几天在广州被两个青年捉住的放定时炸彈的特务分子龙沛強的事兒你們知道嗎？究竟誰是“庸人”啊？

張、黃二位先生說：“肃反”和“鎮反”是“企图用暴力維護革命果实，这与我国著名的‘爱民如子’、‘以德立国’、‘以法治国’的傳統思想是背道而馳的”。先生啊！鎮压反革命，肃清反革命分子正是为了“爱民如子”、“以德立国”、“以法治国”。我們的“民”是不包括反革命的，我們的“法”是人民的“法”，我們的“德”是为人民服务的“德”。不知道二位先生所說的是誰的“国”？所謂“傳統思想”也不过是各有各的“德”，各有各的“法”。不知道張、黃二位先生所說的是那种“德”？什么“法”？

張、黃二位先生說：“三害的主要根源在中央”。我觉得不值得为这些謬論費口舌（儲安平、葛佩琦早就发表了这样的謬論），只要看看報紙，听听全国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們的呼声就可自曉。不过，我想就这二位先生的“一劳永逸”，“穷其根源”，“把根子彻底挖出”的幻想进一逆耳忠言。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誕生以来，就在人民群众中播种，并且扎了根，到現在不但生莖长叶而且开花結果了。过去有人“挖”过中共的根，象“四一二”，“七一五”，五次圍剿，抗战期間三次反共高潮，日寇的三光政策，美蔣的进攻延安……等都是。但，沒“挖”掉。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資本主义必然灭亡，这是历史发展的規律，它并不随着少数人的意志为轉移。中共中央也是“挖”不掉的，这是“遵义會議”后的党的历史所証实了的。如果硬要“挖”，可小心自己的“根”子。六万万人的力量一定能抵得少数人的力

量啊！

很明显，这二位先生很不愿听，也反对“馬列主义”、“偉大的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的正确领导”等詞句。認為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我欣赏”，“自吹自擂”。請問：中国共产党那兒不偉大、不光荣、不正确？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統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階級和剝削，雪掉百年来的国耻，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保护劳动者利益，帮助少数民族，致力于国际和平……，我說：“偉大！光荣！正确！”工人說，农民說，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民族資本家說，革命的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識分子也說。就是帝国主义、蔣介石卖国集团、反革命分子和对革命不滿的人不說。

二位先生反对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說党“把自己摆在国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党即国家、国家即党’的气派”。我想先生們在高等学校，对“国家”、“人民”、“党”等詞的實質不会不知道，而只是想借整风之机，混淆視听，以便有所收获。似乎先生們抓住了什么把柄似的。其实略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国家”这个东西是服务于一定階級的階級統治工具，“人民”也有一定的范围，党是階級斗争的最高組織形式。在宪法上和毛主席的“論人民民主专政”一書中对我国的性質說的最明白，最好是再看看。請問：社会主义国家不受工人階級领导，不受共产党领导，受誰的领导？难道受資产階級领导？党对国家的领导不是以党代政，也不是“太上皇”，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宣傳、組織等活动，教育人民使他們确信党的政策、方針、路綫的正确，把人民群众的意志集中起来，再通过人民群众坚持下去，以便保証社会

主义的方向，有利于劳动人民。除此之外共产党并無任何私利。我国既有“人大”也有它的常委会，既有政协也有国务院。事实上中共每提出一个重大问题，都要組織各阶层人們进行討論，广泛征求意见，提交“人大”常委会审查，討論，修改，批准，再提交国务院具体研究付諸执行。在执行中也有不断总结，征求省市意見和人民群众的意見的。我这个小学教員还参加了几次宪法討論。这怎能說“把自己摆在国家之上，人民之上，党即国家，国家即党”呢？为什么睜着眼說胡話呢？！“国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古今中外都不例外。白宮受华尔街老板的控制，蔣政府服务于买办資产階級。我們的国家則服务于以工人階級为首的人民群众。說“人民之上”看是什么“人民”，葛佩琦所說的“人民”嗎？我說：應該！不压在那些“人民”之上，那些“人民”就反过来压到今天这些人民之上了。至于說：“党可以不遵守宪法”，我認为这是胡說。中国共产党領導中国人民同内外敌人斗争了几十年，好容易才有了自己的宪法，怎么倒会自己不遵守呢？个别党員犯法是有的。但个别党員和全党不能划等号，这和有人借整风散布反党言論，不能否認多数人的善意批評，少数右派分子决不能代表广大的党外人士一样。

說到民主，我想，共产党講不講民主，有沒有民主不是少数右派分子信口可以抹杀的。对这部分人有民主，对另一部分人就沒有民主。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我感到有民主，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們感到有民主。如果問問工人，农民，他們就更感到有民主了。二位先生怎么感到沒民主呢？要依二位苦心所写的文章的内容实質来衡量一下，还是沒有先生們的民主的好。在人民的报刊上能刊登先生們的文章，

民主範圍就不小了。

二位先生說“政協把主要精力放在組織有關學習等問題的工作上，這是笑話。”我看先生們的這段話才是笑話呢！學習有什麼不好？！建設社會主義這是“協”的基礎。學習馬列主義，建立共同語言，才能“協”得來。否則就搞到相反的一邊去了。何況政協還作了其他很多工作，報上才登過協商廣西僑族自治區的建立，政協這些工作是誰也抹殺不了的。

二位先生怕人家給戴上“反馬列主義的鐵帽”，自己却頂出了反社會主義的鋼盔。先生們怕別人給扣上“莫須有罪名的手銬”，自己却發表了反社會主義的文章作為事實。請問：先生們要不要民主？要的話我先發言。這就是：反社會主義的壞傢伙如果繼續反下去，就只有將他們驅逐出教育陣地，再不給反共反人民的言論絲毫自由！

（1957年5月23日人民日報）

社會主義建設的絆腳石

劉玉章

沈陽師範學院張百生、黃振旅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新課題”一文中，向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發出了警號，要黨“進行徹底的革新，不然將有葬送黨、葬送社會主義的危險！”但是我一遍、兩遍、三遍……地讀完了這篇文章後，給我的感覺並不是什麼善意的警號，而是向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發射出一枝又一枝的毒箭，是發洩他們埋藏在內心的對黨對社會主義事業的仇恨，是謾罵，是污蔑，是惡意的攻擊。

我深知我的理論水平与張百生、黃振旅相比只不过是一个無名小卒，但我看了象“社会主义建設的新課題”这样一篇向党向社会主义事业挑战的文章后，我气愤，我不能沉默，我要“鳴”要“放”，不能只允許你們放毒草，不准別人发言，如果这样就会象你們所說的那样“沒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

你們認為“中共中央是‘三害’的发源地”，“錯在中央”你們要鏟除“三害”这是很好的，但是使我莫解的是你們有什么根据說“根子在北京”，“主要根源在中央”，你們根据什么事实，就給中共中央宣判了莫須有的罪名。这就不难看出虽然你們的文章有一些“偉大，光荣，正确”的伪装，但它的本質是要把党、把中共中央和“三害”一起鏟除，否則你們就認為“‘三害’就会象野草一样‘野火燒不尽，春风吹又生’”。为了达到取消党的領導，推翻中共中央的卑鄙目的；你們用資產階級、帝国主义者的笔調，丑化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黨員。你們說中国共产党“逐渐在成为人民的上司……自己变成了特权者，陶醉于自己是开国元勳，有汗馬功劳，应当有权有势的泥潭中，陶醉于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自我欣賞里，总以为自己是最优秀的，非我不可。自吹自擂地宣傳自己偉大，光荣，正确，把自己摆在国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党即国家，国家即党’的气派”。事实又是怎样呢？根据解放七年多的體驗，我和你們沒有“同感”無法“共鳴”。我所看到的是中国共产党一而再、再而三的教育自己的黨員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为人民服务，要作人民的勤务員，要傾听群众的意見，要接受群众的監督……。这些事实我想張百生、黃振旅只是稍微注

意一下就会发现很多，但是我想你们不能正视这个现实，因为这样将使你们无法达到丑化党的目的。

你们又说：“党从思想上到组织上开始脱离群众”，“党的威信一年不如一年”，但我的体验却不是如此，我知道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的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事实上党并没有脱离群众，我亲眼看到群众是拥护党，赞成党的各项政策，许多群众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今天的辉煌成就。这怎么能说“党的威信一年不如一年”呢？，我想不是的，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生了根，威信越来越高，却使你们胆战心惊，不然你们为什么不敢正视现实，而在那儿胡说呢？如果说党脱离了群众，那么只能是脱离了你们这一类的“群众”，因为你们和党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是一个鼻孔出气，而是另怀心腹事。

你们说“是一党专政，是党中央政治局少数人独裁，”“党是太上皇、是威武神圣的。一手托着马列主义的圣经，一手仗着国家政权的宝剑，谁敢提出异论，不是被扣上反马列主义的铁帽，就是被带上莫须有罪名的手铐”请问你们这是根据什么说的，难道这不是“莫须有”的指責嗎？你们说“一党专政”而事实上我们的国家不是有很多民主党派参与政权管理工作嗎？我们国家的重大的方针政策法令不是“人大”决定嗎？你们说谁敢提出異議，就会被扣上“铁帽”带上“手铐”，事实又何賞如此呢？有些曾經反对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反对統購統銷政策的人，不是在国家的重要部門担負領導工作嗎？共产党主張既可放香花，也可放毒草，因为党深深知道真理是愈辯愈明，所以才提出了“百花齐放，百

家爭鳴”的方針。

够了，这些还不足以說明你們的用心嗎？很明显你們企图以幫助党整風的名义，向党进攻，企图讓人民离开党的領導。但覺悟了的人民是能嗅得出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

你們对党謾罵、丑化、污蔑的最終目的，正象你們所說的“关键在于取消党的絕對領導权”。你們說“取消党的絕對領導权，才能使党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前列”，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理論，但在馬列主义的宝庫里是找不到这种論点的。这难道說不是修正主义嗎？甚至是不加伪装的修正主义嗎？你們把帝王將相“一治一乱”的朝代更替的教訓加以共产党吸取。但你們搞錯了。帝王將相的朝代更替，只不过是这个剝削者手中轉到那个剝削者手中，他們根本不代表人民，而中国共产党却不是如此，他才真正的代表人民，因此他不会亡，他不会被消灭，他将領導勇往直前，直到共产主义，才將因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自行消亡。

你們認為历史变了，“历史要求取消党的絕對領導权……不然党將阻碍历史前进”，我真不明白，难道历史真的提出这样的要求嗎？不！不是的！历史的要求却恰恰相反，它要求党繼續領導人民为实现人民的理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它要求更要加强党的領導，因为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人民需要党給他們指出方向。

为了达到你們取消党的領導的目的，你們在号召“反对共产党的政策也沒关系”，“假如不代表人民利益的主張和措施，被反掉又有什么可惜的呢！”这难道說还不很明显嗎？虽然你們所要取消的是党的絕對領導权，这又何嘗不是取消党的領導的代名詞呢！

你們認為現在的“根本問題在於徹底革新社會制度”，你們說“不僅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民主，連資本主義國家的假民主也沒有”，我不懂你們所需要的是什麼樣的民主？為什麼解放幾年來人民都呼吸着自由民主的空氣，而你們却一無所感呢？從你們的全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你們所需要的是反黨反人民的自由，是反社會主義的民主。是的，黨沒有給這樣人以充分的民主，如果給了，就會天下大亂；那時工人還會拿起錘頭，農民還會拿起鐮刀打你們的。

你們狂妄到何等地步，你們說：“人大不過是個泥菩薩而已”，這是對六億人民、對人民的代表進行攻擊，你們說：“很少看見‘人大’對國家大事進行過真正的討論”，請問制定憲法，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確定國家的預決算，這難道說不是國家大事嗎？你們所說：“很少看見委員提出重大的動議”，這是什麼動議呢？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議呢？如果是，人民沒有這個委託，他們又有什麼權力提出呢？

算了，問題已經很清楚了，你們所要求的是資本主義方式的“競選”，你們所理想的是那種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資產階級的議會制。

你們雖然承認“肅反是必要的”，但卻打起“歷史唯物主義”的招牌為反革命分子辯護。你們說有些人雖然殺過革命志士，但他是出於無奈，執行上級的命令，胡風“其實有些是歷史問題，有些是在言論不自由的情況下對教條主義者發出的暗語，絲毫看不出有反革命的氣味”，你們說，鎮反和肅反運動只不過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我真不明白，依你們的高見中國今天似乎不存在反革命了，因為“昨天殺人出於無奈，今天殺人是逼的”。事實又是如何呢？在

广州，特务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扔定时炸弹，对那些拥护党的人，不是连连接到匿名恐吓信，习仲勋、李仲公、卢郁文都收到这一类的恐吓信。罵他們“逢党之恶”威吓他們“随时随地留意，全家留意”。这些足以說明肃反不是“庸人自扰之”，而确实有反可肃。我說不仅过去要肃反，而且今后也应该“有反必肃”，否則那些别有用心反革命分子就会向工人阶级，向社会主义事业进攻，企图卷土重来。难道这些你們看不见嗎？不，看見了，但你們把反革命当成“人民”，要求党“爱民如子”，共产党是爱人民的，但并不爱那种穿着人民的外衣，干反人民勾当的人，对这些人要用暴力进行镇压。与此相反你們把人民和反革命分子混淆起来，界限不清，因此你們极力为这一小撮“人民”辯护，先生！你們是为反革命分子辯护。你們認為胡风沒有反革命气味，你們所說的气味莫非是讓胡风把“集束手榴彈”扔出去爆炸的火药味嗎？

說了上面这些，我感到張百生、黄振旅的文章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建設的新課題，而是給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設下了一个又一个的絆脚石，企图阻止历史前进。

（1957年6月12日沈阳日报）

先生：是你們把事情弄顛倒了

青年工作者 施玫、瑰华

在六月十日沈阳日报上看到了張百生、黄振旅写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新課題”。二位涉猎极为广泛，又口口声声

說：“規律”“历史唯物主义”“反教条主义”。可是，当我们看完了洋洋万言之后，只好这样说：是用臆测代替“規律”，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幌子下卖“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药；是在“反教条主义”的招牌下，贩卖资本主义虚伪民主的教条。

或許，他們二位看了会说我們是給“下棒子”要悶死他們，好！我們就用二位提出的具体問題爭一爭！

他倆說：“鎮反中杀人是多了些的，其中还有的是被錯杀了”。他倆的理由是“人都是具体社会里的一員，都需要生存，为了生存就要作事。在伪滿和国民党政界工作的人，有很多是为了养活自己和自己的父母妻女才为統治階級服务的”，甚至替杀害我們革命烈士的人辯解說：“还有些人虽然曾經枪杀过革命志士，但他們是出于無奈，执行上級命令”。真令人可怕，按他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邏輯，就不存在反革命了，若存在也只会是“一个！”这么一来我們祖先恨入骨髓、卖国投敌的吳三桂、秦檜也是可以原諒的好人了。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的战犯也可以是这二位的朋友了。因為他們不是“为了自家老小”就是“执行上級命令”嘛！这种論調不光是我們这一輩的人民，就是祖先知道了也要痛罵这两个人是爽了良心的。

他倆人說：“肃反”搞一个惊动全民的大运动是沒有必要的。理由是“剩下的殘余，我們量多質高的公安軍和公安局完全可以对付得了。”这样提問題未免太天真了。难道我們的鎮反、肃反运动是因为有恐公安机关对付不了嗎？請二位睜大眼睛看一看人民群眾在肃反运动中是怎样迅速的提高了政治敏銳性、警惕性吧！我們就是在斗争中查出了反革命

之后受到了一次极深刻的阶级教育的。人民眼睛擦亮了，什么是红的什么是白的是会很易辨清了。难道不必要吗？按他们的倡议是不要用暴力维护革命果实，而是承继著名的“爱民如子”“以德治国”的传统思想。这是不直一驳的。在任何朝代里这些词藻也只是点缀而已，那个封建王侯真的保护广大人民利益呢，也只是把大中小地主作为“子”去爱而已。而我们今天的国家却提倡干部要作人民的“勤务员”，劳动人民的“儿子”。

他们认为胡风集团不是反革命而是“百花的一朵”“只是就意识形态范围内的文学艺术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建议罢了”那些反动言论“是在言论不自由的情况下对教条主义者发出的暗语”，真使我们奇怪，这样一群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反动军官、中美合作所的特务、在“剿共”军里干过政治工作、当过汉奸，解放后隐瞒了历史，又秘密结成集团，企图夺取党的领导，提出了他们反动的文艺纲领的败类的言论，怎么能说是由于言论不自由的情况下对教条主义发出的暗语呢？我们不必用已发表的全部材料来看，就从这么几句看看：“和宁、徐、严诸兄在一块谈了一下，希望你早点写信给周（周总理），表示要来北京，要工作；他迟不回信，又写信催；他再不回信，就来北京找他。……其次，要采取进攻的战略方针，即不等他们提出你的问题，你先到上面提出你对目前的文艺运动的意见，给他们来一个闷棍吃吃”，这不解自详。这又是什么关于“流派”的问题呢？能是由于“言论不自由”才说出“给党一闷棍吃吃”吗？不是的，这一群是别有企图的人，若是“为了社会主义”——二位作者补充发言中说——的话就无论如何也不会挖空思想出那么多

誹謗的詞兒謾罵黨的領袖了。而這二位把它說成是“對教條主義者發出的暗語”。把他們說成是“仁人志士”實令人莫解。這二位是站在那個階梯上說話的。

他們又說合作化運動是冒進了。“大多數農民怕戴落后的帽子不得不參加的”。

先生！是你們把事情弄顛倒了，是黨不能落后於群眾要求合作化的要求，才不得不全面的合作化的。你們說是貸款促使了增產。可是，千千萬萬的社員農民，愛社如愛家，過去沒有水井的，打了井，土壤不好改良了土壤，千方百計去增加生產的勞動積極性怎麼解釋呢？還是多看看、多听听農民們的勞動和他們自己的發言吧！（找廣大農民談談那會好的多）

他們用了很大篇幅來攻擊黨的領導權問題。雖說是要加強黨的領導作用，而骨子裡却是要取消黨的領導。對黨和黨員作了極惡毒的誹謗。

他們說：共產黨在解放前是全心全意為人民的，解放後黨對一切問題有最後決定權，而使黨從組織上、思想上開始脫離群眾。竟帶有挑撥性的說：“難道百分之九十八的非黨同志都是無德無才，應當絕對服從百分之二的人主張，當這百分之二的人的‘順民’麼！這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是人民的歷史’‘人民是歷史的主人’的原則有什麼共通的地方？”我們先不說我們自己的話，就先用這二位的話來說說吧：這二位也不得不承認解放前的勝利“而是好幾萬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在黨的領導下共同創造的”，那麼，在解放後仍然在黨的領導下，怎麼就不合乎“歷史是人民的歷史”的原則了呢？我國歷史上還沒有那個朝代的人民能夠象今天這樣

真正成了历史的主人哪！又是什么时代有了“中国人”在国际上有这么高的声誉呢，就是因为今天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使人民真正成了主人。不言而喻，建设社会主义就更需要党的坚强领导，無論在任何借口掩护下要削弱党的领导，把人民和党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錯誤的。

他們还提到彻底改革我們的社会制度問題。說我們“不仅沒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連資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也沒有”他俩的依据是“一党专政”，党外人士有职無权。他們說：“选举只是变相的任命，代表只是代表个人，誰也不知道自己选的人是怎样的，他代表自己說了些什么。至于集会、結社、出版等必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不能逾越雷池一步，这怎能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真奇怪，这二位追求的是什么样的民主呢？看到后一部分里他俩說“几年来很少看見‘人大’对国家大事进行过真正的討論，很少看見委員提出重大的动議”并提出要“人大”分两院或三院这才使我們稍有所悟，原来，这二位是被資本主义国家議會中的爭論的热火朝天的資產阶级的民主所眩惑了。难道我們經過普选产生的“人大”是不民主嗎？难道代表了全国人民意志的共产党向国家提出了真正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的建議，而再沒有什么重大的补充下，就是不民主嗎？（关于有职有权的問題报上发表很多不再說它）看問題不要只追求現象。我們在实际生活里体会到的事情正和这二位所指責的选代表“也不知道选的人是怎样的”恰恰相反。我們不仅了解他們的历史、观点，而且知道他們的脾气！致于說集会、結社、出版都必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这又有什么可指責的呢？民主、自由是只能对广大人民來說，只能是国家法律允許內的。也正因为

是这样才真正体现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們广大职工、青年、妇女、兒童都有自己的組織，各阶层又有各民主党派作代表，这二位还要結什么社呢？难道这一切組織还不能代表广大人民嗎？全国出版了近百种报刊、杂志，不仅有給工、农、兵也有給青年、妇女以及广大兒童幼見的，能說不自由嗎？

所以我們坚决不能同意这二位的言論。党的領導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不能絲毫削弱的，我們人民是永远要跟着党走，受党的領導的。永远也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至于說党是“太上皇”拿着“聖經”“宝劍”，这不过是对党的領導施以破口謾罵而已，不值去談，但我們說这是我們不能允許的，因为我們不愿意听见有人破口大罵我們最亲近、最能代表我們利益的人。

总之，我們看了这篇言論之后感到气愤，但也不能不提醒他們認真地看一看屁股是坐在那里講話，手里搖的是什麼旗！

(1957年6月12日沈阳日报)

張百生、黃振旅在散布反社会主义 的論調販賣資本主义的毒菌

沈阳水泵厂 徐文心

当我打开报纸看到沈阳师范学院張百生、黃振旅的言論后，感到非常气愤。在他們的“为了社会主义”的美名下，却散布着反社会主义的論調，販賣着資本主义的毒菌。

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地庆賀鎮反、肃反的偉大胜利，对那些

罪該杀的反革命分子杀了，人民拍手称快，对那些罪該判刑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人民給以寬大处理，有的通过劳动改造成为新人，有的免于一切处分，通过肃反运动，不但肃清了暗藏在人民內部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搞清了多少人的政治历史，人民对他們更加信賴，这都是天大的好事。而張、黃却認为鎮反杀人多了，肃反运动搞錯了，他們說：“有些人虽然枪杀过革命志士，但他們是出于無奈，执行上級的命令。”因此他們認为枪杀反革命是“不人道的”，肃反是“得不偿失”，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扰之”！这真是荒謬已极的言論。照他們这样的說法，連蔣介石也不能算做反革命了，因为他也是“出于無奈”执行着美帝国主义的“命令”啊！請問：对反革命分子不鎮压而讓它們来杀害人民，这就是“人道”嗎？难道要不把在广州文化公园內放定时炸彈的特务捉住而讓定时炸彈爆炸，这才是“人道”嗎？我真不知道張、黃二位是什么样的邏輯？如果沒有鎮反、肃反的偉大胜利，难道能有現在和平的环境和安定的生活嗎？难道能讓你們二位在天日之下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論嗎？

人民憎恨国民党，推翻国民党，因为它給人民带来了灾害，带来了灭亡；人民歌頌共产党，拥护共产党，因为它給人民带来了幸福，带来了新生。而張、黃却認为：国民党就是共产党的前車之鉴。人民拥护共产党的領導，因为它領導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几千年的三大敌人，今后將領導中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張、黃却要取消共产党的絕對領導权，革新社会制度。人民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領導，而張、黃却說是总書記以上六个人的独裁，是“太上皇”，人民欢呼社会主义的真正民主，人民

成为国家的主人，而張、黃却認為：我們國家連資本主義國家的假民主也沒有，公民只能作順民、作奴隸。人民對那些不惜洒熱血、拋頭顱的革命老前輩以應有的尊敬和報酬，而張、黃却要讓他們去當馬夫，流放高級幹部。人民對一舉消滅了胡風反革命集團而拍手稱快，而張、黃却認為胡風不是反革命，象這樣的“諛諛之士”應該歡迎。農業合作化給農民們帶來了莫大的好處，在災荒嚴重的地區不被餓死，而張、黃却認為：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冒進了，應當允許小量土地自由買賣，讓資本主義再在中國的土地上復辟。

看了他們這些煽動性的、聳人聽聞的言論，我真不知道說什麼才好，想來想去，我覺得他們這些話的中心意思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雖然他們却美其名是為了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但是，他們的骨子裡，人民一看就會看穿的。

我要抗議他們這種反社會主義的言論，不許它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國興風作浪，不許它一点一滴地污蔑和侵害我們的黨。特別是作為一個共青團員，我要抗議瀋陽師範學院團委宣傳部長張百生的這種謬論。（1957年6月12日瀋陽日報）

肅反運動是完全必要的

戴 同 林

我是一個普通的公安幹部，看了六月十日瀋陽日報所載張百生、黃振旅的謬論後，不能容忍，不能沉默，現據肅反問題提出我的看法。

張百生和黃振旅說，搞驚動全民的肅反運動沒有必要，因為剩下的殘余，由公安軍和公安局完全可以對付得了。這樣提問題，非常天真。說“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是散播麻痺思想，為敵人張目。說“有些人雖然槍殺過革命志士，但他是出於無奈，執行上級的命令”，是為反革命辯護，對反革命分子的仁愛表現。說“用暴力維護革命果實，這與我國著名的‘愛民如子’‘以德立國’‘以法治國’的傳統思想是背道而馳的。”是缺乏階級觀點、無視事實的說法。

我的反駁是有理由的，搞肅反運動比單由公安機關捕捉反革命是有好處的：一、可以提高廣大群眾的政治覺悟和政治警惕性；二、群眾擦亮眼睛後，可以挖掘出更多的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為維護社會治安打下良好基礎；三、在群眾共目所視之下進行肅反，可以相對地減少冤案、錯案；四、群眾掀起運動後，更加孤立了反革命分子，使他們的反動思想受到分化瓦解，紛紛坦白自首，爭取寬大處理；五、群眾的警惕性提高，能夠保守黨和國家的機密；六、搞群眾運動，可以避免“麻木不仁”或“草木皆兵”的偏差，使群眾更加相信與熱愛人民自己的政府。看來，好處是非常大的。

在肅反中，是不是“不問青紅皂白大加殺戮”根本不是。黨中央和毛主席早就提出“提高警惕，肅清一切特務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個好人”“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方針，實際上，處決一個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不但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法院認真調查，層層偵察審查，審判只有對確系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才殺。我曾看

过一些历史反革命的案卷，有的血债累累，甚至把自己的妻子剖腹开膛，由于投案自首，也没有杀。有一个反革命分子，日伪翻译，亲手枪杀十五条无辜人命，坦白后也仅仅判了几年徒刑。难道说这还不人道吗！能说是“杀多了”吗！至于大批的旧军政人员，坦白后的特务分子、国民党党员，现在仍然在国家机关、企业中供职领薪，有公民权，不受歧视，不也是事实吗！这如何能说成是“不分青红皂白大加杀戮”了呢！

也的确有一些人在肃反运动中，被错斗，错捕，但总的说来是个别现象，而且产生这现象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有许多因素，至于说根子在中央，是谬论。中央所提出的方针是“不要冤枉一个好人”、“有错必纠”。我曾亲眼看到中央派人下来认真协助纠错的情况。领导上和群众对公安人员的要求都是十分严格的，一般公安人员焉敢乘机打击报复好人呢！当然，也有个别的人，由于历史上有污点没有交清，或者被嫌疑入检举一时未弄清，公安人员在进行给他弄清问题的工作时，表现急躁草率，偏听偏信，有所不当，以致今天虽然他的历史污点已下结论，组织予以置信，或纠了错、道了歉，本应感谢党中央、毛主席，可是由于精神创伤很重，或思想狭隘多疑，不去反对某些公安人员身上的“三害”，积极投入整风运动，而是恩将仇报，竟恨党中央了。当然，这种个别人，看了张百生、黄振旅的谬论后，很可能引起共鸣。从这方面来看，我也感到张百生、黄振旅的言论，居心叵测。

张、黄二人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是不值得一驳的。从这几天的报纸上可以看到，派遣特务龙沛强在广

州一个公园里放定时炸彈，如果不是被两个青年学徒发现而扭捕，那該有多么危險啊！可能炸死很多無辜的生命。可是如果这两个青年学徒，迷信了張、黃的論点，認為“天下本無事”，我不必去观察，如果我去观察了就是庸人，那么特务还会被捕嗎？說不定这两个青年学徒也会被炸死的。再如，六月十一日沈阳日报上所載福建前綫破获一反革命組織的消息，这伙反革命分子不仅訂出了反革命活动計劃，而且任命了“軍”“师”“旅”长，进行暗杀政府人員、搶劫倉庫的阴謀活动，这能說是“天下本無事”嗎？当这伙反革命分子杀死了一个政府工作人員，打伤了两个人以后，我們的解放軍把他們捕获起来，难道这能說我們的解放軍是“庸人”，在“自扰”嗎！如果这种观点不批判，只会对敌人有利。

張、黃二人說：“有些人虽然枪杀过革命志士，但他是出于無奈，执行上級的命令”。今天人民政府对那些不知案情單純执行上級命令而杀人的劊子手，处理时和主謀下令枪杀革命志士的反革命分子，显然是有区别的。但是，如果象張、黃二人这样推断起来，那么，革命志士只有含冤九泉之下，階級敌人仍可我行我素了！如，我們捉到了一个枪杀革命志士的劊子手，他声辯是“出于無奈，上級之命，”那么，捉到了他的上級，他上級也会說“出于無奈，上級之命”，后来，如捉到了蔣介石，他也可声辯說：“出于無奈，美国主子之命”啊！最后，追查到美国的华尔街老板，他也会嘿嘿冷笑說：“我是出于無奈啊，这是市場上的价值法則决定的！而且我又沒有亲自动手杀人啊！”显然，推断的結論是革命志士算白死。今天只要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享受着

革命烈士所給自己掙來的幸福，和平生活，忍心去做這樣的論斷嗎！當然，今天人民政府對那些坦白自首的反革命分子，是寬大處理的，甚至有的還免予刑事處分；但對那些尚未坦白，仍然張牙舞爪的反革命分子，絕不能本着張、黃二人的觀點看成是“出于無奈”“上級命令”而去偏愛他們。

張、黃二人說：“鎮反和肅反都是企圖用暴力維護革命果實，這與我國著名的‘愛民如子’‘以德立國’‘以法治國’的傳統思想是背道而馳的。”這種論點是缺乏階級觀點的，嚴格說起來是站在反動階級立場上的狡辯之詞。從歷史上來推論，那個反動統治階級真正“愛民如子”“以德立國”“以法治國”，那不過是虛偽的幌子而已，也可以說是愚民政策，掩耳盜鈴。歷史上，反動統治階級，包括國民黨反動派在內，所製造的大屠殺，試問，有“愛民如子”的味道嗎？還不是為了少數統治者的私利而殺人！今天人民政府為了維護人民大眾的利益，對小撮反革命分子進行鎮壓，不但和“愛民如子”背道而馳，而且正可以說是“愛民如子”的具體表現。而且所謂“愛民如子”“以德立國”“以法治國”的口號，只有在共產黨所領導下的消滅了剝削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里才能體現出來。

（1957年6月15日沈陽日報）

對反革命分子不能施仁政

東北財經學院 李維森

看到張百生和黃振旅二人在沈陽日報（六月十日）所發

表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新課題”一文，不能不說滿篇是反社会主义言論，令人有無比的憤慨。仅就鎮反、肃反問題來看，二位作者是自覺不自覺地为反革命分子呼吁了一番。

他俩說：“人都是具体社会里的一員，都需要生存，为了生存就要做事，在伪滿和国民党軍政界工作的人，有很多是为了养活自己和自己的父母妻女，才去为統治者服务的，其中有些是凶恶的，但也有些人是糊涂而善良的。还有些人虽然曾經枪杀过革命志士，但他是出于無奈，执行上級的命令。”根据他們的說法，杀死共产党的創始人李大釗的王激、鋤死刘胡兰的徐得胜、杀死楊虎城全家的楊进兴，都不應該判处极刑！因为他們也是一个社会的一員需要生存，也要养活老婆孩子；更重要是因为他們也是“出于無奈”，

“执行上級命令”啊！如果这样推論下去，最終都是执行蔣介石一个人的命令，因此，蔣介石該杀。但蔣介石也会不滿意地說，“我也是执行美帝国主义的命令啊！”所以把枪口对美帝国主义吧！而“美帝”也会說，他們是执行“上帝”的指示啊！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不知多少人的头顱被血淋淋的劊子手砍掉，都应当宣告無罪！人們起来向“上帝”判刑吧！如果秦檜能听到二位作者的“高見”，該有多么欢欣鼓舞，他摆脱了几百年来人民对他的唾棄，可以說在你們的“理論基础”上卸下卖国賊的包袱！——这是多么荒謬之至啊！請問二位作者，馬克思主义的階級观点跑到那里去了！你們究竟是在为誰講話？

二位作者又說，“鎮反和肃反都是企图用暴力維護革命果实，这与我国著名的‘愛民如子’‘以德立国’‘以法治国’的傳統思想是背道而馳的。”請讀者們注意，張黃二位

作者不是再教导我們学习“东郭先生”的仁政嗎?!如果真要学习“东郭先生”不被“狼”吃掉了,也得被象在最近广州特务扔下的定时炸彈所吞沒。張、黃二位作者,責备我們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你們本身倒忘記了历史的教訓,在任何朝代里所謂“仁政”只是点綴而已,在这个“仁政”的背后都隱藏着枪刀和血迹啊!蔣介石最善于講“仁政”,他是孙中山的“好信徒”,南京的雨花台死了多少革命烈士。当然啦,这些革命先烈的牺牲,对你們來說,都是無所謂的。因此,革命烈士的鮮血和头顱换来今天你們的“暢所欲言”,不是为殉难者复仇,或加倍努力建設社会主义,而是以反动言論,为反革命分子辯护。

如果二位作者,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怎么能認為肃反搞了一个惊动全民的大运动是沒有必要的呢?难道只能讓公安干部去搞,只讓罗瑞卿一个人去搞。历史唯物主义教导我們的群众观点,在你們的脑子里不是根本消失了嗎?前边所举杀死三位烈士(李大釗、刘胡兰、楊虎城)的,不是在肃反运动期間由群众揭发而被捕的嗎?按照你們的观点,发动群众参加階級斗争,就得叫“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扰之”,我看天下若真無事,怎么扰也扰不出来。

不論你們用怎样华丽的詞藻,拥护党,“鎮反、肃反”是必要的,但你們的言論是离开階級观点,群众观点,是反社会主义的言論,是在为反革命分子捏造“理論根据”。因而企图从你們創造的理論上来歪曲,污蔑党的鎮反和肃反政策,可是人們会識破你們葫蘆里卖的什么药!我們坚决反对借帮助党整风贩卖反动言論。

(1957年6月18日辽宁日报)

說鎮反多杀了人毫無根据

沈阳矿山机器厂福利科副科长 蔡定輝

張百生、黃振旅等認為：鎮反多杀了人，肃反搞錯了；并且說：被杀的人中有好些是国民党的旧軍政人員。我說这是毫無根据的一派胡言和不值得一駁的鬼話。

我自己就是国民党的旧軍政人員，参加过国民党，参加过清帮、紅帮，当过国民党黃浦軍校七分校的教官，还当过西安市警备司令部的义务情报員，以及警卫旅的少校营长，并且还有过如張、黃二人所說的所謂“是执行上級命令”的两笔血債，后因全营起义，得到党的寬大处理。我过去罪恶深重，要是按照他們的說法，我的脑袋早已搬了家，可是，事实上是我的脑袋还安稳地长在脖子上。我活着，全家人幸福愉快的活着，不仅活着，而且共产党还信托給我重要的工作，使我担任沈阳矿山机器厂福利科的副科长。难道这不是鉄的事实嗎？張、黃等人謬論的根据是什么呢？他們究竟居的是什麼心？我認為这純粹是放烟幕彈，企图离間我們人民內部的团結，搞垮我們的社会主义大厦。但是，我要郑重指出：右派分子的打算完全是狂妄的梦想。为了保卫劳动人民的胜利果实，我坚决拥护共产党，击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1957年6月23日辽宁日报)

何謂“庸人自扰”

谷 梁 春

有些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企图把肃反运动的巨大成績一笔抹煞，沈阳师范学院的張百生、黃振旅二人公然說：“很明显，党中央对殘余敌人的估計是最大的主观主义，在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宁左勿右’，打錯了好人，破坏了法制……。真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扰之’！”

这样一来，千百万参加过肃反运动的人，不过都是“庸人”；而肃反运动中对許多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也皆为“自扰”了。

我不知道“庸人”究竟作何解釋。仿佛“史記”上曾說：“才能不过凡庸”。大概凡是才能低劣的就叫庸人。因此，張黃二位这种罵人的說法，未免口气太大了些。这和另一位在陝西师范学院中的“英雄”，把群众認為“沒有头脑的应声虫”，堪称異曲同工。

但，我們也可不必計較这些。本来嘛，数千年来我們挨的罵又何賞“鮮矣哉”？皇帝老子以及皇帝老子敬奉的“圣人”罵我們为“庶人”、“蟻民”、“小子”等等，正不知有多少。其实又奈我何？——人民还是人民。几句罵，不会把我們罵倒的。

应当講清楚的倒是所謂“自扰”的問題。

我想，張、黃两位先生未必是不看报的。中央公安部罗

瑞卿部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曾谈到这样几个案子：福建一个反革命分子，把砒霜放在面粉内，一下子毒了七十二个人；河北灤城县的“还乡道”匪徒，一次杀死杀伤县村干部和农民七个人。……对于这些反革命匪徒，按照張百生、黃振旅的邏輯，就不應該逮捕法办，彻底肃清，以免“庸人自扰”。不久之前，在广州还逮住了一个特务，这个特务在公园里投放了一枚定时炸彈。倘依張、黃二位的意見，也可以不去逮捕这个特务，可以讓那枚定时炸彈爆炸，使千百个人头落地，以免“庸人自扰”。

如果人們真的按照張黃二位的意見去做，其結果，必是反革命分子鼓掌欢迎，并对張、黃二位“五体投地”，“感恩不尽”；而人民呢，那就要遭殃了。但是，人民毕竟不是“庸人”，我們决不允許反革命分子乱說乱动，也不允許象張百生、黃振旅这样的人給反革命分子出主意，打掩护。

張、黃二位在发言中，还有这样一段話：“鎮反和肃反都是企图用暴力維護革命果实，这与我国著名的‘爱民如子’‘以德立国’‘依法治国’的傳統思想是背道而馳的。”請看，二位先生簡直是在“为民請命”了。可惜，二位所以要“为民請命”的原因，都是从反对“用暴力維護革命果实”这一点而发的。那么，这“民”是誰，也就不难理解了。

反对人們去“維護革命果实”，要求人們对反革命分子“爱民如子”，这种論調比耶穌的泛爱主义还危險得多。耶穌主張別人打你的左臉，你要給他右臉，而張、黃更主張把反革命分子当作亲生兒子般去溺爱，这簡直就是“認賊作父”“甘为仇虏”了。（1957年6月29日天津日报）

声討右派分子東星北

看！東星北是怎样恶毒地污蔑肃反
并攻击毛主席的指示

林 明

東星北在中共山东省委召开的宣傳工作會議上发言的补遺(載于九三学社山大支社主編的“民主报”第二期)中說：

“談到人，即使毛主席也不能保証沒有偶然的錯誤，如肃反时毛主席說了一句‘反革命分子可能只有百分之几’一句估計猜度的話，但是后来竟成为肃反的指标……我們看，靠‘人治’是多危險。”

東星北拍着胸脯，嘶声号叫：我要“維護宪法”。嗣后，又那么情深意濃地对那臭气远揚、腐朽透頂的“資本主义民主”“法治精神”，歌頌了一番。随后，眼珠一瞪：看！靠毛主席的“人治”是多危險呵！

其用心之恶毒，可見一斑！

我們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明明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

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我們在实际工作中也确是在执行着。

这就是東星北所仇視的“人治”！

宪法——中国人民的根本大法。宪法的制定不仅是我国人民革命的里程碑，也标志着我国人民新紀元的开始。我們絕不容許右派分子歪曲污蔑宪法。真正保卫宪法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不是醉心“资本主义民主”“法治精神”的東星北。

毛主席說：“反革命分子可能只有百分之几”。我們体会：毛主席的話正告訴我們，絕大多数是好人，反革命分子只是极少数，但是必須坚决肃清。反革命分子不是按百分之几来确定，来定罪，而是根据了客观事实和材料来分析估計的。全国和各地肃反的結果完全証明了毛主席估計的正确。事实不容抹杀。毛主席的話有何錯誤？

東星北竟然又說什么：“毛主席的偶然估計錯誤，可能根本是誤会了他的意思，竟然非搞出百分之几的定額不可。”

这就是東星北污蔑宪法和人民領袖的手法。試問：東星北居心安在？

我呼吁：同志們！保卫我們神圣的宪法，坚决击潰右派分子来自各方面的进攻！

（1957年6月29日青島日报）

束星北的最后目的是反对党

反对人民民主专政

山东大学外文系讲师 陆 凡

我与束星北先生没有什么个人成见，过去的运动也都沒有在一起，仅仅是这一次整风运动以来，束星北先生在发言里面使我看出来，他是在打着帮助党整风的幌子，来进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宣傳。

束星北先生的第一篇发言叫做“党委的指导思想是什么？”用这样一个标题的本身，束先生就使了一个障眼法。为什么說是个障眼法呢？这就是說：我所要談的是山大党委的指导思想，如果我歪曲了也仅仅是山东大学的党委，不是反党，甚至于只是說的王承瑞的指导思想，要是你們根据这个說我反党，那就是报复打击。可是在这里我要給束先生一付后悔药吃，就在你那一篇文章里，还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这个指导思想决不是解放前领导抗日战争时的指导思想。”这是指的山东大学党委嗎？抗日战争时候山东大学有共产党的党委会领导抗日战争嗎？所以，很明显的，束先生指的不是山大党委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而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他所說的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下面他編了四句顺口溜：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有人山下走，不准把头抬”。这样一个顺口溜說明什么问题呢？說明共产党是占山为王的强盗，共产党認為天下是我的，我开的

山，別人就不許抬頭。所以在这里我們就看出東先生耍了半天的花招，結果拿出来的也不过是和儲安平一樣的“黨天下論”。不過是說：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就是少數人專政，不准別人抬頭的宗派主義。這難道不是對共產黨指導思想的一個歪曲嗎？共產黨的黨章的總綱中明文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周總理的報告里也講過，共產黨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建成一個共產主義社會，消滅一切階級，消滅一切黨派，包括共產黨在內。這樣一個黨是和宗派主義絕對不能相容的。可是東先生把黨說成占山為王的強盜，這不是污蔑宗派主義是黨的指導思想是什麼呢？東先生為什麼要污蔑宗派主義是黨的指導思想呢？他的目的安在呢？從“新山大”上發表的他那一篇發言，和“民主報”上發表的他那一篇發言，就可以看出來，他把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歪曲為宗派主義，是有下面這樣幾個目的的：

第一個目的就是从這樣一個歪曲出發，否定肅反的必要性和成績。他說：“我警告你，反對黨員就是反對黨，他是領導，是政府任命的，你要是反對他就是反對政府，反對政府的目的，就是顛覆人民政府，這就是現行反革命分子。”這樣一個荒謬的邏輯，輕描淡寫的就否定了我們所確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的人是什麼人，那就是說我們是从宗派主義出發，進行對對個別黨員有意見、不對頭的人的一種打擊，一種排除異己，也就是說宗派主義是肅反的起因。這不是否定肅反的必要性嗎？按東星北所說，現行反革命分子不是由于他的罪行確定的，而是由于對黨員提意見反對黨員或者給政府個別領導提意見，難道我們所確定的逮捕的那些現行反革命分子是這樣的嗎？關於肅反的成績，東先生是這樣寫的：

“我們党委除了創造发明之外，成績有多少？”这还不很明显嗎？就是說成績是党委創造的，其实党委沒有成績。这是第一个目的，就是把党委的指导思想歪曲为宗派主义，达到否定肃反的目的。

第二个目的是挑撥党群关系。如果党是一个宗派主义的党，当然是脱离群众的了。東先生在“民主报”所发表的那篇在宗派主义上大做文章的发言特別举出他的一些論点，來說明党是宗派主义的，而宗派主义是怎样脱离群众的。比如說，他这样講，党对于犯錯誤的党员是包庇的，而对于群众是打击的。我們用山大的事实，就可以反駁他这种荒謬的論調。华崗是共产党员，华崗犯了錯誤了，华崗当时是山大的党委書記，包庇了沒有？沒有！别的党员犯錯誤，就不要說了，这是一个很有力的証实吧。再举个群众，就是東星北，東先生有那样严重的历史反革命罪行，可是党对他打击了沒有，他自己也講，“党对我是寬大的，是寬大的”，这不就很好的証明，他的这些言論是污蔑嗎？再举一个例子，說宗派主义培养人就是送进修，提拔干部都是要政治上可靠的人。他把政治可靠打上一个括弧，然后他硬要說我們所謂政治可靠，就是单凭成份，单凭是否是党员。現在我們就看，这两个問題上，是不是歪曲，是不是污蔑？首先我們說，培养和提拔干部要不要政治上可靠的人？当然要！現在要，过去要，将来也永远要！因为培养干部提拔干部为了干什么？为的是建設社会主义，而建設社会主义是要用工人階級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这能依靠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嗎？能够依靠象東星北以及和他同样的这样的人嗎？刚才赵儷生先生已經談了，我們学校里有这样三位先生（按指陆侃如、刘鴻宾、東

星北)已經扮演了这样一出大戏了,如果說我們山大依靠的都象这三位先生,我們山大能办得成嗎?不依靠政治上可靠的人依靠誰?其次我們所說的政治上可靠是不是单凭成份呢?是不是单凭是否黨員呢?这是不值一駁的。我們看看山大各系的負責同志,有几个是共產黨員?我們办好学校不依靠他們嗎?我們看看他們之所以被聘任为各系的領導人負責人是不是单凭他們的成份?显然这是荒謬的歪曲。

東星北把党的指导思想歪曲为宗派主义,从而否定肃反,挑撥党群关系,为了达到一个最后的目的,也就是他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領導,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就是說,共产党不能管理国家了。那末我們看一看共产党和在共产党領導下的那些政治上可靠的工作人員們,自从他們管理国家大事以来,他們做了多少事情呢?他們是不是象把衣服裁坏了那样的把国家大事管坏了呢?对人民有損失了呢?詳細的不用講了,我們只看看八年以来,共产党和在共产党領導下的一些政治可靠的工作同志們,和全国人民一起,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設上也取得偉大成就,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成就,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党以及它的階級管理国家能比这管理得更好嗎?東星北想不讓共产党管理国家,那么誰来管理国家呢?也許那些“总統、总理、作战部长”想管理国家,可是看看今天这个大会,能管得成嗎?

最后我就这样提一下,東星北你不要再耍什么花招了,也不要再弄什么玄虛,也不要再使用什么伎倆了,你的歪曲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以及从而要达到的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民主专政这样一个反动宣傳的这样一个阴谋已經从你的发言里讓人識破了。

(1957年7月16日青島日报)

束星北历史上的反革命罪恶

李 恒 勤

我看了青島日报6月28日发表的“束星北怎样猖狂向党进攻”一文后，感到极大的憤慨！他竟公然否定肃反成績，污蔑肃反是“違反宪法”，同时，污蔑我党是“宗派主义者”，企图借此反对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挑撥党和知識分子的关系。束星北为什么这样猖狂、恶毒地向党进攻呢？是否因为在肃反运动中斗錯了他，引起他对党不滿，在向党发洩私憤呢？不是，完全不是这样！因为这次在肃反运动中斗争他是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的：

束星北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在历史上原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中专门負責研究電訊器材和訓練使用電訊器材的专职的特务分子。他干特务是从一九四四年七月开始参加国民党軍令部二厅（即国防部二厅特务机关的前身），先到綦江電訊人員訓練班（应特別注意这个訓練班是蔣特专职人員訓練班，专门在这里培养訓練使用電訊器材的高级特务分子来反对共产党和反对人民的），住一、二个星期后到重庆軍令部二厅技术室（专门負責訓練培养使用電訊器材的专职特务分子的技术指导的领导机关），以后又曾到专职特务的訓練班，为特务分子訓練班进行过电池实验，简单收、发报机实验，于一九四四年十月又返回重庆軍令部二厅技术室，到一九四九年九月，近一年的时间，一直担任顧問。由于他在这一期间忠于国民党軍統特务机关，为他們

培养訓練特务分子和对特务运用之电訊器材的研究有很大貢獻，因而取得了国民党軍統特务机关的信任，于一九四五年八月被提任軍令部二厅技术室的副主任和提升少將軍銜。他在任职期間的月薪是伪法币一万元，相当于当时两个少将每月的薪金。東星北这一段反革命罪恶主要是积极的研究供特务使用的电訊器材，曾經研究装备了雷达实验工作，并且研究装配了一部电台远近探测器，同时又研究装配了一部低压收发报机。他这些研究的成就，完全供国民党軍令部二厅培养訓練专职特务分子应用，和供已經訓練好的特务分子用来刺探共产党的情报和通訊联络。从東星北这一段历史来看，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杀人不見血的历史特务分子。

在肃反中斗争之后，經過反复調查，証实了上述情节。虽然是这种情况，山大党委还为他做了許多善后工作，山大党委負責同志曾經对他当面作过数次檢討和道歉，并且将对他的斗争的結論和山大党委会的檢討于一九五六年九月一日書面通知了全校各单位，于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八日又召开了全校大会，山大党委負責同志在这次大会上又作了檢討，并传达了党委对他的結論。接着東星北又要求将山大党委的檢討和結論印二百份，发給他的亲戚朋友。山大党委也接受了他的要求，印了二百份，由他本人发給了他的亲戚朋友。我認为山大党委这种作法，不仅作到了仁至义尽，而且已經太过份了！善后工作做到这样地步，还能使東星北不滿意嗎？連東星北自己也會經对他的朋友談过，党对他确实作到了仁至义尽。既然，党已作到了仁至义尽，为什么他还在大放中興風作浪猖狂向党进攻呢？我認为他这种反党反社会主

义的阴谋活动是不难理解的，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右派分子，而且还是一个历史特务分子。这次他乘着共产党整风，扛着帮助党整风的大旗向党猖狂地进攻，完全暴露了他的真正丑恶面目和本質。

以上所述，完全可以看出東星北这次借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向党猖狂进攻的真正目的，他企图死灰复燃，利用帮助党整风的口号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因此我們必須提高警惕，坚决击败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坚决繼續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坚决保卫我們中国人民的救星共产党和偉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1957年7月5日青島日报)

斗争東星北是完全正确的

山东大学 余向远

七月五日青島日报上有人揭露了東星北的罪恶历史，我觉得对他反革命历史的揭露还不够，为了使大家更清楚地了解東星北的反动面貌，現在将我所了解的有关東星北的情况补充揭露出来。

東星北在肃反运动以后，特别是在最近的整风运动中，到处歪曲宣傳，說他本来没有什么問題，肃反中被斗争是有人打击报复。并且装模作样叫人看起来好象他受了很大委屈。实际情况是怎样呢？原来在肃反运动前就有許多人紛紛地检举東星北的反革命历史。

(一) 有的人檢舉“東星北于一九四四年七月，經軍統特務徐名冠介紹，到匪軍令部魏大銘部下，被派至綦江電訊人員訓練班，訓練潛伏特務。

(二) 另有人檢舉“東星北在一九四四年左右任過匪軍令部技術室副主任，技術室下設無線電等三個組，東自兼無線電組組長，無線電組曾在四川綦江等地開過訓練班，訓練特務人員的收發報技術。”

(三) 又有人檢舉說：“東星北于一九四五年任偽軍令部技術室主任，該室分無線電及化學等組，專門從事破壞活動，如化學組專制烈性毒品，通訊葯水、葯粉、縱火劑及昏迷劑等葯品。”

(四) 又據在押某犯人供稱：“東星北可能為匪在解放區潛伏電台擔任修理或供給電訊器材等任務。”

此外，還有許多人檢舉了東星北在解放前後的大量反動言行。因此在肅反運動中被當作重大的反革命嫌疑分子，進行了審查和鬥爭。

肅反一開始，組織上一再動員他交代問題，他不僅不向人民低頭認罪，老老實實地作徹底交代，反而蠻橫無理，拍桌子罵人，態度十分凶暴。經過鬥爭以後，先後組織了八位同志，分頭去南京、北京、上海、杭州以及江蘇、浙江和河北等省的中小城市和鄉村，反復地向數十人進行了查對，取得了確鑿的證據，証實東星北確實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帶領了幾個助手，由軍統特務分子徐名冠（現在押）介紹給軍令部二廳（特務機關，國防部二廳前身）技術室主任、軍統高級特務魏大銘。到軍令部後，一開始就把東星北派到綦江電訊人員訓練班教特工電訊技術和指導特工實習；後來回到技術室

任顧問。在此期間，東星北指導幾個特務分子做過低壓收發報機，電台遠近測探器和雷達的裝備等，任職期間他拿着很高的薪金（等於兩個少將的待遇）。直接訓練危害人民的特務人員。日本投降後，正式公布東星北擔任軍令部二廳技術室副主任。同時，東星北自請委他為中將，被批准為少將。後來只是因為爭發“勝利獎金”與特務頭子陶士珍（技術室主任）鬧翻了，東才離開了該特務機關。在任反動職務期間，東星北還曾與外國特務間諜有來往，例如一九四五年四、五月間，東星北曾帶領一個美國人到技術室內參觀，並要求美國人幫助一些儀器材料。其後，東星北又領兩個英國情報機關派來的英國特務參觀過技術室，英國人答應把印度的一部分無綫電器材給他們。上列反革命歷史，東星北在肅反運動前只作了部分交代，有的沒有交代。

東星北不僅有這樣的反動歷史，大家再來看看東星北在解放前後的反動言行吧！

解放前東星北在浙大時，曾經參加過反蘇遊行，並為首高呼：“槍斃斯大林！”“打倒新華日報！”等反動口號，辱罵中共是吳三桂。解放後東星北沒有放棄他的反動立場，曾惡毒地說：“紅旗所過之處一片淒涼，是鬼的世界。”還造謠惑眾，說在浙大逮捕的軍統特務胡步青不是特務，還說胡被捕後受了慘刑，指甲都被剝掉了（事後公安機關曾將胡步青送回浙大，在群眾面前公開坦白過，才粉碎了這個謠言）。來山大後，他在聽統購統銷的報告時對人說：“不用聽了，這是政治手段”，別人說物價穩定是我們的社會制度優越，他說不是。東星北極端仇視黨的領導，他說：“學校里應該科學技術第一，馬列主義其次，”又說：“現在學校

中馬列主义太多了，“今天大学办不好，就是党在学校中統治的結果。”東星北也極端仇視进步人士，他不仅經常辱罵黨員，如罵崔戎同志是一霸，罵張学銘是嘍囉，罵團員是吃“这碗飯”的狗，还罵郭沫若是“大官僚”，罵郭貽誠副教务长是“傀儡”、“混蛋”。辱罵民主人士是“应声虫”、“投机分子”，說民主人士“以前捧国民党，現在又捧共产党，是拍馬屁的，跑衙門的，向上爬”等等，東星北的反動言論我不能全部写出来，就此可見一般。

根据上述事实，我觉得对東星北的反革命問題應該重新下結論。但是在查清了他的問題以后，山大党委不仅沒有定他为反革命分子，相反地給他平反，向他一再說好話，希望他能够好好地工作。对此，連東星北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党委对他是做到仁至义尽了（实际上是太过分了）。但是在平反后，他还一再無理取鬧，誣蔑对他斗争是打击报复，并在整风运动中，誣蔑肃反是違犯宪法，猖狂地向党进攻，其居心何在，照然若揭。我認为應該对他彻底追查，这一次絕不能讓他滑过去。

（1957年7月6日青島日报）

肃反中对東星北的斗争 是完全應該的

山东大学物理系学生 平 鑫

最近几天青島日报上登載了有关批判東星北的文章，揭

露了東星北是打着幫助黨整風的旗幟向黨猖狂進攻的右派分子，使廣大讀者能看出東星北的真面目。但直到現在還有一部分人對東星北表示同情，認為肅反中不應該鬥爭他，說他不是右派分子。究竟東星北是不是右派分子，肅反中對他的鬥爭是否應該呢？這是讀者所需要知道的問題。很遺憾我不會寫文章，可是我可以拿事實來說明這個問題。

東先生認為山大的肅反“成績算個屁”。請問東先生：肅反中在山大查出了十二名反革命分子，不算成績算什麼？肅反中還把很多人的歷史問題搞清楚了，這不算成績算什麼？東先生認為沒有什麼理由鬥爭他，難道真的就不該鬥他嗎？不，我認為對他的鬥爭是完全應該的。在這裡可以把鬥爭會上所揭發出來的材料舉幾個例，就足夠說明問題了。東星北在解放前擔任過國民黨軍令部二廳（請讀者注意：偽軍令部二廳是特務機構）的技術顧問。當時他要申請中將軍銜，後來他的上級只批准少將軍銜。據他說：只是因為爭“勝利獎金”同特務頭子鬧翻了就不干了。解放後，有一次他的兒子把當時國民黨給他的委任狀拿出來玩，他回家看見就說：誰叫你把這個拿出來玩的，給他們知道（指人民政府）要殺頭的。例子還有很多，就這兩個已足夠說明問題了。究竟當時對東星北的鬥爭是否應該？這個結論由讀者和東先生自己來作吧！

打着幫助黨整風的旗幟，向黨猖狂進攻的東星北所寫的“我們黨委的指導思想是什麼”一文（見五月二十八日青島日報）中寫道“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有人山下走，不准把頭抬”的順口溜，與儲安平“黨天下”的謬論有什麼區別呢？只不過是一個口號的兩種喊法罷了。由此可見，東星

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派分子。

最后我还得声明一下，我是山大物理系的学生，而束星北是物理系的教授，学生尊敬教授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对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論应給以無情地打击。因此，我也希望我們的同學們打破顧慮，坚决地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进行斗争！

(1957年6月29日青島日报)

建議修改对束星北的肃反結論

沈 宁

要求山大党委会立即在全校範圍內公布束星北的反动历史材料！建議山大党委会修改在肃反运动中对束星北所作的結論。这是昨（五）日山大物理系教职員反右派斗争會議上通过的两項決議。

昨日，参加會議的除物理系全体教职員、工外，还有数学系的全体教师。束星北原說要出席會議，但到临开会时又借口“星期五是非規定学习时间”而拒絕到会。

束星北迭次逃会的恶劣行徑再一次引起了与会者的憤怒，同时，也使大家对他的反动本質有了进一步的認識。“束星北不来开会是因为他沒有胆量！”助教沈家瑛在說了这旬束不敢面对真理的話后，激动地揭发了束星北在浙江大学工作时的許多肮脏事。助教何瑄說：束星北在文章中将山大党委描繪成地主恶霸，他对共产党充滿了仇恨，他要“訴苦”，他有什么苦？！他在解放前是国民党少将，是訓練小特

务的大特务，而如今在物理系又横行霸道，蛮不讲理。

“肃反运动中对束星北追查是完全应该的。如果说有错，那就是在平反时党委对他道歉太过分。”这是许多发言者的共同的语言。因此大家提出对束星北的肃反结论应该加以修改。大家认为从党委对束星北的宽大处理，也充分说明了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照顾和关怀。数学系教授刘智白说，束星北存心兜恶，他竟想动摇我们人民民主专政。党委在肃反运动中对束星北清查是完全应该的。他是一个大特务，人民宽大了他，他却倒过来反咬党委一口。他在“我们党委的指导思想是什么？”一文中说要看“行情”，什么“行情”呢？那就是要看看北京、上海等地右派分子的“行情”，以便伺机而动。告诉你，宪法规定人民有自由，却没有规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

会上，大家发言非常踊跃，可是在鸣放中一向最活跃的物理系九三小组的成员却很久没有一人起来发言。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会开了两小时以后，有人注意到这个情况，于是纷纷质问为什么与束星北关系最为密切的物理系九三小组的成员不发一言？人们建议他们拿出当初“大鸣大放”的勇气来揭发束星北和交代其他的种种阴谋。但遗憾的是九三小组成员对此无动于衷。曾经拍着胸脯为束星北在肃反中被斗而大喊冤枉的、“民主报”的副主编陈继述，在听到同志们提出的质问后，赶紧为自己表白。他说，我以前是由于片面的听了束星北的话，今天会上大家这么一说，我知道自己的看法错了。其实我是不了解束星北的。陈继述是束星北的学生，远在抗战时期，陈就跟着束星北。陈继述在贵州生病时，束星北还穿着少将衔的军服亲往探望，难道陈继述真正

不了解東星北嗎？尽管王承瑞端出了他們的老底子，陈繼述还是閉口不談。照他的說法是，東是先生，他是学生。先生和学生之間的关系是不同于先生与先生之間的关系的，因此他对東星北还是“一点不了解”。九三社員、“民主报”編委王应素昨天在会上情緒很高，他高喊要把東星北从人民內部赶出去，还警告陈繼述要与東星北划清界限。但令人遺憾的是他始終沒有說出任何真实的情况来。

會議比平日延迟了二十分鐘才結束，但还是有很多人沒有机会发言。听說明天还要开会，他們很高兴，都滿怀信心地說要爭取在明天的“反击战”中打一个漂亮仗。

(1957年7月6日青島日报)

声 討
恶毒攻击肃反的
右派分子

群 众 出 版 社

編 者 的 話

我們匯編的这本小册子，实际上是本社已經出版的“在肃反問題上駁斥右派”的一本續集。蒐集在这本小册子里的，都是有关声討黃紹竑、譚惕吾、趙鴻鸞、張百生、黃振旅、束星北的情况和材料。

我們所以把声討这样几个右派分子的情况和材料匯編起来，是因为就目前情况来看，他們这几个人可以說是恶毒攻击肃反的一些主将。他們所发出的誣蔑肃反斗争的謬論，对于右派陣营來說，是带有代表性的。

他們否定肃反斗争的必要性，說什么肃反斗争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扰之”。但是，大家都还記得，远在一九五〇年，当着中国人民剛取得胜利的时候，反革命残余势力就明目張胆地向人民进攻，組織反革命的地下軍和政治土匪，进行騷乱暴动和各种破坏，刺杀革命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他們企图复辟，破坏我們已經取得的胜利。这难道是“天下本無事”嗎？大家更会記得，一九五五年，当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即将来到的前夕，正当我国人民欢欣鼓舞地迎接美好的未来的时候，残余反革命势力同美蔣特务机关相呼应，又猖狂地向人民、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組織反革命暴乱者有之，进行反革命宣傳者有之，杀人、放火、投毒者有之，进行其他各种破坏者有之。这难道是“天下本無事”嗎？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順利前进，为

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击退了残余反革命分子的进攻，这难道是“庸人自扰”吗？毛主席告诉我们：“解放以后，我们肃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一些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被处了死刑。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广大群众的要求，这是为了解放长期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恶霸分子压迫的广大群众，也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因此，右派否定肃反必要性的谬论，实质上是否定有从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恶霸分子压迫下解放广大群众的必要，也就是否定解放生产力的必要，让残余反革命势力继续爬在人民头上，让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反革命的阻碍和破坏。很明显，他们是在为资产阶级复辟的利益说话。

他们否定肃反斗争的成绩，说什么“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经成为工作报告中的一种公式”，企图以否定“公式”为借口，来否定肃反斗争的伟大的胜利成果。我们知道，仅就这一次机关内部的肃反来说，就清查反革命分子八万一千多名；促使十九万余名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还为一百三十多万人弄清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历史问题，使他们卸掉了沉重的精神负担，便于积极工作；特别是人民群众通过肃反运动，革命的警惕性和识别反革命分子的能力更加提高了，这就使得今后对反革命的斗争，有了更可靠的群众保证。这些伟大的成绩是怎样也不能抹煞的。当然，肃反斗争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毛主席就说：“我们的肃反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也有错误。过火的，漏掉的，都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但是缺点、错误同成绩比较起来，只占次要的地位。右派分子却闭口不谈漏掉反革

命的缺点和錯誤，紧紧抓住过火的一面，夸大起来，恣意攻击，說什么“肃反錯誤十分严重，得不偿失。”但是，这种說法，除了証明他們是別有用心之外，是毫無根据的。拿北京市來說，自从一九五五年一月至一九五六年上半年逮捕的反革命犯，經過逐案檢查証明，其中百分之九五点九七是捕得正确的；是反革命分子，有罪惡，但按政策可以不捕的占百分之二点七四；仅有百分之一点二九是捕錯的，而且都随时发现随时就作了糾正。这怎么能說缺点和錯誤十分严重呢？怎么能說肃反是“得不偿失”呢？

他們否定党对肃反斗争的領導，否定党为肃反斗争規定的方針、政策、路綫。他們有意識的歪曲党的“有反必肃，有錯必糾”的方針，故意只提“有錯必糾”的一面，实际上不要“有反必肃”一面，就是“有錯必糾”也只糾过火的一面，不糾漏掉反革命的一面。他們还否定党的政策。党对反革命分子的政策体现了最大的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但他們还罵“不人道”。他們否定“群众路綫”，害怕和反对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来肃清反革命分子。肃反斗争正是由于貫徹了党的方針、政策、路綫，才取得了偉大胜利的，但是他們否定这一切。当然，归根結底，他們是否定党的領導，正象他們自己所說的：“关键是在取消党的領導”。我們知道，我們的国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国家，这是宪法所規定的。工人階級是通过自己的先鋒队——共产党来遂行其領導的。要想取消党的領導，實質上是要取消工人階級的領導，这是違反宪法的。这样做實質上是要改变我們国家的性質，改变我們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怪不得他們說：“根本問題在于革新社会制度”。其所謂“革新”，不过就是妄图使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妄图把我们拖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去罢了。

他们否定肃反的主要手段，就是拿“法”做幌子。说什么肃反“粗暴地违反宪法”，似乎他们才是宪法的维护者。但是，我们知道宪法总纲第十九条规定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人民民主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因此，如果按照右派分子的逻辑而不去肃清反革命分子，那才真正是违反宪法呢。他们还诬蔑肃反侵犯了人身自由。是的，宪法是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但是并没有说反革命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右派分子企图把“反革命分子”说成是公民，然后为反革命的人身自由作辩护，其实这种偷天换日的作法，是掩盖不了人们的耳目的。而且我们知道，有反革命的自由，就没有人民的自由，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反革命的自由，我们正是肃清了反革命，才保护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因此，在这方面来说，违反宪法的也还是他们。再加上他们否定党的领导，即否定宪法所规定的工人阶级的领导。这样，他们就从根本上违反了宪法。还应当看到，右派分子口口声声讲“法”，除了是故意以“法”作幌子反对肃反外，暗地里是贩卖着资产阶级的“法”，因为不要工人阶级领导的“法”，不要人民民主专政的“法”，不要肃清反革命分子而要保护反革命分子的“法”，当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我们千万不要中了他们偷偷地贩运资产阶级的法的诡计。

他们为什么这样积极地恶毒地攻击肃反呢？从这本小册子所蒐集的材料中可以看到，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有的过去就

是杀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在他們的双手上染滿了革命人民的鮮血；有的則同反革命势力保持着千絲万縷的联系，同反革命是一个鼻孔出气的。正因为这样，他們才如此处心积慮地攻击肃反。同时还应当看到，他們这样做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为什么这样热衷地装出一付“包龙图再世”的嘴臉来大声喊“冤”呢？还不是为了煽动一部分人对党、对政府不滿，以便于他們更有力地向党、向政府、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嗎！

当然，对于右派分子这种恶毒的挑衅，有着高度觉悟的人民群众是不会置之不理的，从这本小册子中間，我們可以看到，人民群众对于右派分子对肃反的恶毒攻击，給予了多么正当的、多么有力的回击！

把人民群众对于这几員右派主将回击的声音反映出来，献于讀者面前，这就是我們汇编这本小册子的宗旨。我們相信这样做，对于声討右派分子对肃反的恶毒攻击，保卫肃反的偉大成果，保卫偉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巩固我們国家，是会有一些好处的。

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

統一書号: 3067.4
定 价: 0.46元